

K295.1  
13  
214

# 上海地方史资料

(四)

上海市文史馆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B 419968

K295.1  
13  
214

# 上海地方史资料

(四)

上海市文史馆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B 419968

## 目 录

- 解放前外国人在上海兴办的教育文化事业述略  
.....上海沿革编写组( 1 )
- 上海的书院.....姚明辉( 14 )
- 上海早期的新式学堂.....姚明辉( 27 )
- 近代上海学术文化漫记.....姚明辉( 47 )
- 上海格致书院和中西书院.....李遵光( 62 )
- 上海广方言馆史略.....熊月之( 68 )
- 龙门师范学校.....周承忠 朱梦华( 108 )
- 清末上海两大学潮.....张大椿( 118 )
- 马相伯先生传略及其办学经过  
.....李青崖遗稿 马玉章校补( 128 )
- 记马相伯先生两三事.....韩景琦( 140 )
- 记震旦学院几件事.....陆章甫( 145 )
- 叶澄衷与澄衷学堂.....王 震( 148 )
- 记上海三所教会大学.....葛祖兰( 153 )
- 昙花一现的劳动大学.....秦含章( 168 )

回忆我的教书生涯.....	郑逸梅( 173 )
近百年来的刻书与藏书.....	缪子彬( 179 )
上海藏书史料片断.....	薛明剑( 186 )
民初上海文坛.....	李健青( 202 )
上海出版界琐闻.....	平襟亚( 218 )
上海点石斋石印书报及其继起者.....	向迪琮( 245 )
清代上海竹枝词.....	吴贵芳( 251 )

# 解放前外国人在上海兴办的 教育文化事业述略

上海沿革编写组

## 一、教会学校

解放前，上海的学校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国民党政府所办的公立学校，为数极少。一类是私人集资所办的私立学校，为数最多，其中有许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当时的官僚、买办保持密切联系，接受它们的津贴和支持，还有不少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学店”。再一类是教会办的学校，以及由外资经营和接受外资津贴的学校，其数字远远超过公立学校。

到上海解放为止，除初等学校外，上海共有教会学校五十一所，其中高等学校七所，女子中学十七所，男子中学或男女合校的中学二十七所。属于天主教的二十二所，属于基督教的二十九所。七所高等学校是：（一）圣约翰大学，它的前身是一八七九年由美国圣公会将培恩、度雅两校合并组成的圣约翰书院；（二）震旦大学，它的前身是一九〇三年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震旦书院；（三）沪江大学，它的前身是一九〇八年由美国浸礼会创办的浸礼会大学堂；（四）东吴法学院，它的前身是一八九九年美国监理公会创办的苏州东吴大学于一九一五年

分设在上海的法学科；(五)基督教女子医学院，一九一四年由美国女公会、监理公会、浸礼会创办；(六)中央神学院，由圣约翰大学原设的改名组成；(七)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一九三八年日伪统治时期。

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学校，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办中等以下学校，以此作为传教基地，吸引青年加入天主教或基督教，并培养传教士助手。第二阶段主要是办中等以上学校，据他们说，目的是：“如果我们要取儒学地位而代之，必须准备好自己的人，用教义和科学来教育他们，使其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够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有教会学校都有他们自己的领导机构、组织系统和教育方针，以及教师、教材和视察、指导、测验、考试等制度，由教会人员公开或在幕后把持校政。

在教会学校里，宗教和外国语文列为主课，强迫学生读《圣经》，望弥撒，做礼拜。外国语文课的钟点比中国语文课多，国文考试不及格可以升级毕业，外国语文则非学好不可。绝大多数学校所用的课本，都是用外文编写的，还有个别学校，讲授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的课本也是外国人用外文编写的。

在教会学校里，不许中国学生进行政治活动。圣心女中校长(法国人)曾对学生说：“中国人的命运，早已在华府会议上决定了，无须你们去救！”三育大学校长(美国人)对学生说：“你们在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绝一切国家观念，爱国二字决无存在余地。”他们认为教会学校是“超政治”的学校，因此不许学生过问政治。但是他们一面标榜“超政治”，一面却勾结国民党特

务打击和迫害进步学生。一九四七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有一部分学生参加反美扶日运动，就有八位同学被勒令退学，以后不再公开招生，只要有教会介绍，不问成绩，一概录取。被国民党政府夸为“模范学校”的沪江大学，在“九·一八”事变后，所有参加抗日爱国运动的同學都被无理开除，几乎每个学期都有同学被斥退、逮捕或警告。

教会大学都是在外国注册的，国民党政府曾明令规定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立案，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芳济却公然拒绝向国民党教育部立案，甚至美国圣公会所办的中、小学也拒绝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立案。直至解放后才先后由人民政府接办，并实行院系调整。

## 二、教会医院

一八四四年，英国伦敦会教士魏林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教会医院——仁济医院。上海解放时，除已停办者外，尚有十七所教会医院。其中属于法国天主教会的七所，即广慈医院（一九〇七年创办）、圣心医院（一九二四年创办）、仁慈诊所（一九二六年创办）、普慈疗养院（一九三五年创办）、仁爱医院（一九四八年创办）、和平诊所（一九四九年创办）。属于英国基督教会的两所，除仁济医院外，还有一所内地会教士疗养所（一九三一年创办）。属于美国基督教会的八所，即同仁医院（一八六四年创办）、妇孺医院（一八八五年创办）、宏仁医院（一九〇〇年创办）、伯特利医院总院（一九二〇年创办）、伯特利医院分诊所（一九二〇年创办）、疗养卫生院总院（一九二七

年创办)、疗养卫生院分院(一九二九年创办)、麻疯疗养院(一九三五年创办)。此外还有由外国出资经营的医院,如宝隆医院、福民医院、公济医院、宏恩医院、砂眼免费防治所、慈安产科医院等。

就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和教会医院的病床来说,据一九四八年《上海年鉴》载,公立医院十二所,共有病床一千四百七十二张;私立医院一百五十所,共有病床五千七百五十六张,其中教会医院十七所,计有病床三千零七十六张。教会医院的病床几达私立医院的五分之三,更远远超过了公立医院。

为什么外国教会要在中国办医院?据他们自己说,“传教医生的工作和目的……既不是为着介绍医学……也不是为慈善而慈善……他们无非是用治病作为传教的手段。”又据他们自己调查,有些地方,“几乎所有的教徒都是通过医院的媒介作用而信教的”。在另外一些地方,或者“三分之一的信徒”,或者大多数的信徒”,是“由于医院影响的结果”。这些教会医院收费很高,门诊挂号费,一般至少相当于抗战前的法币一元二角,有的还不要法币而要美金。住院费用更其昂贵,而且名目繁多;开刀手术费,有的以金条论价,有的等病人躺上了手术台再临时议价。

### 三、外国报刊和通讯社

上海开埠后,首先在上海刊行英文和中文报纸的是英国。它拥有三家报纸,即英文《字林西报》、英文《泰晤士报》和中文《上海新报》。《字林西报》创刊于一八六四年,它的前身是一八



五〇年波佛梅公司掳客奚安门所办的《北华捷报》。该报出版后，《北华捷报》仍继续刊行，成为它的附刊。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公文和消息均由该报发表，经费由工部局负担，其实就是英美在上海刊行的一种官报。《泰晤士报》原为一九〇一年美国人白许所办，一九〇六年售给英国人诺丁汉姆，从此英国在上海有了另一家英文日报。一八六一年，字林洋行出版了《上海新报》，这是外国在上海刊行的第一家中文报纸，初为两日刊，星期日停刊，一八七二年四月改为日报。由于营业上的关系，该报在是年十二月停止出版。

美国在上海也拥有销数较大的两家英文报和一家中文报，即英文《大陆报》、英文《大美晚报》和中文《大美晚报》。《大陆报》原系孙中山集资委托美国人密勒于一九一一年创办的，一九一七年竟被密勒私自售给英籍犹太人爱资拉，而实际控制这家报纸的却是美国。一九三〇年加入了宋美龄的资本，成为中美合办的御用报纸。一九二九年，美国报业公司收买了陈友仁的《大晚报》，改名为《大美晚报》。一九三〇年该公司又收买了有五十年历史的英文《文汇晚报》。从此，上海的英文晚报为《大美晚报》所独占。一九三三年，《大美晚报》社创刊了中文《大美晚报》，基本上是英文《大美晚报》的中文版，同时也登载上海各外文报和中国报章杂志有利于美国的记载和评论。

其他国家在上海也办有外文日报。如，法国在一八八五年出版《上海回声报》，不久停刊。又在一八九五年出版《中法新汇报》，一九二七年停刊。在《中法新汇报》停刊的同时，出版了以法租界公董局为后台的《上海法文日报》。日本在一九〇五

年出版《上海日报》，它的前身是一九〇四年发刊的《上海新报》（周刊）。又在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八年先后创办了《上海日日新闻》、《上海每日新闻》。

英国和美国还在上海创刊了中文《申报》和《新闻报》。《申报》发行于一八七二年，为美国人美查所有。一八八九年添招外股，改组为美查有限公司的事业之一。一九〇七年由美查公司将该报售给席子佩，一九一二年又由席子佩售给史量才，当时投资《申报》的三大股东为张謇、应德闳和赵竹君。英国人丹福士于一八九三年创办了《新闻报》，后来该报一度为美国班却斯特公司所有，一八九九年售给美国人福开森。福开森曾一再玩弄花样，改组该报，并将在香港注册改为在美国注册。一九二九年，由董显光与福开森秘密接洽，福开森把他的全部股票以七十万元售给了史量才。在上海沦陷时期（太平洋战争前），福开森又以太平洋公司名义取得了《新闻报》的发行权。抗战胜利后，该报为国民党所掌握。

各国除在上海发刊中外文报纸外，还办有通讯社。最先在上海设立支社的是英国路透社，嗣后有美国联合通讯社、美国合众通讯社、日本东方通讯社、日本电报通讯社（后来合并为日本同盟社）、德国海洋通讯社、法国哈瓦斯社。在国民政府成立前，各报的国际新闻十之八九由路透社供给。在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与美国联合社和合众社签订了交换新闻合同，一面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逐日将合众社的新闻稿译成中文，供给各家报馆，同时合众社和联合社又在上海、北平、南京、天津等地发送中英文国际新闻稿和有关中国国内

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新闻稿。中央通讯社也与路透社和哈瓦斯社签订了交换新闻合同。

#### 四、图书文物

上海开埠后的第四年，即一八四七年，法国通过天主教耶稣会率先建立了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在解放前，该楼藏书二十二万多册，除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外，占上海公私藏书的第一位。在其全部藏书中，外文书约八万册，有希腊、拉丁、法、德、英各种文字，且多属罕见孤本，各国出版的著名百科辞典及重要杂志也相当完备。收藏最多的是中文书，计分经、史、子、集、丛书五个部门。单是中国地方志一项，就有一千六百一十五部，一万九千四百八十九册，占全世界公藏中国地方志(共十一处)的第五位。

继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之后，英美两国在上海设立了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它的前身是英美侨民于一八五一年建立的上海图书馆。该馆经费原由工部局支给，一九一三年由工部局直接管理，更名为工部局公众图书馆，藏书约四万五千册，大部分是英文书。该馆只供英美侨民阅读，对中国居民不开放。

成立日期稍后于上海图书馆的，有英国皇家亚洲文会总会(设在伦敦)于一八五八年上海设立的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图书馆。它的前身是英国人伟烈亚力于一八五七年建立的上海文理学会。该馆藏书约一万五千册，全部是有关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地理、历史、博物等专门书籍。

在英、美、法等国所办的教会学校里，都设有图书馆，比

较重要的有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和震旦大学图书馆。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成立于一八九四年，藏书约十二万册，其中中文书约八万五千册，其余是有关学术的英文书。震旦大学图书馆成立于一九二八年，藏书约九万册，以有关物理、工程和医药的法文书籍为最多。

抗日战争前，日本在上海设有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图书馆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图书馆。上海沦陷期间，又设立了日本现代科学图书馆。这三个图书馆藏书共约二十五万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日文书。日本还抢走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在东京成立了国立民族研究所，把掠夺来的十几万册中文书陆续运往国内。

英、美、法等国在上海设立的博物院，比较重要的有震旦博物院和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院。震旦博物院的前身是天主教司铎韩德在一八六八年建立的徐家汇博物院，一九三〇年迁入震旦大学，改名震旦博物院。该院主要收藏动植物标本，单是植物标本就达五万多件。同时还收藏中国古物，上自周代，下至明清，包括金器、玉器、陶器、瓦器，共计三千五百件。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院简称上海博物院，一八七四年亚洲文会北华支会所设，主要收藏生物标本，也收藏了不少中国艺术品和古代文物，特别是古钱。

## 五、体育和其他文化事业

### (一) 体育事业

上海开埠以后，兴起了近代体育事业，但由于一直为帝国

主义所包办控制，因而走向商品化与赌博化的歧路。

最先传入上海的是足球运动。十九世纪末，上海次第出现了英美烟公司、海关和英国海军等足球队。在学校方面最早组织足球队的，为一九〇一年的圣约翰书院，继之而起的有南洋公学、徐汇公学、中西书院、汉璧礼公学和上海青年会，都是聘请英国人担任教练。

一九〇四年，曾由圣约翰、南洋、东吴、中西四所学校组织中华大学联合运动会，每年按季举行足球、网球、田径的校际竞赛，其中教会学校占了三所。一九一四年扩大组织，改名为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先后参加该会的有上海的圣约翰、沪江、工业（南洋公学改称）、复旦，苏州的东吴，杭州的之江，南京的东南、金陵，其中教会学校占了五所。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随即宣告解散，由交通、光华、复旦、持志、暨南、大夏、中央、中国公学等八所学校组织江南大学体育协会，东吴、之江、沪江、金陵四所教会学校则另组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

一九〇〇年，北美青年协会在上海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并在青年会下设了一个体育部，开办体育传习所，不久又开办男女体育专科学校，培养了一批体育干部。当时所有私立男女体育专门学校的创办人和主要教员几乎都是该校的毕业生。青年会的第一个体育干事，是美国在一九〇八年派来的晏斯纳。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二年，美国又先后派柯乐克、施温做晏斯纳的助手。他们在体育活动中传播美国的一套体育理论，力图使上海乃至全中国的体育活动全盘美国化。

一九一三年，美国青年会干事勃朗发起组织远东体育协会，由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三国派代表参加，比赛项目为田径、游泳、篮球、足球、网球、排球、垒球。一九二五年五月在菲律宾举行第七届远东运动会时，竟由美国人代表中国在运动会上讲话，引起了海外侨胞与国内人民的极大愤怒。是年八月，中国人自己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可是始终未能脱离美国的控制，这个协会的顾问就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主任美国人葛雷。

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三四年，远东体育协会举行过十次远东运动会。其中一九一五年的第二届、一九二一年的第五届、一九二七年的第八届均在上海举行。中国自己没有运动场，前二次系租用公共租界的虹口花园举行。那时花园门口还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租用时费了很大的周折。全部运动项目的场地和看台都是临时修搭的，用后全部作废。一九二七年的一次远东运动会，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面，向驻华洛克菲勒基金团租借了劳神父路的一块空地，然后转租给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建筑运动场。

上海的体育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逐步走向商品化。以球类运动为例，在当时无数的球队中，有团体组织的，有业余组织的，有职业组合的，也有帝国主义分子组合的。每一场球赛前，先在报上大肆宣传，或雇佣“活动广告”，招摇过市，推销门票。比赛名目有友谊赛、季赛、特约赛、慈善赛等等，巧立名目，吸引观众。遇有救济筹募等比赛，门票特别加价。球赛終了，还拍卖足球或篮球，一只不足，继以两只三只，运动场

成了拍卖行。球员们都有分拆，数额视比赛后的盈余而定。更恶劣的是某些游泳场所，以开舞场、放烟火、举办“原子游泳衣表演”和选举健康小姐来招揽顾客，彼此勾心斗角，丑态百出，游泳池成为麻醉和腐化青年男女的肮脏场所。

帝国主义者还以提倡体育为名，在上海从事跑马、跑狗、回力球等赌博活动。在工部局尚未成立以前，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已在现在的南京路以北、河南路以西，强占民地八十亩用来跑马。这是最早的跑马厅。一八五四年向西移至周泾浜以东，即现在的南京路、西藏路、云南路之间。一八六二年又迁至现在的南京西路，占地四百三十亩。跑马厅每年春秋两季举行赛马，有所谓“跑马大香槟票”，公开发行，每张十元。中国人参加这种赌博活动的很多，不少人因之倾家荡产。

帝国主义分子在工部局、公董局的支持下，开设了三个很大的跑狗场，即逸园（在现在的陕西南路）、申园（在现在的胶州路）、明园（在现在的岳阳路）。他们用几头外国狗来追逐电兔，以先到终点者为胜。每一头外国狗都有号码和特定的狗名，由参加赌博的人事先认清号码下注，再开始竞赛，以决胜负。还有回力球场，最大的是中央运动场（在现在的陕西南路），由该场雇佣一些西班牙人、巴西人、古巴人在场内击球，参加赌博的人也同样在事先认清号码下注，所不同于跑狗场的，只是易狗为人而已。

## （二）广播事业

第一个在上海开设广播电台的是美国新闻记者奥斯邦。他在大来洋行安装了一座十五瓦特的无线电台，于一九二三年一

月开始播音。继之而起的是美国新孚洋行，安装了一部五十瓦特的放射机，从事广播。接着，美国开洛公司在福开森路安装一座一百瓦特的广播电台，广播室设在江西路。又在大陆报馆、申报馆、工部局、派利饭店和美国社交会堂分设播音室，用市内专用电线把各个播音室和福开森路的放射机联系起来。

一九三一年，美国美灵登广告公司和英国路透社合组了一个比开洛公司规模更大的广播电台，放射机安装在百老汇路瑞丰大厦，全日播音。它一直是上海较大的一家电台，后来被国民党交通部高价收买，改为交通部上海广播电台。根据国民党上海国际电讯局一九三四年的调查，当时上海共有私营广播电台五十四家，有七家是外国人经营的，其中有一家是外国教会所设的福音电台。

### (三) 电影事业

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在一八九九年，那时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带了一部旧机器、八本法国百代公司的旧短片来到上海，开始在茶楼、酒馆和溜冰场放映。以营业不佳，于一九〇三年转让给另一西班牙人雷玛斯经营，在四马路青莲阁映出，大获其利。接着在海宁路乍浦路口开办了第一所虹口大戏院，后来竟拥有大小电影院六七家之多，雷玛斯是最早垄断上海电影市场的外国人。

一九〇九年，美国人布拉斯奇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制片厂，并利用控制海关等特权在各地设立影片代理公司。一九二〇年，又有美商和中国买办开设长城画片公司。以后，美国好莱坞八大公司先后在上海设立中国总公司，并在天津、广州、重



庆、汉口等地设立分公司，企图对中国电影发行、放映事业实行垄断。在上海，以一九三四年为例，在上映的影片中，美国影片占百分之九十三。抗战胜利后，几乎都是美国好莱坞八大公司的产品。

# 上海的书院

姚 明 辉

## 一、敬业书院

《上海县续志》述风俗云：“同治中业，大乱初平，当道注意教育。主讲席者，皆当代硕儒，士风丕变，咸知求有用之学，不沾沾于帖括。当时以广方言馆、龙门书院为盛。”上海县于乾隆十三年戊辰（一七四八年）始有申江书院，二十五年改名敬业，至咸同间，已百余年。书院所课制艺而已，虽曾有通学大家，如陆氏锡熊，系挺出天才，非由书院也。至咸丰间，吴县冯桂芬来上海，当道延主敬业书院，始开实学风气。冯氏专长掌故，兼精历算，且究心西法，书院课士，提倡经学。时书院西偏，又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创设广方言馆，冯氏总司其事，详订章程。上海近百年之新学，冯氏如文翁开蜀，自是有曹樾以《学海堂经解》授于学塾，有祁兆熙以洋务长才官于粤东，盖当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中，上海已启维新之机矣。

及夫同治中年，巡道应宝时延嘉善钟氏文烝主讲敬业书院。钟氏贯通汉宋，是以敬业定规，月课必以制艺，旨在鼓励举业，鄙实学为杂作。钟氏虽终老于斯，而造就不广。但科第中知有朴学，钟氏导其先河，同光以来，庶免于陋。

## 二、龙门书院

同治三四年间(一八六四——一八六五年)，丰顺丁日昌膺上海道，就旧蕊珠书院之湛华堂，以理学课士，捐银千两，创设龙门书院。永康应宝时继任，踵成之。礼聘名儒，甄取高材生住院肄业，多来自远方者。其不住院而应月课者为外院生，按月分课，以性理精义、小学近思录等，以宋五子书为主，兼及经解、史论，考入住院者，月给膏火。同治四年，聘平湖顾氏广誉为院长。五年，更兴国万斛泉。六年，兴建院舍于吾园旧址，更聘兴化刘氏熙载为院长。

刘氏理学名儒，通贯万方，主讲于龙门，历十四年以终，光绪七年卒。刘氏于龙门立理学之宗，成就甚众。其来自远方而归者，兹不具悉，如桐庐袁昶著矣。本邑如汪人骥、姚元钰、张焕纶、姚文栋、李平书、范本礼、姚文枋、叶景运、汪锡增、张刚、张坚、丁兴民、苏绍基、黄晋、朱树新、瞿庆贤皆是。应宝时《龙门书院记略》云：“甲子之岁，今布政使丰顺丁公备兵苏松太，设龙门书院于上海南园，方议课士之规，属迁两淮盐运使，去〔既〕而宝时即承其乏，亟以此事自任焉。爰思夫书院者，所以储人才备国家之用也。国家进士，岁有常典，就中名贤巨儒，德功并立，固不乏人。而亦有不可概相比论者，毋亦曩所循习之途固已殊欤！宝时昔受书于塾，尝以此清之于师。师告之，以为古先王教人有道，六德六行六艺皆其具也。后之儒者，从而讲明之，其详未易悉举，而其指则可闻焉。朱子教人，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身体

力行以践其实。学者推此，而喜怒哀乐求中节，视听言动求合礼，子臣弟友求尽分，孰非学所兼综条贯者乎。第古者教人，只于学校，而宋以来如石鼓、岳麓、白鹿洞，讲论切磋，远迩相望，则书院之教士，乃视学校而更切，顾所以行之者，存乎其人耳。惟时谨志之不敢忘，及备官而身膺教养之责，即愿以闻诸师者施之。窃以为欲正其学，先在得师。平湖顾访溪先生广誉品学众著，爰固聘为山长，俾诸生居院，日承指授。凡肄业者必先从事于小学近思录，以正其志，趋后及群籍，以备考索。故凡经史诸书，悉购置焉。又书朱子白鹿洞规于堂，俾日见之以资警省。月课性理策论，期有合于胡安定经义治事立斋之意，故不以举业诗赋列入课程。有志之士，自亦不欲以遇合之心，夺其学问之实也。至顾先生后，则兴国万清轩先生斛泉，今则兴化刘融斋先生熙载，皆因顾先生之所以教人者而不变更。惟南园地少狭，不足以容学者，因择李氏吾园故址而营建焉”云云。

书院所立课规，住院肄业诸生额共三十名，每年十一月由道甄别。及三、八月投课，录取各属举贡生监，挨次序补。每人月给膏火自四两至八两不等，课以经史性理为主，而辅以文辞，尤重躬行。人置行事日记、读书日记各一册，每日填记，逢五、十日，呈请院长评论。每月十三日院课，不住院者但给奖银，无膏火，奖凭课艺等第有差。住院告假，近者十日一出，远亦不过三月。刘氏经师人师，以身作则，言动必诚，兴居有节，与住院生共晨夕，十四年如一日。传考亭之一宗，扬其风于江浙，门人奉祀于院，朔望不忒。光绪中年，松江创一书

院，名曰融斋，亦以传刘氏之学，而闻刘氏之风者莫不起敬。惟刘氏逝后，院长渐不住院，肄业补额住院者，亦浸不住院。至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前后，则有姚文枬、叶景运、汪锡增、赵履福、项文瑞、沈恩孚、袁希涛、夏曰璈、刘至信、朱子颢、沈绶之、朱寿朋。而斯时住院者，可挈子弟门徒从住，或日间到院受学，称为龙门学生，则有吴馨、沈彭年、杨保恒、袁希濂、袁希洛、朱叔源、赵承恣、项镇方、赵正平等，我与从父弟明焯亦与焉。

斯时，院内群处三四十人，长者四五十岁，幼者一二十岁，长者领导，幼者附从，据旧学之基础，展新学之钻研。一因徐汇天主教已有天文台之设置；二因制造局翻译馆已出西学之新书；三因求志、格致两书院之开风气；四因耶稣教学堂之教授科学；五因英人李提摩太广学会之译书日出；六因张焕纶设梅溪书院，仿新学堂之模样，龙门社会蒙其影响。而姚文枬历东西两洋十二年而归，介绍其见闻所得，故乃发求新之大欲，启请院长孙锵鸣大置新书，购天地之球仪，展中外之舆图。治算术则细绎九章，观星宿则攀登屋顶。科学、哲学、教育、政治，自我学习，朝此夕斯。理窟开而思想放，知识张而意气豪，开风气于士林，播风声于社会。惟是溺于举业者多诧为奇事，至目为疯狂，即敬业书院旧人，亦叹用夷变夏。历戊戌、庚子，同人四散，或游学于东瀛，或办学于他处。辛丑八月，上谕各省府州县兴办学堂，院中已阒其无人，而月课膏火奖金如故。

至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年），山阴汤寿潜膺院长之

聘，力主停课，改办学堂，并定为苏松太道立初级师范。乃由书院董事姚文枬保举叶景运、沈恩孚、袁希涛、夏曰敬四人于院长，请巡道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归而巡道聘李钟珏、姚文枬为董事，沈恩孚为代理监督，组织开办，乙巳（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开学。袁希涛为庶务长，叶景运授经学国文，夏曰敬授算学，夏清贻授历史，吴馨授教育，杨保恒为监学，我任地理及物理、化学、博物之席。他若英文、日文、体操、游戏、图画、手工各课具备，开一新局面。置备仪器，创辟操场。科目仿于日本，经学并于国文，为上海城内一最高学府。溯自书院开创至此，凡四十年，而学术风气之递变，可观其迹焉。

### 三、求志书院

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年），归安沈秉成继应宝时膺上海道，就湛华堂月课经义，取名诂经精舍，聘德清俞樾为山长，命题评卷。时刘氏树考亭之宗风于龙门，钟氏发谷梁之大义于敬业，加以俞氏之通邮汉宋，贯通古今，承学之士，浸获进益，不囿不滥，立近百年上海学派之根柢。

至光绪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年），南海冯浚光继任巡道，创求志书院，而诂经精舍并入焉。冯氏创办制造局，督理广方言馆翻译馆，已历年数，至是，捐银二万两，建屋五十余间，创立求志书院。院置六斋，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曰算学，曰舆地，曰词章。延钟文丞长经学，俞樾经学兼词章，高驂麟掌故，刘彝程算学，而张焕纶以龙门院生膺舆地斋长之任，邑人

士以为荣。自昔輿地掌故附居史部，算学一门视作技能，冯氏提列专科，抗衡经史，辟通今之路，示求学之针。六斋之分，开大学院系之祖。且购置六斋适用之古今要籍二百六十余部、七八千册，为当时城内最大之书库。课规，六斋每季各命题四，不限籍贯，听人备卷投交。以教諭为监院，由学署收卷发奖，奖由巡道捐廉。冯氏本拟宽筹经费，招生住院肄业，略仿龙门规范，有类西洋大学院之性质，适冯氏以寻亲伊犁，乞假去任，及将回任，遽卒。

甲午而后，风气大开，此院转形陈旧。至于甲辰停课，经费并入龙门师范，其藏书已于光绪十年移贮龙门书院。龙门于书院停课之际，自有图书三百四十余部、一万数千册，两共合有二三万册，传给苏松太道立龙门师范学堂，为上海城内之大书库。

#### 四、蕊珠书院

蕊珠书院者，发端于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之巡道江夏陈銓。銓选敬业书院诸生三十六人，月课于蕊珠宫，取十八人为登瀛上舍，榜其内园为蕊珠书院，建奎星阁、太乙、莲舟、方壶、一角、龙树诸胜。邑举人金树涛文辞华赡，士林瞻仰，乐成美举，增建讲堂、号舍及珠来阁、芹香仙馆等处，并劝助宾兴让借公费，銓复捐廉以成其美。未几，銓擢监司去，而道县轮课不辍，树涛为书院董事。既而停罢。至十二年(一八三二年)銓擢苏藩司，以树涛请饬筹经费。乃于十五年后，集资而成，并增课额至七十二人。每年官邸各十课，官课由巡道、海防同

知、知县轮课，专课举业，师课则兼经古，经古者，词章诗赋，盖视敬业为加工。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又附设孝廉课，惟本邑举人得与。

此院为敬业之高级，虽未脱举业窠臼，而光绪季年山长若长洲叶昌炽、宁海章梲，皆博学通儒。至光绪三十一年乙巳，科举废，书院停课，改办上海师范传习所。集旧塾教师而延教员，传授教育、史地、算学、理科及唱歌、图画、手工等，备小学教师之选，则教者皆少年，而学者多老年云。时敬业书院亦停课而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凡此书院改办学堂之事，概由书院董事姚文榭主持办理，请官决定。推项文瑞为上海师范监督，叶景运为敬业学堂堂长，汪锡增为敬业学堂国文主任教员，皆昔龙门院生也。于是旧科举变为新教育，惟是科举腐臭末流陋习，氤氲之尘寰，迄未洗净。则因生员童生人多如鲫，匆遽改造，大都系怀其空疎风韵，摇身而一变。貌去神留，酸窝发酵，罕有出于旧学深根而切实进取者也。

## 五、梅溪书院

梅溪书院者，龙门前辈院生张焕纶所为也。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焕纶受刘氏之教，设帐授徒，欲试行朱子小学而变通于时，故榜“正蒙书院”。范本礼力助之，相与尽心陶冶。又有龙门同院生沈成浩、朱树沁，同乐英才之育。初系赁屋为之。光绪八年，巡道邵友濂甫下车，闻其良，访实，奖以经费而鼓励之。继而四载，邵擢豫臬，临去已购地盖宇，改名梅溪书院，声誉既著，生徒亦浸成材矣，有类于今之由小学而登中



学也。邵为之记：“生徒近百人，少长有秩，讲授有序，董率有节，作息有程，彬彬乎如游古党庠术序间，与博士弟子相酬酢。”又云：“先是张君集两三同志，博求前贤幼仪养正诸训，损益古今，参会中外，设为教约程式，试行于家塾”云云。邵为建洋文书馆，始增课英法文。斯时耶稣教所设学堂浸多，皆阴渗其教旨，掠取信仰。此院以同而异，貌若同于教会学堂，神则异焉。盖怀孔教卫道之心，惟斯时尚未见孔教之名目耳。心怀孔教而肄及洋文，此其所长也。

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年)，焕纶歿而树人撰记。文曰：“中国无小学校久矣，欧美东来，基督教士之在中国开学堂者，往往而有，若中国自立之学堂，十年以前殆无闻焉。惟吾师张先生之创梅溪学堂，乃在光绪四年之春，距今二十有七年矣。方是时，士大夫或醉心帖括，或仇视新学，先生独奋于俗流之外，远师古小学教人之遗法，近采泰西小学校之成规，联同志教君子，通力合作，聚徒数十人，分曹讲习，规制粲然，一中国四千年来最先改良小学校也。寡识之士相顾骇怪，或造浮言以撼之，先生屹然不为动，与生徒辈孜孜讨论，瘠口焦舌，穷日夜不倦。不数年，成效大著，浮言渐息，信从者日益众。迺请当道筹经费，廓学舍，为久远计，而学校之规模粗具矣。”又云：“先生之为教也，善曲体学生之性情旨趣，而变化其气质，发达其知识。规则虽严，而情意不阙；课程虽密，而精力足给。其教之目的，则在重器识，轻文艺，尚博爱，耻独善，恒以积学、寡过、养生三事课弟子，合于西儒德育、智育、体育之说。先生足未涉东西两洋，而于教课之方，校具之式，与夫学

生坐作进退饮食游息之节，冥思力索，悉中程度，与近日东西各国小学校教授法管理法有暗合者。”又云：“凡一学校之立，师必数人，徒必数十，利生于群，弊亦滋焉。综理不得其道，则情散而事隳。故继梅溪而起者，或旋起旋废，而梅溪巍然独立，方与近日改良学校较长絜短，共进于文明之域。非始事者擘画之精，其不至此矣。”又云：“某等亲承教泽，感不去怀，惧来者之或谖也，为述其莘莘大者，以泐于石，俾后之编教育史者，有所考焉。”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年），诏办学堂，此院始名学堂。此文作于乙巳诏废科举之年，时译自日本之文方如春笋，故其文词，若教育，若目的，若改良，若规则等，已染新风气，已比邵文略变。至于民国，遵守部章而定为官立高等小学。原张氏之初意，盖欲为龙门、求志两院培养初基，改革科举蒙塾利禄鄙陋之风。惟其生徒之父兄，虽美张氏教术之良，而所期终是应世生存功名上进之望。故三十年间，先后成就诸生，身入胶庠者既不乏人，而升转教会学堂及从事于世务者，实繁有徒。

## 六、格致书院

敬业、蕊珠、龙门、求志、梅溪五书院皆在城内，城外则有格致书院，在公共租界北海路。创办于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年），无锡徐寿与英国傅兰雅所发起，禀准南、北洋大臣，邀集中西绅商捐资建设。光绪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年）成立，供有志西学之士，研习各科学。延请中西名人学士，讲演自然科学。复由南、北洋大臣及津海、东海、江海、浙海、粤海、江汉各

关道，分期命有关格致之题，课试给奖。选印课艺，按季发行，与求志书院印行之课艺并驾而齐驱，并为开辟科学新知之先河。又设有藏书楼，又建有博物馆。院内仪器备具，延聘西士，讲授化学矿学，听人传习，影响求新志士，得益甚溥。院事向经公举华洋董事经理。寿歿后，寿子建寅、华封相继为华董。光绪季年，新教育兴，学堂普广，科学通行，此院渐歇。辛亥之革，处理结束。三十年扬扇学风，大有功也。初亦由冯峻光之协助云。

## 七、广方言馆

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年)，江苏巡抚合肥李鸿章禀上海建汀会馆，奏设广方言馆于上海。

初就城内老学前敬业书院西偏屋宇开办，书院山长吴县冯氏桂芬总司其事，详订章程。制分上下两班。初进馆者，先入下班，授算学、代数学、对数学、几何学、重学、天文、地理、绘图及外国语言文字。明年甄别，择其优秀者入上班，专习一艺。凡分七门：(一)辨察地产，分炼各金，以备制造之材料；(二)选用各金属材料，或铸或打，以成机器；(三)制造或铁或木各种；(四)拟定各汽机图样，或司机各事；(五)行海理法；(六)水陆攻战；(七)外国语言文字，风俗国政。时鸿章方创设机器制造局，故此科目，相与配合。乃时风卑视工技，报名都系幼童，寡识而少文，乃定正科附科，各分英文法文两馆。

至同治八年，江南机器制造局在高昌庙镇，冯峻光办理已具规模，乃于局内西北隅特为建筑广方言馆屋宇而迁入焉。又

设翻译馆，光绪朝又设算学馆、天文馆。自甲午以至庚子，又设东文馆、铁船馆、画图房、工艺学堂，悉隶制造局总办掌管。英法两馆生徒成材，则咨送北京总理衙门同文馆肄业。

庚子之后，丰城毛庆藩字实君，督制造局，常召广方言馆高材生，谆谆训诲，耳提面命，发聋警聩。毛氏泰州巨子，诚恳肫挚，得其传者，亦一宗也。算学馆有名师刘彝程，天文馆有名师南汇贾步纬，铁船馆在船坞，学生长于绘图，著盛名。工艺学堂在画图房，内分机器、化学两馆，学生各二十人，毕业后派入各厂学习。翻译馆延西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与中士徐寿、华蘅芳、王德均、徐建寅、赵元益、钟天纬、肖穆等对译西书。而海宁硖石李善兰，自咸丰二年来沪，寓居十年，于兵戈扰攘之际，译成诸书，卓然为一代畴人之宗。至同治七年，入都为天文馆总教习。自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年）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二十六年之间，翻译馆译印之书，凡一百八十五种，皆实学，无空言。徐寿、华蘅芳领袖译馆，开数理之宗，于今九十年矣。当日本维新之初，尝取法于徐华，其风远哉。庚子而后，翻译馆已弛，天文馆久罢，算学馆旋撤。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乙巳，总督周馥以各省已设学堂，兼习外国文字，足备译才，议改广方言馆，经陆军部定为兵工学堂，而工艺学堂并入焉。

## 八、吴会书院

上海县西南乡马桥镇有吴会书院，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镇人钮世章等集捐创办。初就文昌阁命题课试，十三年购置

民房建筑书院，稟县立案，不设山长。光绪六年镇人顾言等，添建讲堂立其规模，课规同于敬业，而无师课。每年十课，课举业也。定额超等生员八人，特等生员十二人，上取童生六人，次取十人。

至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世章之子永建中举人，弃旧而图新，志高而愿大，欲革陈腐之风，建树豪强之气，倡率少年，改良乡里，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创强恕学堂于吴会书院，精诚奋发，子弟云从，突呈一方之新风气。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庚子，图废书院而不可能，然当时之新思想已启于一方，因地接华亭之疆，故风播松江之郡。越二年壬寅，诏改书院为学堂，始由书院董事顾言等将书院田产八百余亩，款产二千余元，定充强恕学堂经费。永建夙负志气，发愤求新。光绪丙申(一八九六年)而后，西历武汉，东游日本，热心革命，着手家乡，用力于强恕学堂历有年所。华上之间，异军突起，独树一帜，风气所被，有号称钮铁生学生者是也。铁生，永建字，世所知名。后强恕定为两等小学堂。

### 九、三林书院

上海县东南乡有三林书院，在三林塘镇，系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年)秦荣光、赵履福等捐资开办，稟由道县通详立案。二十三年就镇之文昌阁建屋。课规亦仿敬业，而设有师课。立经学、史论、算学、舆地、掌故、时务六门，使各生童讲求根底之学。不设院长，师课由荣光担任阅卷，不支薪水。

光绪季年，郡守委荣光兼董南汇观涛书院，南邑士绅延兼

院长。后并三林，皆规为学堂，浦东学风成一帜焉。

同时南汇周浦镇有于邕，博学多文，深造有得，榜“芸香草堂”，传授朴学。既课徒于家，复命题遥课，月试评等。光绪中年，桃李满浦左，多高材生，号为芸香弟子，类似一书院矣。惟历戊戌、庚子，于氏排击维新，声斥革命，而弟子有反戈者，如癸卯之秋，顾次英、黄炎培、张志鹤等新场演说，几殒其身。师弟异途，忽如水火，可见风气之变矣。

# 上海早期的新式学堂

姚 明 焯

## 一、南洋中学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王维泰所办的南洋中学是上海民办中学之开端。王维泰字柳生，上海廪贡生，住于松江府城。一八九五年春，以典业加税事在南京与姚文栋同寓。维泰平素好上条陈，言其兴学育材策，大旨议旧书塾加课洋文、授算学云云，实类梅溪、广方言馆办法于书塾。陶森甲见之，代递制军。旋传语，何妨试办以观成效。维泰欣然，归而即其家塾谋立中西学堂，纠合亲友，无应者，或且笑以洋学堂，盖社会惟尊科举，以洋学堂为邪见也。维泰发愤欲成其事，谋于其家塾教师王纳善。纳善字引才，维泰延教两子已有年。纳善建议先就家塾延一英文教师加课英文，不立学堂名目，以免洋学堂之见憎。乃榜“育材书塾”，得友人子弟若干，于二十二年丙申开课，其后为上海南洋中学堂之蒙泉也。

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癸巳），上虞人经元善集合同志创办经正书院。先是华亭人钟天纬主持三等小学堂于高昌庙附近桂墅里，规格参酌家塾与基督教会学堂模样，实为邑中民办新学堂之最早者，一八九三年停办。经元善继起接办，建筑校舍，订立章程，名曰“经正书院”，实为新学堂。至一八九七年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以经费支绌，并入南洋公学外院。明年戊戌，在桂墅里设立经正女学，以响应新政，又于城内淘沙场陈公祠之时化堂设女学一所。至二十六年元善去沪而皆废。

钟天纬字鹤笙，同治间肄业广方言馆，精通中西文，随使欧西，归入翻译馆，究西洋教育学说，倡师范之议。王维泰曾执事于制造局，稔钟天纬，其兴学育材议，似本于天纬之论。

一八九七年，王维泰迁育材书塾于上海大东门内王氏宗祠之省园。立正馆、备馆，正馆课经史、词章、掌故、算学、化学、英文；备馆课中文、英文、算术。先开备馆，有学生王宰善、王守善、王锡善、王柱善、顾维钧、朱葆康、林行规、林佩侃、赵月潭等。有女生薛锦琴姊妹，系教师薛仙舟之女。诸生年近二十，幼者十三四岁，凡四五十人，分为两班。自是育材与梅溪并峙于上海城内。惟梅溪犹兼课举业之文，育材则摒弃举业文学，而以出洋游学为目标，为民办新学堂之权舆。阅三年，至一八九九年与一九〇〇年之间，维泰之子宰善、侄守善游学日本，正馆迄未开办。维泰交其侄植善接办，自此名曰“育材学堂”，渐去书塾之称。

一九〇〇年七月后，维泰欲停闭育材书塾，由王植善（字培生）接办，仍载维泰之名。明年辛丑，改育材书塾之名为育材学堂，厘订课程，设中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化学，定为中等学堂程度。惟当时并无小学毕业生，故招生年龄假定十五六岁以上为合。课业算学自开方以上及外国史地，概用英语教授，企合北洋大学等入学及格。教员皆当时有新思想新学识者，以同志结合，不计脩脯。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王植善将育材学堂定名为南洋中学堂，立案于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署之两江学务处。

王培生自庚子接办育材书塾而后，以书塾掩护其政治革命活动，戴王维泰以为藏身之法。至辛丑(光绪二十七年)之夏，清廷下诏变法，乃改育材书塾为育材学堂，添设体操课，操场在校外，学生穿制服，搨木枪，排队伍，堂皇过市，路人聚观。城内科举秀才什九腐臭，惊为邪风，尤其甚者，虞夺己业，因而忤忌，竟捏名以康党诬维泰、植善于省道府县。赖陶森甲力，无事。明年壬寅，上谕书院改办学堂，而本县有官立之敬业学堂起焉。又明年癸卯，清廷颁布学堂章程，植善偕吴馨于春夏间专往日本考求教育，归而整饬一番。旋得陶森甲力，立案于两江学务处，以南洋中学名，时在甲辰。自乙未至甲辰，首尾十年矣。植善接办后，先后襄助者，有王引才、夏颂来、陈景韩、沈颀民、马君武、杜亚泉、徐砚农、王季贞、王立才、汤济沧、徐凤石、渠巨屏、龚子英、史良材、濮卓云，我亦与焉。癸卯第一届毕业，秦汾、钱崇润、朱葆芬、李松泉、陈道源、陈桂馥、王弼、张宝华等十七人，或升北洋大学，或赴美游学。越五年为宣统元年，既买地于龙华路日晖桥之西，而建筑校舍落成，始迁入也。

王植善幼时家已中落，中年贫乏几至无以自存。父母既亡，亲无兄弟，妻子亦死，孑然一身，惟校是务。然独营一寓，不依于校，独身居处，有僮候门。月支校长之俸，不沾校物一针。校款悉数归公，绝无学店时风。积年累月，至一九四九年解放之时，校地广至五六十亩，毕业生名籍达三千余人。成

绩之优，校望之隆，在民办中学中堪居首膺。并立一图书馆，古籍计有七万六千七百册。解放后政府改为上海市立南洋中学，图书则移并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今上海图书馆）。植善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卒，由其门人葬苏州灵岩山。校友曹仲渊为撰年谱。植善之母与我母亲姊妹也。植善长我十岁，我自幼兄事之，至于老耄。其事皆我所见或与经历，其南洋中学校友之成绩在于社会者，世人共见之。

## 二、澄衷学堂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九月，浙江镇海人叶成忠捐虹口西华德路北张家湾道契地二十四亩八分五厘四毫，又规银十万两，立澄衷学堂，延武进刘葆良（树屏）太史主其事。逾月，成忠卒，其子貽鉴复捐规银十万两。明年庚子建筑校舍，又明年辛丑开校。设蒙学五级，每级两教室，凡十教室。又明年壬寅成忠次子貽铭、貽钊等复年拨规银四千两充经常费。改设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三部。

叶成忠晚年念幼年未曾识字，作业艰苦，年逮六旬，发愿输财立此学堂，欲以识字启蒙了其心愿，乞刘太史为纂教人识字之书。庚子之年，太史为延宿学老儒与新学少年纂成《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一书，体例撰自刘太史，总纂为海宁章一山太史榘，嘉定夏清貽与我分任地理部分。其时清廷尚未设学部，并无学堂章程，坊贾所开设之商务印书馆尚在萌芽时代。刘太史意，此书用为课本，即是新法教授，与纂同人都赍之，闭门造车，未知凿枘，及今观之，不合教授之用，惟在当时则

为崭新之教科书矣。辛丑出版，不胫而走，销售一空。

壬寅之年，既设中小学，立历史地理之课，章太炎为总教。以地理囑我，而各教习试撰课本。其冬蔡元培、章炳麟发起中国教育会，方经纶爱国学社。刘太史乃于澄衷学堂立师范研究室，延前南洋公学师范院生、南通白作霖振民为主任，吴县张一鹏云搏副之。集校内诸教习，并招校外有志于教育者为研究员，而借径于日文教育学之书以助钻研。癸卯之夏，方谋联络中国教育会，而爱国学社苏报事发，蔡元培东渡，章炳麟入狱，中国教育会歇。本校之研究室则编撰课本，陆续付印。我所撰地理课本印竣于丙午（一九〇六年）。时上海之民办中小学，此校为首屈一指。今文史馆馆员葛祖兰其时以第一名毕业于第一届而游学于日本。其后则若阮介藩、郭虞裳、胡适、竺可桢皆此校学生。设备之周，校望之隆，为上海民办中小学冠。“八·一三”之役，校舍竟毁。

### 三、强恕学堂

一八九九年，西南乡马桥镇举人钮永建，集合同志创办强恕学堂于马桥镇吴会书院。

钮永建字惕生，通行铁生，世居马桥镇为望族。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癸巳科举人。初慕康梁，后羨革命派。己亥之年陆续募集二千余元为基金，又募得田二百二十四亩四分，以募捐款买田三百十三亩八分七厘二毫。至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年）诏改书院为学堂，吴会书院董事顾言等，将书院财产，计银七百六十元，钱五百千文，田二百七十七亩六分一毫及典

捐月三十六千文改属学堂，通详立案，书院停课。又资遣李宗邨赴日本弘文书院学习师范。

强恕学堂秉钮永建意志办理，壬寅而后清廷设立学部，颁布学堂章程，强恕名为两等学堂，仍由永建主持。

#### 四、敬业学堂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四月，知县汪懋琨就敬业书院院舍改设敬业学堂。先是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上谕各省府州县兴办学堂，二十八年正月知县汪懋琨遵旨筹办，至四月照会书院董事兼学堂董事而立此。至三十一年乙巳，科举废，书院停课，乃定名高等小学堂，遵部章规定年级。旧有之敬业书院产款，悉充学堂基金，由县通详立案。

此校开办之始，书院兼学堂董事为姚文枏、叶景运、李鸿膏、刘汝曾，而请张焕纶为总教。叶景运任教长逾十年，汪锡增为首席教员阅十九年，课业以国文著。

敬业书院改办学堂之初，延任教习监学等员均取材于本邑庠生，课业以读经及中文为首要，而思想意识仍溺于科举旧习。虽有历史课，教习系举业遗才，抱《御批通鉴》等为教本。叶景运长于辞章，汪锡增精于制艺，疾斥康梁，莫谈时事，视算术为新学，凡自然科学概付阙如。我非生非童，受任地理教课，从今弃古，一本自然，为突出功课。其最初之头班学生，年皆二十内外，以升入松江府官立中学堂为趋向，谓县学升府比秀才，府学升省比贡生，省升京比举人，故同时之澄衷、南洋、务本各集团称此校为旧派。然是时他县之官立学堂都如此也。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改官立敬业高等小学堂名为上海县立第一小学校。至一九二二年于其东建屋而设县立敬业中学堂。“八·一三”之役校舍尽毁。后于老西门内文庙之南建屋设校，而袭敬业中学之名。

### 五、务本女中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邑人吴馨设立务本女塾，为民办女学之始。至一九一二年将校产捐归县有，改称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校，另立务本女子中学校。

吴馨字暉九，受学于沈恩孚。教员若沈庆鸿、曾子巩、王引才、吴公之、沈颀民、陈景韩、汤济沧等，皆维新同志。延王植善夫人沈竹书女士为学监。一时维新人家二三十岁女子多就学焉，至有四五十岁而就学者，风气一开。

初，略如南洋公学制，分寻常、高等、特班三级。至癸卯之夏，吴馨偕王植善赴日本考求，对日本教育学说，凡心理伦理诸科，教授管理诸端，都研究有素。归废高等，改特班为专修科，设专修二级、寻常三级。甲辰，改专修为师范科，设师范、寻常各二级，中学一级，并添设幼稚舍。乙巳，分师范为正科、预科、简科三级，废寻常级，设高等小学二级。是年清廷废科举设学部，颁学堂章程矣。

务本初赁屋小南门内俞家弄为校舍，乙巳迁赁西门外之生生里。丙午之岁购营地十二亩于黄家阙为校址，宣统己酉(一九〇九年)筑成校舍。民国壬子，捐归县有，改为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校，民国五年将其附设之小学教员讲习所，改组为务本

女子中学。

## 六、三林学堂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秦荣光与周希濂等就三林书院改组为三林学堂。书院在浦东三林塘镇文昌阁，以屋不敷应用，于阁后慈悲阁故址筹款兴筑。复资遣孔祥百赴日本东京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以备教习之用。二十九年续遣孔祥里、秦锡芝、周岐凤。三十年，添购仪器，教授理化，增辟操场，由县禀道发洋枪八十枝练习兵操，并附设体育部，教练三林、杨思、陈行三乡绅商子弟。三十一年，资遣赵承恣、秦之望赴日本东京入早稻田大学，并添设中学班。是年冬，办理商约事务大臣吕海寰汇案奏请传旨嘉奖，三十二年奉准。

光绪二十八年学堂章程尚未颁布，由荣光拟定学科，中文分经学、史学、地理、算术四科；西文分英文、法文两科。二十九年，遵管学大臣初定章程，增改科目。三十年复遵学务大臣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改定科目。

学堂以书院移交银二千三百四十五元充作基本金，典捐每年钱四百三十三千文，道、县移捐书院奖款每年钱三百九十千文充经常费。又书院移交则田二百七十六亩一分二厘四毫，邑庙豫园钱粮厅基地楼平房七十六间，周浦市平房一间。至民国定为三林、陈行、杨思乡立小学校。

## 七、中西启蒙学堂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邑人张轼、叶逵设中西

启蒙学堂于城内县署西之北张家弄。在此一年前（光绪二十七年）五月，邑人王琪、钱允中，张元基、苏廷猷、曹浩等二十四人发起，担任义务夜课，中西并授。初假亭桥西叶逸宅，旋禀准知县汪懋琨将发封之北张家弄小天竺寺充用。二十八年由张轼、叶逸捐资添设日课，名中西启蒙学堂。经常费取诸邑庙豫园茶捐，又赎回钱粮厅抵出房屋十四间收租充用。二十九年改为官立，更名养正学堂。至民国元年定为市立养正小学校。

### 八、爱国女学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蔡元培等创办爱国女学于公共租界派克路登贤里，设本科及预科。至宣统二年移海宁路天保里，设中学、小学两部。至民国三年由江苏省政府立案，经费由诸校董募集。

此校于民国时设高中、初中及高中师范科、体育师范科并附属小学，毕业生服务于社会者众多。至解放时已阅四十七年，为私立女子学校历史悠久成绩优良者。

### 九、梅溪学堂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有京江同学小学堂，设在西门外京江公所。又有敦仁小学堂，设在法租界城河浜，系五金洋货公所、同义善会所办，专教五金洋货业子弟。此两处，初本不立名目，其名后所加也。又有利济小学堂，设在小南门外南仓街施家弄，系南汇人顾藩将其学塾改设者。而梅溪书院亦是年改称学堂，溯其自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以正蒙书院

始，至此已二十五年矣。

民国六年丁巳（一九一七年）梅溪学堂举行四十周年纪念会，校友梅豫枏撰记有云：“今海内学校众矣盛矣，若我梅溪者，固无足异。然四十年前，世方醉心于帖括科举之业，乌有所谓学校者。我师张经甫先生焕纶因于中外强弱人才消长之势，慨焉以兴学自任，而梅溪学校乃于四十年前卓然为今日风气之先导。学者既歌颂张先生不衰，而方其经营缔造资之财以促成之者，尤莫不以前校董姚佑孙天来之功为多。自开创以暨成立，屋舍之租建，薪费之补助，月糜巨金，数岁无倦色。又尽遣其子弟就学以为众倡。由今日视之，其事又无足异也。顾当梅溪初年，谣谤腾沸，若异言异服之背于时，非圣无法之戾于道，去之若将浼焉。而姚先生始终毅然，力扶植之，惟恐不及，此岂易言者哉。”豫枏字问葵，益奎子，光绪二十年甲午举人，与朱树人同为正蒙初年以至梅溪初年之学徒。梅溪于民国元年定为市立小学校。校舍原系南临梅溪弄为前门，后濒半段泾。清季填泾而筑为蓬莱路，校改后门为前门，故在蓬莱路也。

## 十、爱国学社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之冬，蔡元培引南洋公学特班生贝寿同、胡敦复、穆湘玥、黄炎培等五六十人退学，得犹太富人哈同之妻粤女罗迦陵之助，为爱国学社。赁屋公共租界，初设于跑马场之北，旋徙红庙附近路北巷内，而有南京陆师学堂退学者章士钊等若干人加入组织。又陆续有闻风加入者，类多倏来忽去，与他学堂之风格异。至二十九年癸卯闰五



庚初六日，即一九〇三年六月三十日散。

壬寅春夏间，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发起中国教育会，以黄宗仰之介绍，设于罗迦陵之爱偏园。此社经费，各为教育会筹措，实系仰给于罗迦陵。

学社开办，闻风而来者年岁不等，有二三十岁之盛年，有十四五岁之幼年，概不考选，一律入学。类皆志气发扬，精神饱满，自诩似无政府，教学则流于讲道理，且浪漫志士多来附聚，议论风生，动作频繁。社章墨而不履行，学风几如俱乐部，兴趣浸入于政治运动。我在澄衷学堂为教习，以补习英文，每星期到社三次。澄衷师范研究主任白、张两氏联络教育会，则见会在哈同花园，间由蔡氏讲演，听者数十人，系由各方面来不知其来历，陆续来去，听罢空场，既无签名，亦无记载，又无讲义。月讲两三次，余无他事。乌目山僧在旁照料，询其详情不得要领，故后来白、张两氏以为无须联络。

癸卯之春，日本仇俄覆剧，设机关于上海，鼓动中国人士同情抗俄。有徐某者，以苏报访事警悉经常来社，而社友有为《苏报》撰论者，论调发扬，报之销数骤增，因此学社与《苏报》关系日益密切。报为学社张大声名，而论调多触政权之忌，卒以此辞稿。当时，国内外少年志士往来沪上，都逗留于爱国学社，言论愤激，声名远著。春夏间，因广西及东三省外交事件有操害国权之失，以社之号召，通过《苏报》，召集群众，决开拒俄拒俄大会于张园，并组织童子军，预备开往东三省驱逐俄人。所云童子军，并非童子，皆系社友及逗留社内之爱国志士，他们各自备兵式操衣，肩荷社备之本枪，拂队而行于马

路，以张声势。经两江总督魏光燾报于清廷，批飭严密查拿，随时惩办。会有邹容之《革命军》出版散售，促成案件。此时钮永建在日本东京与黄兴、蓝天蔚、秦毓蓁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又组织军国民教育会。而会员纷纷回国企图以军事进行。黄兴曾过沪往湘。

公历六月三十日农历闰五月初六日，章炳麟于爱国学社被捕，邹容闻讯投案。蔡元培、吴敬恒先得消息，蔡走柏林，吴走伦敦。此事后称《苏报》案，实为《革命军》案。革命一词之深入人心昉于此，爱国之标名号召亦昉于此。

爱国学社虽未成为学堂，然其声名之浩大，影响之广远，实为上海历史中一件大事。

自蔡元培出走，爱国学社无形解散。惟派克路之爱国女学存在，并附有女学报馆，后由何人主持，不悉其详。但有商务印书馆编辑蒋维乔引其一部分至江湾路之尘园，维持中国教育会，潜为蔡元培之通讯机关，不悉所终。蒋武进人，民国三年蔡为教育总长时，入教育部为官。

### 十一、道立师范附属小学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邑人姚文枬与李曾珂、刘汝曾等，筹款设立二十二铺小学堂于西门内半径园北刘公祠。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定为道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

光绪二十八年之冬，江苏省有官费资遣留学生赴日本弘文学院简易师范科学习教育之举，行文各县选派举贡生监若干人送省候遣。上海县知县汪懋琨以囑书院董事姚文枬，文枬举项

文瑞、曹棟、杨保恒、贾丰臻四名庠生以应。癸卯之夏学成归，欲试其所学，乃发起此校。四人者，项年四五十已称宿儒，在日本时不剪辮，盘发于顶，同人笑之讥之皆不顾；不肯入学生名册，愿列旁听席，一若为三人之监督然。归以未屈于外国人之师门自豪，并以未剪发为不辱国体自慰，写《日本游学记》一卷质于龙门书院之同学，且以报官董。时官立敬业学堂总教张焕纶已歿，堂长叶景运延之襄助，又推兼官立养正学堂总理，以曹棟意气和平，引与共事。杨、贾年皆二十外，素事举业，课徒学塾，及到日本，眼界开广，思想解放，情绪振奋。归而慕爱国学社章、邹、蔡、吴之风，抱改良官立学堂之愿。文枏乃请于县绅领袖前辈老人李曾珂，筹设此校，囑杨、贾办理，杨为正，贾副之，于城内树一帜。敬业学堂同人以为立异也，歧视之。杨保恒原是项文瑞多年学徒，方在日本时趣向已微异，至是，文瑞虽与发起此校而不与校事，尽杨、贾意志办理。文枏原董城内外六处道立的崇正官塾，系旧科举学塾之模范，杨、贾颇诋其陋塞。塾师则多老宿前辈，疑游学外洋之用夷变夏，去正归邪。文枏请于巡道，延文瑞兼任六官塾视察，加授算术，每星期轮流往教。各塾师得见新教授良法，辄闻日本小学教育情形，传说于其他学塾，启发塾师之觉悟，立改进教育之初基，颇著效果。播及城乡旧塾师，渐扬弃其科举腐旧思想，倾向文瑞，为本邑教育新旧间一大转折。

## 十二、城东女学筹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年)，邑人杨士照就小南门外

里竹行弄居宅，设城东女学。吴馨与娄邑女士吴朱哲设上海幼稚舍于西门外庆安里。邑女士陈婉衍租地建屋于大南门外复善街，设宗孟女学堂。商学会职员吴治恭、周宗颐设竞业中学堂于小南门内俞家弄。在民国时皆停办矣。文明书局捐建小明小学堂于公共租界北浙江路善祥里。浦东三林乡二十四保黄二围人乔堂，设黄二小学堂于乔氏家祠，后皆不详。

光绪二十八、九年以前之新学堂，初略步武耶稣教会之学堂办法。自光绪三十、三十一年改为依仿日本，则游学弘文学院速成师范之影响为大也。

### 十三、师范讲习所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项文瑞、曹榛、杨保恒、贾丰臻发起，邀集姚文枬、袁希涛、姚明善、姚明辉、姚明腾设师范讲习所于西门内半径园。

项、曹、杨、贾四氏欲以所得沾溉于乡邦，谋诸姚文枬、袁希涛。希涛龙门书院生，宝山县举人，广方言馆中文教习，主办宝山县官立学堂，为宝山县众望所归。姚袁同意推进师范，合力筹措经费而设此所，取讲学形式，分门担任。项、曹、杨、贾四氏任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制度、教授法、心理学、伦理学，文枬任伦理学及中外历史，希涛任普通常识及中外历史，明辉任地理及博物、理化，明腾任算术，明善任学监、舍监兼体操，皆尽义务无脛。文枬、希涛号召邑中壮年前进塾师就所传习，集有五六十人，共一讲堂，一概住宿，膳食公备，杨保恒主持其事。藏修息游规定时间，全部按照新学堂的管理方

法。將旧塾師改造为新學堂之教育者，保恆以身作則甚尽力也。

屆半年畢業之期，參觀于各校，試教于二十二鋪小學堂，成績可觀。請上海縣知縣給凭，學員歸而就旧塾改為新學堂者，響瀉于鄉。頌聲既興，糧開兩廂，鄰縣陶風靡厥來集，三屠四捕推行益廣，近者蘇松太杭嘉湖，遠者皖贛閩粵。舉貢生監无所不有，至有五六十歲者，其或歸而又設新研習，轉領傳習，不可數紀。

至光緒三十一年，添設初等小學師範講習所于龍門精舍，以造就初等小學教育人材為主。又添設師範補習科夜課于蕊珠書院，專以補充本城旧學塾年老教師普通新常識。至光緒三十三年年終止，名籍列千數百人。

#### 十四、民立上海中學

一九〇四年甲辰（光緒三十年），邑人蘇本立、本炎、本銜、本浩設民立上海中學堂于新北門內邑廟東安仁里祖宅。

蘇氏之先有蘇升者，福建永定縣人，本立等其孫也，奉父遺命設此校，捐銀五千元開辦。本炎以外舅巨商營錫力助，經理其事，囑本銜為校長。本銜，約翰書院畢業生也。此校取職業師範、蔣英執業人材為主，近地就學學生甚多。至三十三年丁未，呈請道縣准撥大南門外山頂地七畝七分九厘三毫為校址。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年）校舍落成迁入。

#### 十五、女子初小及民立幼童學校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甲辰），女士朱程穎、叶蘇本清等

设初级小学于小南门内北城根。此校注重家庭生活，故与寻常小学小异。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女士苏曾泽新捐资创设私立幼童学校于高昌庙车道旁。此校于三十三年特建校舍、操场、秋千、草地、浴室，四周遍植花果。至辛亥革命时毁于兵火。泽新，本炎室，铸之女。

#### 十六、理科讲习所及理科专修学校

一九〇四年，公共租界河南路棋盘街科学仪器馆经理镇海虞含章设理科讲习所于科学仪器馆。此所延镇海钟观光独任讲授。观光每日上午讲授四小时，半年讲完物理、化学、人体生理、动植矿物，为理科专修之创。学员有蒋维乔、蓝公武、姚明辉等四十余人。续有其弟观诰(字衡斌)，开办理科专修学校于法租界宝昌路口。

#### 十七、女子中西医学堂及上海女医学校

一九〇四年，李平书设女子中西医学堂于公共租界派克路尚贤里。

粤人张竹君女医师为育贤女校授西医，因欠房租，处境窘迫。李平书援竹君，竹君感恩拜为义父。平书知医，欲通中西之卮，乃立此校。自授中医，聘女士授西医，且试办女医院。至宣统元年，在城南积谷仓码头建成上海医院，附建此校，名曰上海女医学校。

## 十八、广明小学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建筑业者川沙人杨斯盛就公共租界董盘路别墅设广明小学。斯盛字锦春,小名阿木。前一年顾次英、黄炎培、张志鹤以新场演讲案,往返日本及延请律师等费,皆出自锦春。彼等既归国,锦春招待于家,有侠客风。至是延次英、炎培、志鹤为此校,系浦东中学之前身。

## 十九、飞虹义务小学堂

一九〇四年,邑人陆鼎祥、陆鼎隆、陆家棣、钱绪林等,创设飞虹义务小学堂于闸北二十五保头图文监师路文昌阁。此校由陆鼎祥主办,公举邑绅王丰镐为总董,由县移拨文昌阁余地变价公款四千元充作常经费。校基七分八厘一毫,田单一纸稟县存案。不敷开支由王丰镐、王震、顾履桂、李厚佑、祝大椿、陈作霖、赵增焯、苏德镛、邵廷松、印有圭等十人每年各认捐银一百二十元。常经费由王丰镐存放生息支应。民国后利息无着,全恃收入学费,至十一年改归市立。

此文昌阁系咸丰末里董张砚香、顾兰亭、陈心广、陆茂功、陆聚功以售义渡田价购阁基而募捐公建。义渡在头坝,即今乍浦路桥处。此处于康熙十八年立头坝义渡口,两岸有代笠亭。咸丰十年庚申(一八六〇年)西商架木桥代之。

## 二十、建立初級师范学校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苏松太道袁树勋改龙门

书院为道立初级师范学校。

龙门书院在西南城南石驳岸，自光绪六年山长刘熙载去后，和州鲍源深继之。光绪十年易道安孙锦鸣，二十年易贵溪朱琛，二十四年易吴县吴大澂，二十八年易常熟翁斌孙。至三十年秋，易山阴汤寿潜，建议于树勋，禀准督抚，改为此校。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正月，巡道照会李钟珏、姚文榭为师范学堂董事，沈恩孚为代理监督，袁希涛为庶务长，叶量耘教授经学，夏曰璈教授算学，杨保恒任监学兼附属小学校主事。设本科一班，简易科理文各一班，就二十二铺小学堂改为附属小学。

此校新建教室为城内诸校冠，设有科学仪器室及操场、浴室等，为城内诸校倡。设备规章大体模仿日本成法，教科自修身、国文以至图画、唱歌、手工、游戏毕备。教员遴选城内外各学堂优秀分子分门兼任。脱科举习气，于旧学基础上展新学新知识，教文辞之空，补理科之实，精神焕发，气象一新，开通风气，颇收效果，一时为江浙新教育所取法。毕业生分布苏松太各县，成效甚著。至宣统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年）改称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年）改组为上海中学。

## 二十一、女子蚕业学堂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娄县人史家修集捐创办女子蚕业学堂于西门外斜桥桥南桂墅里。史家修字良材，泗泾人。此校至民国改省立，迁苏州浒墅关。



## 二十二、其余糖乡小学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徐文彬、王宝仑、周宗颐、尤秉彝等筹捐设立义务学堂于南门内麻袋公所;唐锡瑞、唐祖瀛创办漕溪小学堂于漕河泾镇城隍庙;黄宗坚、黄申锡等创办竹溪小学堂于北桥乡十六保四十二图;顾言、马扶群等创办荷溪小学堂于马桥乡荷巷桥;庞俊等创办筠西小学堂于三林乡二十四保方二图;谢锡祉、朱曰宣、瞿坤、陶鸿基创办都川小学堂于陆行东镇城隍庙;又创办三修小学堂于陆行金家桥镇三官堂;季鸿勋、瞿钺、朱炎集款创办求志小学堂于陆行张家桥。义务、筠西、求志后停办,漕溪、竹溪、荷溪民国年归乡立。

一九〇五年,群学会设义务小学堂于小南门内白粮仓,由会员陈庆尧、杨嘉椿、张其桐、王焕功等担任义务教课。张刚等设南区第一小学校于南门外芦席街海潮庵;朱鸿逵、朱启忻设正谊小学堂于北门内旧教场沉香阁;王遵善设十六铺小学堂于大东门外新码头里街;王培生设道前小学堂于东门内仁和里;吴县人施兆祥联合金业同人捐建校舍于闸北新闸桥西创办金业学堂,课程注重商业;王丰玉、顾镜清、蒋家凤创办安国小学堂于虹桥镇东安国寺;金士林、顾大刚创办江桥小学堂于江桥镇城隍庙;蒋庆和创办鹭湖小学堂于闵行乡二十一保五十四五图蒋祠;王锡珍、钮元晏、钮永昭等创办俞堂小学堂于马桥乡十八保十三图;徐绍元创办竞新小学堂于陈行乡塘口镇西市;沈元吉捐办懿德小学堂于三林乡二十四保三十一图;潘伟绩、刘志

涛创办洋泾小学堂于洋泾镇宝仁里，刘志涛又创办蒙养小学堂于浦东赖义渡。这些学校都是上海早期的新式学堂，为以后新教育的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 近代上海学术文化漫记

姚 明 焯

## 一、外国传教士

道咸间(一八五〇年前后)，英人伟烈亚力继麦都思后在上海主持墨海书馆翻译出版西方书籍。海宁李善兰字壬叔，于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来上海，与译续几何原本、谈天、代数、微积及重学、植物学等书，南汇周浦人贾少纬心九佐其校勘。伟系基督教牧师，英人也。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受耶稣教伦敦会之派遣，来到上海，从事印刷圣经的工作。时年三十二岁，其在伦敦，以研究中国语言与中国事务著名。来上海后，益研究德俄及满蒙语言。一八六一年为大英圣书公会驻华代理人，为推销圣经，行遍十七省。初，于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创立上海文理学会。翌年，改为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成为英国皇家亚洲文会之一支。名译文会，实即学会也，故或译为皇家亚细亚学会。其曰文会，殆以别于理科，重在社会科学。伟于此会，以吸引英之学人，研究北中国为务。伟歿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八十二岁。其于中国译书传学为多。

伟之后，有英人傅兰雅与美人林乐知。傅效力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最久，与徐寿主持格致书院，厥功既伟，而所著《格致

须知》，分类发蒙，启庸学人，推行理科，成效著。林于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由美国耶稣教监理会派来上海传教，时年二十五岁。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广方言馆初创，便膺教习。旋兼翻译馆事，历十有八年，至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而歇。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加入广学会，与英人李提摩太结驷连骑，驰骋译林。林乐知于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主编《教会新报》，由法租界八仙桥林华书院刊发，系星期周刊，期年而盛行。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之冬，林乐知已与某西人创译《字林日报》为中文版发行，名曰《上海新报》。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八月厘订体例，立政事、教务、中外、杂事、格致凡五目，而《申报》于是年二月二十三日创刊，林新主办的《上海新报》至是年十二月初二日停刊。至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九月五日改《教会新报》为《万国公报》。先一年，制造局翻译馆已创编《西国近事汇编》，为月刊，而林办的《万国公报》也为月刊，成为其克敌。此两种刊物，为其时考求时务者所敬资，然非渴嗜新知的知识分子以及科举末流腐臭之徒则不屑一顾。梯德以广方言馆旁继提案，得钦赐五品衔，进加四品衔。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林乐知欣赏日俄之战，撰《总论中华时局》一文，竟鼓吹划分势力范围，猖狂至此。先后三十余年之内，《万国公报》除林、李大作外，所载艾约瑟、韦廉臣、魏孝文、丁韪良、花之安、慕维廉、李佳白等人的论文，竭牧师之渊藪，耸朝野之听闻。当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一年）《万国公报》初定体例时，其宗旨是宣传东西各国有关地理、历史、文明、政事、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切进步知识。

该刊物之文章虽颇有学术内容，但主要不外政论意识。林纾其一生于此推，至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而死，年六十二。林又曾于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兼办一种月刊，名《中西教会报》（由同文书会出资），旨在推广耶稣教务。属文书会者，赫德与怡和洋行及其他洋行、领事、教士所组织，亦侵略中国之一大本营。

虽林乐知而名重一时者，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于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受英国浸礼会差会派遣来华传教。到上海后，被派往烟台，后又转至青州。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至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间，身穿清廷之衣，头戴假发之髻，参与赌务，结识官场，先后游说山东巡抚丁宝楨、山西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策动听，深受器重。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到上海任同文书会（一八九四年更名为广学会）总干事。广学会者，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李提摩太与李康臣诸教士所为。组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及怡和洋行经理与外国领事、耶稣教牧师为一团体，以文字证道为号召。纠林乐知而相与搦幟，聘蔡尔庸而工其译笔，宣传殖民主义之优，奴化政策之美，冀于中国起其作用，意将英伦奉为家邦。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夏，开译英人马恩西之《十九世纪大事记》，一八九四年之秋译讫，名曰《泰西新史摘要》。一八九五年五月印成，李提摩太序曰，“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岸筏，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乏之宝玉，而中华新度界之初槌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百所可比而拟也。”又云，“五大洲各国共合男女一千五百兆人，受治于新世教者九百

餘兆。全地球陆地共合华程五百餘兆方里，为救世教所辖者四百二十兆方里。”又云：“英国马恩西先生所著《十九世纪大事记》，诚新史而兼明镜之资也。中国服官之众，读书之士，若欲博考西学，振兴中土，得此入门之秘钥，于以知西国之所以兴，与夫利弊之所在，以华事相印证，若者宜法，若者宜戒，则于治国读书之道，思过半矣。”又云：“劝令宦途士林中人，尽读新书以兴中国。请皇上降旨，凡学院考取生童，主考总裁取中举人进士，必就西史命题条对，如生童考经古及乡会试第三场策问之类，必其洞晰无遗，始克题名各榜。请皇上降旨，天潢诸贵胄与夫翰苑中人，均取是书悉心考核，以为先路之导，然后遴选年在四十岁以内者，令其游学各西国，肄习新法，期以数年，学成回国，量才擢用。果其二法可行，仆敢保有益于中国之万法，必皆由是而生，是一国备万国之善也。”此书于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由广学会出版，恰在中日战事结束之际，朝野兢兢，渴哺新知，多士梦醒，孜孜广求，故书不胫而行。

李提摩太名登学府，而蔡尔康附骥以驰。蔡，上海虞生，文辞丰沛流利。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四年（光绪九至十年）间，执笔于《字林沪报》。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加入林乐知《万国公报》等译笔，操此生涯，不列顽固，文章传诵，亦号新流。与姚文栋生同里闾，常共研求，缔总角之交，结金兰之好。《泰西新史撷要》译讫，会姚历东西两洋十二年而归，蔡氏将稿乞序。姚文栋谓：林、李政客，居心叵测，此书供一偏之见，驶政论之风，欧洲情形不尽如此。世界潮流素有变迁，政客各持

异见，政局多度翻新。此书撰自英人，不知其属何党，全部独洋英国，耀其富强，而盛夸英伦治理印度之德政，竟谓印民二百五十兆，英悉教登彼岸不再沉沦。李提摩太得毋借此为怀柔中华之计？文栋复谓国际政客恒羨哥伦布、克雷飞之奇迹，谆告蔡氏，勿堕迷魂之阵。蔡氏因而蓄敛深藏，不务标榜。

甲午之前，新书极希，饥者易为食而渴者易为饮。梁启超初出茅庐，撰《西学书目表》，品《泰西新史揽要》为第一等书。启蒙时期麻醉无际，新学少年尊如圣笈，殆梦大英恍若天国。此上海广学会之学风，实开二十世纪政党之阶。资本帝国萦人脑际，庸讷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已起于星星。李提摩太犹自豪为开化中国，肆其野心，事不胜举。第撮山西一桩，已可概见。缘拳后议和，李提摩太插身调停，居功勒索，乃有许将山西赔款五十万两给李办理中西大学堂一节。李乃总办中国广学会，兼办山西耶稣教案事，与清廷山西巡抚互订合同，而山西全省之教育权以至考试权归李总揽，意图夷山西为英之半殖民地，且欲于大学堂首列道学斋，授神学而传基督教。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之春，率群教士至于太原，通过洋务局总办沈敦和而要挟山西巡抚岑春煊，不谓遭遇姚文栋，姚时督办山西全省学务，坚强拒斥。李愿不遂，铩羽而返，而以所勒巨款糜于广学会，厉行其殖民主义思想之宣传。然而中国自办之学堂兴起，日本之东风吹入，长江后浪催前浪，气候迭变，及夫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广学会气焰已衰，上海开岭上之梅，邪风就黯。要之，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啻台风之起于上海也。

## 二、天主教学风

徐家汇天主教学风，自成一帜，罕流于外界。神父修士之学，来源深远，有其奥蕴，译自法文以至拉丁及夫前修著述，报章杂志，盈篇累牍，亦汗牛而充栋，明体达用，皆广博而精微。究太罗马之真，埃及希腊之古，足资考镜，可供研求，亦上海一学府，为全国所取材。其藏书楼创于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收罗之富，与年俱积。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计西文书籍凡八万册，其中希腊、拉丁、英、法、德、意古本甚多。中文书凡十二万册，其中地方志有一千六百多部，一万九千余册。又有金石拓本、古钱以及积年报纸、期刊、杂志，舍耶稣会、修士院、大修院、小修院、天文台、博物院、徐汇公学、徐汇师范等等各部分内图书之馆而总计之，凡三十万册，于上海市内为最富矣。

徐汇公学创于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为上海最先之学堂。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壬申），马良任校长。良时年三十外，生长徐汇之区，汇通中西之学，得跻神父之阶。熟读孟子，精研拉丁，亦上海学人之一帜。其后发起震旦，手创复旦，演说风行，气流社会，影响政治，衍为一派，学界风气，为之生色，盖天主教院之所孕育也。同光之际，见其头角，时则有乃弟建忠，后则有李秋其人，皆天主教会所孕育。教内神父院士，率精修勤学，自成林藪，有足多者。若天文台，若博物院，若工艺厂，皆成绩可观，而虔诚传教，固其本份也。惟掌握于法人，而灌输殖民奴化之魔功，致教徒若忘遗祖国，学



徒亦崇拜外方。如马良之矢志爱国，培育人材，诚卓然不群者矣。

### 三、三个不进秀才

同光间，上海城内庠序中人有“三个不进秀才”之讥，谓其懈于帖括，无志上进也。三秀才者，一曰祁兆熙，二曰张焕纶，三曰姚文栋，皆涉猎新书，留心时务，有志经世，无意举业，不囿旧域，博求远方者。祁兆熙年较长，咸丰九年以第一名入上海庠，博习多才，专攻洋务，出山问世，例仕筮粤，以同知署惠州府碣石通判，长袖善舞，脱颀而出。历办督署洋务，辑通商条约洋务成案，与香港英官妥定中国电局事宜，及查洋面缉私船之扰，解廉州常洋关之争，皆其功绩之萃萃大端。尽职积劳，歿于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辛卯）。初，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甲戌），政府派遣第三批幼童唐绍仪、梁如浩等肄业美国，南北洋大臣委兆熙护送，兆熙并挈次子祖彝往。祖彝年才十二，为邑人出洋留学最先者，毕业美国耶鲁大学，光绪季年曾署奉天东边海关兵备道。

张焕纶同治五年入洋，主求忠书院舆地斋课垂三十年，创梅溪书院而终老于斯。虽曾应台湾巡抚邵友濂之招，往受委职，而邵去即行，不求住进，孜孜办学，多邦矜式，新法教学，共佩先知。

姚文栋祖籍上海，世居西城，生于小刀会起义之前岁（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长于太平天国争取上海之时。十五岁入洋。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丙寅）起，先后肄业敬业、龙门、姑

经、求志等书院冯、钟、刘、俞之门。弱冠从宦浙江，未几丁忧归里，侨居嘉定，潜心治学，博览新书，详稽时务，长于掌故，尤专輿地。其学术本源，具见所辑著《东吴学会十六种》、《春明十二种》及《梓里文编》、《练祁文编》、《苏园杂著》。光绪初年，伊犁、缅甸、南越、台琉边隅多故，交涉方殷，文栋之《筹边九论》，官鼓声闻，朝臣击节，爰应征辟，筮仕出山，从使于日本。壬午一电，维东亚之苟安，兵要诸书，呈译署而印布，日本传黄姚之誉，星轺称杰出之才。在东六载（一八八二——一八八七年）绩具《东槎杂著三十种》。丁亥之冬（一八八七年）奉调欧洲德俄，译著有《泰西政要》、《国别地理》、《海西文编》等八种。庚辛之交，奉委调查印緬商务，查勘滇緬界址，在滇三载（一八九一——一八九三年），事具《云南勘界筹边记》等二十二种。乙未（一八九五年）防倭于台岛。庚子（一九〇〇年）筹策于春明，北洋佐幕，帝座垂青。后不克驻美公使，不应经济特科，不列袁世凯僚属。在山西五载（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六年）拒广学会之文化侵略，弭福公司之盗矿阴谋。旋疾袁奸当国，息影林泉，勤劳乡里，商山终老，七十八岁而歿（一九二九年）。遗著《七庆堂全书》，现存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

当癸巳（一八九三年）、甲午（一八九四年）之交，文栋由滇归沪，道出汉皋，张之洞留住度岁，从容讨论大政方针，谓仍宜以经学为大本，盍纠集经学湛深之通儒出洋观察，派遣学有根底之少年出洋求学，以期老少合作，中外通邮，固国本而广集世界之长，庶乎体用兼赅。文栋归里，言于俞樾，俞氏意合，乃邀约华葵顾莲、张锡恭、钱同寿、闵萃祥，嘉定黄宗起、宋

道南、周保障、黄世荣，太镇王祖裔，南汇于鬯，上海李邦绶、叶景沄，吴县沈恩孚等，发起经学会以为之先。

文栋致诸氏书札，有云：“西洋富强，由于举国之人无人不学，故其人材强；无人不兵，故其兵力强；尽力于农，使地无遗利；尽心于工，使人无游手；商以运之，使物无弃材；积一国之勤俭，以成其富强。凡其有得于教养二字者，皆符我国六经之绪。”又云：“养民之政，足兵之谋，考求犹易，转贫弱为富强，亦非甚难事，独是人心向外，地无论朝野，人无论官绅，甘为外人效用而反以噬中国者，何可胜数。乃至世家子弟，要路公卿，亦不能识食毛践土为何义，此则中国目前之大患，而不振之枢机，系教化不明之所致。今西洋所称善政，多暗与经合。其治事之要，在于实事求是，此即中国治经者之家法，古人通经致用之说，于此益信。即欲以西法变中法，实则西政西学之善者，经术足以容之，何如以经变俗。”又云：“士大夫惟当昌明正学，以维持风化为任，庶足以挽末流之失。但空言说理，不如实学穷经。鄙意欲合中国经生为一会，所冀当代通儒硕彦，在郡为一郡提倡，在邑为一邑提倡，在京师首善之区，即为天下提倡，俾万方共贯，一道同风，将见明体达用之材出乎其中，而移风易俗之效亦即著乎其后。仆在海西，译辑《泰西政要》一书，知西政之善者，皆符六经之绪。惟其工政一门，既详且精，允足补冬官之阙。然政教修明，必道与艺相资。苟合天下群儒，殚其心力，亦可以临照万国。”

甲午(一八九四年)、乙未(一八九五年)之间，月会于南翔，闻风景从者，有宝山袁希涛，南汇顾次英，上海王纳善等。少年

之歆慕兴起者，有川沙黄炎培，嘉定黄守恆，守孚，上海王植善等。老少数十人，订有简章，录有纪载，编有学报，而邑之庠序中人渐知昔之所见不进之为进也。此会以经学而扩新知，表政见，开风气于松娄，盖承十九世纪之来脉，而导二十世纪之先河。

会钱塘进士汪康年往来京沪，酝酿强学会，南海进士康有为偶来沪上，邀人发起。文栋谓志士发愤图强，亦类西国政党，惟诸发起人未出国门而放言高论，不无指盘扞烛之虞。况处今日之世界，政事前途，非可闭门造车刻舟求剑，因受邀而不署名。经学会不务标榜，讨论浹年。张之洞署两江总督而属意焉，谓治本治标不相矛盾，可与强学会并行不悖，为备函致翁同龢，翁以集众立会触时忌，搁置。未几，强学会被参封禁。此经学会虽局限于淞浏，然给本乡知识分子留一印象，突破昔时沉沉之气，渐开后期荡荡之风。惟自戊戌（一八九八年）而后，同新旧之争，此会之名似属于旧。其实不然，盖托经而维新，旨在导祖国之源而扬世界之波，固民族之本，而汇众流之长，仗教化之力而策政事之进，比诸强学会，尤为属于改良主义。从而龙门书院乃弟文栋与叶景云、项文瑞、沈恩孚、赵履福、袁希涛、夏田嫩等，弛理学之窠臼，掘新学之蒙泉，键举业之宿廩，栽教育之秧田，又领导上海学术风气起一转变。文栋之学术思想，自一八六六至一九二六年，六十年间应时而舒者，有传略及遗著详目，可考一斑。

#### 四、教会学堂

十九世纪之时，书院之朴学方兴，教会之学堂已起。俄国

天主教耶穌會之徐匯公學，創于一八四九年（道光二十九年），美國耶穌教長老會之清心書院，創于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其後，法國天主教耶穌會之徐匯女學，創于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美國耶穌教聖公會之聖約翰書院，創于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聖瑪利亞女書院，創于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美國監理公會之中西書院，創于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上海耶穌教徒曹錫慶等之中國青年會學堂，創于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而英國倫敦會福音堂有麥特赫斯之中西公學，天安堂有慕維廉之曉德學堂，美國南浸會自理堂有晏馬太之明德學堂，安息會之安息浸理堂有惠中學堂，聖公會之聖彼德堂有培德學堂。又如聖公會之天恩堂、救主堂，基督會之基督會堂，皆設有男女學堂，似皆創于十九世紀，不知其年。又若法國天主教聖母會之聖芳濟學堂在虹口南潯路，聖母無原罪公塾在董家渡，德恩小學在徐家匯，皆不知其年代。

舉凡教會學堂，天主耶穌既各異其途，聖公監理又各宗其旨。英美之氣味略同，中西之情形有別，其學術風氣，于斯時為創。存心开通民智，洗滌夜郎之陋，良有裨益，但生徒或乃厭視祖國，誦喊往昔，倚附洋商買辦，迷醉物議金錢，孕育洋奴，甘心賣國，則其偏差之所致，非必教育之本心，惟是文化侵略之源头不能恕，迷信外國之妄念种于斯。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美國聖公會教士施約瑟創設聖約翰書院于梵皇渡。初則編譯中文，滲透教義，後乃添授西學，經華盛頓注冊許為大學，開文、理、律、醫、土木等科，并授予博士等學位。后卜舛濟任校長，自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三〇年，凡四十三年，將

秧于十九世纪，繁荣于二十世纪。而毕业高材，扬名社会，若黄佐庭、曹福庚、曹锡庚、施肇基、颜惠庆、颜德庆、颜志庆、吴任之、顾维钧辈，政商称雄，工航擅技，学成于美，不可胜数。光绪二十五、六年间，曹锡庚创青年会而后，社会风俗流泽益广。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圣公会又设圣玛利亚女书院于梵皇渡，整齐教徒之家庭，繁衍益广。

福开森，美国自然科学之博士也。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既营新闻报之业，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黄缘得南洋公学监院，尸位有年，孜孜为利，未成学派。南洋风波迭起，横溢而开新社会，入于二十世纪矣。

又有美国教士范约翰者，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即小刀会起义之前一年，已与中国人黄文澜设清心书院于大南门外陆家浜之桑园街。有男女两部，施耶教教育，孵耶稣教徒。越三年，为咸丰五年，即小刀会撤退之年，就清心书院设立北长老会清心堂。又越二十三年，为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与美国人麦特设圣教书会于圆明园路二十三号。又越十二年，为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与中国人鄞县俞国楨立北长老会长老会堂于闸北宝通路，谓系中国所自立，不涉国际问题，其后中国有自理之教会自此始。

## 五、新闻报纸

长洲附生王韬，字紫诠，晚号天南遁叟，又号弢园老民。咸丰中就墨海书馆编辑事，与伟烈亚力译撰《六合丛谈》，发行于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实为上海报类之先声。其后，一八

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十一月，香港字林洋行出《上海新报》，由西人伍德、林乐知主笔，为华文报纸之创始。

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同治十一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英教士美查创《申报》。其创刊号之告白云：“新闻纸之制，创自西人，传于中土。向见香港唐字新闻，体例甚善，今仿其意，设申报于上海。”

继《申报》之后，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五月，国人容闳发起《汇报》，意欲挽回报权，与《申报》对立而不克。俛为《汇报》，俛为《益报》，闰统再三，流产于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六月。其明年(一八七六年)十月初八日，有《新报》出焉，名为商帮所办，实则道库出钱，盖系冯峻光之事。乃不投俗好，销数无多，官款维持，亦越六载，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并入制造局之翻译馆。

于时则有《沪报》焉，系香港字林报之主笔西人巴尔福藉前新报之器而为之，延蔡尔康为主笔，创刊于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四月初二日)。此报之名曰沪，较申报之取名为合。《沪报》出而远方人士又知上海为沪，较申为符。《沪报》享年十八，至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卖与日本侵略中国的组织东亚同文会，改名《同文沪报》。

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西人又创《新闻报》，该报出版于正月，后归美人福开森。福聘邑人汪汉溪为总理，经营得法，与《申报》并峙，号称申新两大报。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席氏买得《申报》，投资七万五千元。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福开森将《新闻报》卖与华商，计本一百二十万元。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汪康年等组织强学会分会于上海,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版《强学报》,旨在倡维新之论,开政党之门,空气一变,震动学林。翌年二月,触忌遽停,然其影响广大。邑人若蔡尔康,品学高洁,鹤立鸡群。又有诸生黄式权,字梦曦,曾逮事南汇张文虎,光绪中主申撰笔政久,诗文风雅。皆惟糊口于外人之篱下,志在求食,不足当于学术政治。至汪康年、康有为,始学与报合,报与政结,发挥政见,面貌一新。

邑人葛士浚,于光绪初年,辑行《经世文续编》,辟洋务一门,独具只眼,盖渐趋于通今。至强学会起,突变而一新。接出《时务报》,又突变而一新。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新会举人梁启超主编之《时务报》第一册发行于七月初一日,少年喜阅,始立新旧之异标。嗣后维新运动,奋发于斯。浏览江浙志士,麇聚于上海之租界,别开生面,蔚成风气。荏苒年余,康汪齟齬,至于决裂,汪康年另组《时务日报》,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闰三月十五日开报发行。至六月二十九日,改为《中外日报》。此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爱好者举以振聋发聩,推与申新鼎足而三。康梁远遁,康年屹然,愤世嫉俗,著论发挥,惟党阉而视异,或偏激而过情。发行十年,于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卖给上海道蔡钧而告终。

自康梁出国而有所谓保皇之党、革命之党,与夫立宪民主之论。戊戌而后,邑人之首先卷入旋涡者,有举人程承燾、附生王植善。庚子而后,波浪翻天,潮流覆地,划入于二十世纪



矣。

戊戌政变前后，有经学会之《经学报》，算学会之《算学报》，又有《数学报》、《农学报》、《艺学报》、《昌言报》，皆发行于上海，五光十色，满目琳琅。惟都系期刊，不是日报，要皆革新启蒙时代之良药。若夫光绪初年后耶稣教会之《画图新报》等，种类不一，亦有益于学术。光绪十三年，徐家汇天主教设圣心报馆，月刊一册，以传扬天主教化为旨，又一类也。

又若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皆有上海日报，欲考外侨风气，亦可取资。至于飞云阁、飞影阁之画报，当时闻里小知，供人悦目。今日采风问俗，宝若汤盘。又著坊间印行年历所附之《日用便览》，登载上海交通、物价、行业牌号等等。海关历年贸易册中江海关之报告，详叙上海商品进出口及工厂兴衰、物价涨落、市面情形，以至附近邻邑农田丰歉、产物盈虚、宦绅疏事、社会经济，等等，皆具年报性质。苟排比逻辑，研究推详，实上海乡土史之基础材料。当时乡试之会试闹墨，仍间年一出，万帙倾销，生员薰生，争先快睹，书斋供奉，比户摩挲，显显科举正统之风气，十九世纪之末犹然。展夏清貽之庚子《金陵卖书记》，秀才冬烘，可资喷饭。

# 上海格致书院和中西书院

李 遵 光

## 一、格致书院

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沿用《大学》格物致知之义，始创格致书院。傅兰雅创议之始在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那时中国士子尚在八股文章、试帖诗赋时代，仅一传教士不足以动中国人心，他便推出英国领事麦特赫斯脱(W.H. Medhurst 亦译麦都司)及中国官僚王锦堂、唐景星为之首议，又联络士子徐雪村等为吹嘘。当时曾发一联四偈六的公启，宣传上自天文舆地，下至一草一木，皆将洞彻其精微本末，钩深索奥，剖析毫芒，并夸张英国蒸汽运千钧，电力达万里，系球可升天，泳钟可入海。当时无不叹为神奇。

一八七五年议定格致书院章程六条，并发往各国，以为号召。大略如下，

一、设格致书院宗旨。为使中国人通晓西国学问、工艺与造成之物。办法分为三项：(甲)立博物房，(乙)立格致房，讲论格致学说；(丙)储备各种书籍。

二、管理格致书院之法。设董事八人，中英各四人，另在伦敦请若干人为董事，办理在外国事务。

三、筹措格致书院用款。本院旨在自立，但创办之初，须

购地造房，购买各种书籍、格致器具与各种日用品，需款浩繁，不能不藉中英两国官绅捐助。备中英捐册各一，收受捐款。初期来学者不收学费，以后捐款不足时酌收学费。

四、博物房中设英国各种机器，由传教士向英国各大公司声请捐助。

五、格致堂中，讲明格致原理，临时延请通人。

六、储书房中，筹设各种书籍。有中国经、史、子、集各种，惟不备传教书籍。

当时并无院址，以上六条规则专为号召募集捐款之用。一八七四年英国捐簿共收到九百八十两，中国捐簿至八月间收到一千六百两，当由徐雪村具呈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李瀚章请求开办。同年十月，捐款增至三千两，一八七五年正月增至五千两。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创建书院于英租界四马路元芳花园北首。大门署“格致书院”四字，款署“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书”。李鸿章又书一联云：“声教遍中西，六寓同文宜雅化；弦诵宜春夏，四方专对裕通材。”又由吴县鼎甲冯景亭书联云：“九邱能读是良史；一物不知非通儒。”均悬于格致堂内，于是格致书院声名大振。

曾详订院章十五条：

一、本院定名格致书院。

二、立院本旨期中国绅商深通外国情事，更敦和好。

三、此院设在租界以内。

四、设院经费均由中西人士捐助，现存一千五百元。

五、凡士商来此读书，每月纳洋半元。

六、院内现以百人为限。

七、院内均用中国土商，惟延请专家西人不在此例。凡倡捐者，随时可来参观。

八、院内设董事五至七人。

九、院内备各省新闻和西译，中国经、史、子、集用中文者，并设天球、地球及各种仪器。

十、院内设一人专管书籍，不准携出。

十一、院内不许嘈杂。

十二、本院随时延请西人讲解仪器。

十三、院内不许游戏、赌博。

十四、院内每日预备烟茶。

十五、院门早十时开放，晚七时关闭。

同年即请定董事，外人为麦都司、虞昌行生福辟士、伟烈亚力、傅兰亚共四人，华人为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徐雪村、王荣和等。在伦敦请有董事若干人，办理外国事务。

徐雪村照以上情形分呈直隶总督李鸿章及两江总督李瀚章。李中堂即飭津海关道拨聘并税项下银一千两，李制军飭上海沈道拨银千两，冯兵备道捐银二千两。土商捐款者亦甚多。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格致书院第一次招收学生。

当时议定因院址宏敞，一半建造博物院，存储各种仪器机械，供学生观览研究；一半建造学生宿舍。议定收受学生分两班，一班学习西语文字者，每年纳学费四十两，由院供给膳宿；一班讲求格致实学者，先缴银三百两，三年学成，原银领回，若中途退学，原银充公项。

该院后因中西董事意见分歧，加上经济困难，于一九〇〇年停办。

## 二、中西书院

中西书院由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于一八八一年创办。在这之前，当时上海有道台设立的敬业书院，上海县设立的蕊珠书院，应方伯设立的龙门书院，冯观察兼制造局总办设立的求志书院，施约翰教士在梵皇庙设立的圣约翰书院，汤葛礼教士在西门外设立的监督会书院，林乐知认为这些书院或偏重中文，或偏重西学，均非完善，乃建议创立中西书院，课程以中西学并重。

地址拟在上海洋泾浜。学生半日读西学，半日读儒书，除学习中国经史文艺外，还学习天文、舆地、格致、理化、数学、数学，均延中西名师教授。又仿照泰西学校办法，先立初级分院两所，一在虹口，一在八仙桥，均在一八八一年落成，一八八二年正式开学。规定学生在分院学习两年，然后升入总院学习四年，如愿深造仍可留院学习两年。当时中国需材孔亟，学成可分拨各处备办洋务之用。学生宿数与否，悉随自愿，决不勉强。他还令其女斐丽在院内分设女塾。美丽精通各国语言文字，兼通华文，又精女红。女生半日学习西文，半日学习西法针黹。男生八年的课程分配为：第一年，识字、浅解词句、讲浅近书籍；第二年，练习文法、学西语、学翻译；第三年，数学启蒙、各国地理、学翻译；第四年，代数、格致、翻译书信；第五年，天文、勾股算法、平三角、弧三角；第六年，化学、重

学、微积分、讲性理、翻译书籍；第七年，航海测量、万国公法，译书作文；第八年，富国策、天文测量、舆地、金石类考、译书作文。

一八八二年两分院招考，录取学生四百余名，尚有外埠多人应考，因分院宿舍不敷应用，不能录取。录取学生中有粤籍学生多名，语言不通，乃在虹口分院请罗文耀牧师为正教习，浙江曹子实为副教习，后又请粤籍冯湘如为正教习，梁小田为副教习。

林乐知在募捐小启中，极力说明中西学并重的旨趣，谓如中学不通，决不能翻译西学书籍。又说两分院已招生四百余人，尚在沪西购地四十亩，拟建总院，共分八斋，已蒙西国拨来巨款，并拟请西方学者教授各种学科，如天文、舆地、军政、船政、律例、火器制造、矿物、化学、电学诸法。仅西国拨款不敷应用，尚祈中国官绅多方劝募，直隶总督李鸿章、唐景星深为嘉许，允为竭力募捐，即蒙苏松太兵备道首先倡捐百元云云。

是时正值中国力倡新学，李鸿章奏设新学堂，沈总督奏设特科，王巡抚奏设储材馆，国家在北京、广州各立同文馆，福建、上海均立船政局，南北洋又有水师学堂。林乐知辞去广方言馆教职，专办中西书院教务。两分院学生两年学满，又将上海虹口昆山路第二分院扩充，购地三十三亩余，建成总院，将两院学生归并总院。

书院制定院规十八条，大意是：本院兼课中西两学，入学放假照中西通例；学生暂以一百二十人为率，不论年岁、籍贯，入院

一年后方准正式纳为学生，学生学费每年二十四元，全日专西学五十元，半日专西学三十元，学生中学书籍自备，西学书籍由本院代买，收回原价；学生非疾病要事不得请假，作辍不遵院规者除名；院内宿舍十余间，专供远方学生，不遵院规者逐出；住房费每人每年六元，房间由院派定，不准搬迁，门窗损坏要赔偿；本院设食堂，学生每人每月二元，仅午餐者一元；雇役学生每人每月出洋三角，等等。

中西书院名为中国造就人才，实则学科中仅英语、算术两门较重视。英语便于翻译西方书籍，算术为计算的基础，其他学科皆浅近皮毛，并无循序渐进的系统课程。其时各科尚无教本，教习亦无通才，西人却藉此机会吹嘘本国的经济富强，政治昌明，文化进步，生活富裕，使学生仅知有英美，不复知有中国。

# 上海广方言馆史略

熊月之

上海广方言馆，是晚清仅次于京师同文馆的以学习外语为主、兼习其他西学的新式学校，历时四十二年，培养了一大批外交、翻译、教育和科技人才，在中国近代外交、教育、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 一、创办缘起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资本主义侵略者强行打开了。先是五口通商，继而十六口通商，开辟租界，内地传教，公使驻京，订约修约……，日益纷繁的中外交涉，向中国提出了培养多种方面外交人才的要求。同时，在抵抗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在与外国人的往来交涉中，一些讲求实际的中国人也逐步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远比中国先进，油然而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想法。要“师夷”、“制夷”，先得“知夷”。知夷，首先要懂得外国语言文字。办理交涉、学习西方的时代使命，把开办外语学校的问题现实地提到人们的面前。

一八五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咸丰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正式向咸丰皇帝提出开设外国语言文字学校的意



见。他说，中外交兵议款二十年来，中国情形虚实，外国“皆所周知”，可是对于外国呢，中国竟“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他认为这种状况很不正常，甚至是一种倒退，因为康熙时候，还派人与俄国互习文字，设法了解外国情况。他建议朝廷：飭令两广、两江督臣、黑龙江将军和库伦办事大臣，从其所辖之地，推求通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资送入京，给之薪米，“使转相传习，亦可以推考诸夷嗜好忌讳”<sup>①</sup>。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建立外语学校的主张。

疏上，无下文。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之际，朝廷可能也无心无暇计及此事。两年后，奕訢、桂良、文祥等提出同样意见。他们奏请飭广东、上海各派两名通晓英、法文字语言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学习外文。咸丰皇帝谕准。后因教习乏人，未即举办。同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的《采西学议》中也提出，宜在广东、上海设翻译公所，选颖悟文童，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这是第一次提出在京师以外的地方开办外语学校。

从郭嵩焘、奕訢，到冯桂芬，在短短的两三年中，都提出了开办外语学校的意见。他们主张开办的地点虽有不同，但其实质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开办外语学校的重要性、必要性，已为一些人包括统治集团上层个别人物所认识。

---

<sup>①</sup> 《四国新报》，英国档下，第八五四页。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八六二年六月十一日，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总理衙门从各旗陆续送京的学生中挑定十人，延师教习英文，兼习汉语。以后学校规模、学生人数、外语种类、学习课程迭有扩增。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成立以前，已有在上海等地设立外语学校的议论，京师既首创于前，上海便继踵于后了。一八六三年三月十一日（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江苏巡抚李鸿章正式向朝廷提出在上海设立外语学校的意见。他委托幕僚冯桂芬代拟了一份《奏请设立上海学馆》的折稿，<sup>①</sup>详述了在上海开设外语学校的必要性，提出了具体设想。

李鸿章列举了在上海开设外语学馆的必要性，综合起来，有以下四点：第一，设立外语学馆是研究外国的需要。中国与洋人交涉，“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外国人之习中国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甚至能读中国经史，于中国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士绅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第二，设立外语学馆是在上海与洋人交涉的需要。在上海，各国均设立翻译官两员，遇中外大臣会审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欲绝此弊，只有中国自己培养外语人才。第三，原有通事不可靠，必须自己新育人才。此前，中国能通洋语者，

---

<sup>①</sup> 冯桂芬草拟了折稿，李鸿章作了很大修改，特别是对学生毕业以后的工作分配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这只要对照一下冯桂芬的《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与李鸿章的奏稿便可看出。李鸿章奏稿，见《广方言馆全案》第一——三页。

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但是这些人很靠不住，而且时常误事：“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通事为遁逃藪；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学，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肆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淫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且其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兵刑食货，张弛治忽之大槩焉无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词气轻重缓急往往失其本指。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第四，京师虽已设同文馆，上海仍有再设外语学馆的必要。因为“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东两口为最，种类较多，书籍较富，见闻较广。语言文字之粗者，一教习已足，其精者务在博采周咨，集思广益，非求之上海、广东不可”。

李鸿章奏请朝廷，“仿照同文馆之例，于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他对学生来源、学习课程、毕业待遇、经费开支等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学生来源，选近郡十四岁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李鸿章特别指出，京师同文馆专收八旗子弟，上海则不能完全照搬，“唯多途以取之，随地以求之，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人数既多，人才斯出”。学习课程，聘西人教习外语，兼聘内地举贡生员课以经史文艺。学生学成后送督抚考验，“作为该县附学生，准其应试”，凡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应添设翻译官，即于学馆中遴选。经费由船钞项下提用。

折上，朝廷很快批准<sup>①</sup>，并要广东也仿例照办。不久，上海广方言馆破土兴建。

## 二、沿革与规制

叙述沿革之前，先将上海广方言馆名称演变情况交代一下。

上海广方言馆最初拟名似乎是“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此名始见于李鸿章请设上海学馆的奏稿中。其后，在冯桂芬拟订的试办章程中，正式定名为上海“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简称“上海同文馆”。此名用了四五年时间，后改“上海广方言馆”。具体何时正式改定，难以确知。一八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同治六年三月初十），负责上海同文馆的江海关道应宝时在给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的呈文中，仍只称“上海学馆”而未用“上海广方言馆”之名，同年总理衙门在奏折中亦仍称“上海同文馆”，到了这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应宝时给曾国藩等人的呈文中已称“伏查上海广方言馆肄业诸生”如何如何<sup>②</sup>。同治八年十月江海关道涂宗瀛在给南洋通商大臣马新贻的呈文中特加附注：“原名同文馆改为广方言馆”<sup>③</sup>。由此推断，上海同文馆易名为上海广方言馆可能就在同治六年三月至十月之间。

同文馆之名始见于《宋史》，原是招待藩属国家贡使的处所。

---

<sup>①</sup> 批准日期为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距李鸿章奏请之日仅十七天。

<sup>②③</sup> 《广方言馆全案》，第十三页。

清廷将京师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校定名为同文馆，不无唯我天朝独尊之意。至于把英、法等外国语言文字叫作“方言”，把学习这种语言文字的学校定名“广方言馆”，其天朝老大的意味就更为明显。李鸿章、冯桂芬原拟“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之名不用，而取“上海同文馆”之名，可能既是为了与京师同文馆之名相一致，也是为了满足一般士大夫天朝独尊的虚骄心理。其后易名“广方言馆”，在含义上与同文馆并无二致，读起来还不及“同文馆”顺口，可能仅是为了与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名称有别而已。

上海广方言馆最初设在上海城内旧学宫后，敬业书院之西，由上海县儒学教谕章安行择地购料，负责筹办。据时人记载，学馆建筑“楼阁房廊，制极宏敞”<sup>①</sup>。堂中有李鸿章、冯桂芬所书对联。李联是：“声教遍中西，六寓同文宣雅化；诵弦宜春夏，四方专对裕通材”。冯联是：“九邱能读是良史；一物不知非通儒”<sup>②</sup>。

广方言馆开办六年之后，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十月，江海关道涂宗瀛禀准南洋通商大臣，将广方言馆移入江南机器制造局。理由是：“现在机器制造局开设学堂，译习外国书籍，与广方言馆事属相类，自应归并一处，以期一气贯串”<sup>③</sup>。学馆新址在江南制造局西北隅。同治八年十二月建筑竣工，计楼房、平房共八座七十四间，楼上二十四间为翻译馆，楼下及平房五

① 王韬：《瀛域杂志》，卷三，第二页。

② 《上海格致书院造成》，《万国公报》第三七八卷。

③ 《广方言馆全案》，第十三页。

十间为广方言馆，另有厨房三间，小屋两间。时人记述其景：“馆在南门外制造局旁，重楼杰阁。门外种竹万余竿，浓荫夹道，幽雅宜人”<sup>①</sup>。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正月底，广方言馆迁至新址，旧址房屋并入了毗邻的敬业书院。

一八九九年，南洋通商大臣拟将广方言馆与江南制造局之炮队营并入新创立的工艺学堂，负责广方言馆的制造局总办林志道不同意，认为“广方言馆经费向由沪道报销，与职局无涉，若勉强牵合，反生枝节”。<sup>②</sup>此事遂寝。同年，制造局反而把工艺学堂附属广方言馆。工艺学堂专门造就制造人才，内分机器、化学两馆，学生各二十人，内有原制造局画图房生徒，亦有广方言馆学生。毕业后，原广方言馆学生仍照原待遇分配，其余学生入各厂实习，并充沪宁等地学堂教习之选。这样，广方言馆的规模又扩大了，在校学生有八十名，房屋一百零二间。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三月，两江总督周馥以各省已设学堂，兼习外国文字，足备译才，而“工商各业，尚无进步”，奏准改广方言馆为工业学堂<sup>③</sup>，原工艺学堂也一起并入。至此，广方言馆性质既变，名亦不存。历时四十二年之久的广方言馆遂告结束。不久，工业学堂又由陆军部重定名称，区分为专门、中学、小学三部分，称为兵工专门学堂、兵工中学堂和兵工小学堂，统称为兵工学堂。

广方言馆初办时，学生额定四十名，以后续有增加，最多时

①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一，第十七页。

② 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二，第四三页。

③ 直隶学务处《教育杂志》，一九〇五年第六期。

为八十名。另有保送生名额十名。学生入学采取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年龄限为十四岁以下，后来改为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由官绅有名望者保送，取具年貌籍贯、三代履历，赴监院报名后，由上海道面试，择优录取。保送生名额系留给馆内佐杂人员，以及绅士中年及三十愿意入馆学习而又有人保送者。按章程规定，这些保送生学成以后，待遇与正规毕业生一样，也可以备翻译官之选，只是学馆对他们的约束没有对正规学生那么严格罢了。据记载，学生正额是常满的，而保送生的名额则通常空缺，因为没有什么年及三十的绅士愿意入馆学习。<sup>①</sup>

广方言馆受两江总督(例兼南洋通商大臣)和上海道管辖，上海道兼充学馆监督。首任监督为应宝时，其后为涂宗瀛、沈秉成、冯焄光、刘瑞芬、汤小秋、聂缉槩、刘麟祥、吕海寰、袁树勋和蔡钧。广方言馆迁入江南制造局后，又设总办一职，例由制造局总办兼任，总管馆中事宜。总办可计者有陈兰彬、冯焄光、李兴锐等十余人(详附表)。馆设监院一人，首任监院为冯桂芬，其兼可计者有章安行、叶承铤等十余人(详附表)。馆设查课委员、庶务委员若干人。另设司事四人，一管学生名册，一管稽查出入，一管什物，一管杂务。

广方言馆学生开始时均免费住馆就读，并由馆方发给伙食费每日一钱，旷馆之日不给。到一八九四年，学馆对伙食费规定有所变通，规定“各学徒招选入馆时，每名给伙食洋两元，油

<sup>①</sup> 参见吴宗濂：《上海广方言馆始末记》，《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第一至二页。

烛洋半元，肄习三个月，暂定去留；再令肄习六个月，能留馆者升给膏火银，由二两与二两五钱至三两为度。其资性聪颖，学业猛进者，随时酌加，亦不拘定月数”。<sup>①</sup>由助学金制改为兼有奖学金制了。

广方言馆对学生有严格的纪律约束，规定学生住宿读书，每月回家不得超过三日，全年病事假不得超过百日，逾期者辞退。学生出入由司事稽查，其在馆起居动作，由分教习诫导。一八九四年学馆又规定，学生“如有吸食洋烟嫖赌酗酒者，立即革除。其争闹懒惰不遵规矩者，由委员戒责，再犯者开除”。<sup>②</sup>馆中供奉孔子像，每月朔望，由教习率学生在像前拈香行礼，不许托故不到。

广方言馆经费，每年约需银八九千两，向由海关征收外国船钞项下拨发。据《江南制造局记》，广方言馆改为兵工学堂以前，岁需银九千两，其中海关拨六千两，制造局拨三千两。这些经费主要用于支付教职员工薪金和学生伙食油烛费。

### 三、教 育

广方言馆创办伊始，首任监院冯桂芬手拟《试办章程十二条》，对学生条件、学馆规模、教习的聘用、课程的安排、学生毕业后的待遇等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这些意见后来基本都付

---

① 《广方言馆全案》，第七八页。魏允恭在《江南制造局记》中说广方言馆学生“四年毕业，收膳费”。魏为广方言馆最后一任总办，所记当不至错，但广方言馆何时改学制为四年，何时始收膳费，不能确知。

② 《广方言馆全案》，第十七页。



诸实施。

广方言馆初拟招生四十人，聘西人贯通学问者两人为西教习，聘近郡举贡生员四人为分教习，分经学、史学、算学、词章四类，聘一品学兼优的绅士为总教习。按规定所有学生均以算学与西文为主课，“并须逐日讲习”。西文之重要性自不待言，至于算学，当时人认为它是各门科学的基础，“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从算学出，若不通算学，即精熟西文，亦难施之实用”。<sup>①</sup>馆中选派通习西语西文之委员董事四人，常川住馆，每日外文教习课读时，四人环坐，充当翻译，阐明西教习的意旨。当然对于懂得中文的西教习，就无需此举了。每月初一、十五课试西学；初八、二十四两日课试其他课程，均取所读当面指问。课试后，记存其优劣，三月一送上海道考试，视其优劣，给予奖惩。对西文及所业之文均有进益者，赏银四至八两；对西文茫无通晓者，即行撤换。肄业学生，三年期满，能一手翻译西书全帙而文理斐然成章者，由中西教习知照上海道，送通商、督抚衙门考验，咨明学政，按照奏定章程作为附生。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添设翻译官时，可于其中遴选。其精通西语西文才能出众者，由通商大臣、督抚专折奏保调京考验，授以官职。其不能翻译全帙者，作为佾生一体出馆。

广方言馆移址江南制造局后，总办冯峻光、郑藻如新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和《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sup>②</sup>对学生要求更严格、具体，对课程规定也更细致了。

<sup>①</sup> 《广方言馆全案》，第十七页。

<sup>②</sup> 这两个章程见《广方言馆全案》第十九——三九页。

《课程十条》是：一、辨志，要学生对学习“认定路头，用心坚定”。二、习经，要学生分年读经，先讲《春秋左传》，于课文之前三日下午，集中到讲堂听讲。三、习史，先读《资治通鉴》，每日二十页，读完再读《通鉴外纪》、《续通鉴》、《明通鉴》等，于课文之前二日下午，集中到讲堂听讲。四、讲习小学诸书，先读《养正遗规》、《朱子小学》，然后再读《近思录》、《朱子全书》和《性理精义》等，于课文之前一日讲解。五、课文，即做作文，每七日一篇，限即日交卷，是日停学外语。对于有成就者再试以策论，并且“间课以时艺，无阻其进取科名之阶。至初学入手，笔下尚未清晰，势不能不从事八股”。作文做好后，由教习讲解品评。六、习算学，每日学习西学之暇，即学习算术，先从加减乘除开方入手，学习中国的算经十书和西方的几何、重学（物理学）、代数等。七、考核日记，设立读书、行事日记两本，学生按日登记，于作文课后三日交先生，先生据日记稽查学生是否遵守馆规。八、求实用，凡有关军国之要务，学生均要切实讲求。九、学生分为上、下班（后来改为正科、附科），初进馆者先在下班学习外国公理公法，对于算学、代数、对数、几何、重学、天文、地理和绘图等学，均先用初学浅本，年底考试，优者进上班专习一艺。十、上班分七门：（一）辨察地产，分炼各金，以备制造之材料；（二）选用各金材料，或铸或打，以成机器；（三）制造各种木、铁产品；（四）拟定各汽机图样或司机各事；（五）行海理法；（六）水陆攻战；（七）研究外国语言文字、风俗国政。

与先前施行的冯桂芬所拟的《试办章程十二条》相比，这个

《课程十条》主要有以下三点不同；第一，学生分为两个阶段，以前是三年一贯，到这时三年分为下班、上班；第二，专业划分更细，以前只是一般地培育外语人才，这时在入学一年后就确定了专业，或搞勘探，或搞设计，或攻数学，或钻翻译；第三，加大了旧学的学习比重，以前只是一般地要求学生读些经史文词，这时不但强调了读经读史，而且鼓励学生作时艺，做八股。总之，以前是培养一般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这时已成为培养多方面（包括理科、工科、外语、军事）的科技人才的综合性的学校。

在《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中，冯焌光、郑藻如提出如下的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求师资以端模范，分教习以专讲求，集人才以备学习，广制器以资造就，编图说以明理法，考制造以究源流，测经纬以利行船，译舆图以参实测，广翻译以益见闻，译新报以知情伪，储群籍以资稽考，购机器以便考订，刊书板以省传钞，定课章以循诵习，严甄别以昭奖劝，立年限以收成效，还特别请求朝廷，对于广方言馆学生之优秀者，“赏给举人”头衔，允许“一体会试”，这表现出他们企图提高广方言馆社会地位的思想。对这一条，直隶总督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认为学生在广方言馆中学习，“与帖括自属分途，不必责其兼长也”，“亦不必令其一体会试”。冯、郑在章程中规定学生初一、十五课试西学，初八、二十四等日间考经史时文，曾国藩认为后者亦属不妥，“恐其用志既纷，转荒本业”，与广方言馆培养专门人才的宗旨不合。<sup>①</sup>冯、郑的这两条拟议当然也就没有实

<sup>①</sup> 《直隶总督曾批》，《广方言馆全案》第四一页。

行。

冯峻光、郑藻如拟订的章程，使用了二十多年，到一八九四年有所改变。一八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三日），江海关道聂缉槩在致江南制造局的札文后，附录了一份《近年变通从前办法酌立简明条规十则》<sup>①</sup>。其主要条款与以前章程大同小异，明显不同的有两个方面：其一，《简明条规》规定广方言馆招生数字除英文、法文、算学生定额四十名以外，新设天文馆，招生数字另加。英文、法文、算学、天文分作四馆，每星期前四天学习西学算学等专门课程，每天八个钟点，其余三天学习经史古文时艺，“仅习中学、偏废西学者，应令赴各处书院肄业，不得住馆”。这表明学馆不但扩大了规模，而且强调了对西学的重视。其二，《简明条规》规定所有学生除由教习按月考核课程外，逢端午、中秋、年节，听候海关道和制造局的官员会同甄别中西各学，评定甲乙，其屡列优等者酌加膏火俸两，三次皆列末名，毫无长进者开除。各学生进馆时，皆试学三个月后，暂定去留，再学六个月后决定去留。这表明学馆加强了对学生的考核，学生的录取标准也提高了。

广方言馆所聘西文教习多为外国人。四十二年间所聘英文、法文、德文、算学、天文、汉文教习可考者有五十一人（详见附表），首任英文教习为林乐知，首任法文教习为傅兰雅。

教习多有文字记述教学情况，唯多趋简略，只有林乐知记载比较详细。林乐知于一八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经冯桂芬和

---

<sup>①</sup> 《广方言馆全案》，第七七至八一页。

应宝时推荐，被聘为英文教习。他与海关监督签订一项协定，聘期六个月，每星期教六个上午，月薪银一百二十五两。六个月聘期满后，英文教习之职被曾与容闳一道留学美国的广东人黄胜取代，林乐知转而参加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工作。一八六七年，黄胜以孝养告退，林乐知再次受聘担任英文教习，直到一八八一年为止。这期间他上午教书，下午译书。<sup>①</sup>

据林乐知记载，广方言馆创办时，虽然额定可以招四十人，但开始时并没有那么多人来报名，一八六四年三月开学时，仅二十四人，到今年七月，才有二十六名学生。在正式上课教习以前，有些学生已经粗知一些零星的英语发音。林乐知一开始就教他们英语基本法则，进度很快，到八月，他的第一个班级的学生已学完《韦氏拼写书》，并且进行默写，朗读短文。<sup>②</sup> 这年九月二十八日，林乐知的六个月聘用期满，上海道没有继续聘请他为英文教习而改聘了黄胜，据说一些学生对这位美国教习很是依依不舍，在林离开学馆的开头两天中，有十五名学生去看望了他，其中至少有三个人告诉林乐知，他们打算离开这个学馆，以抗议学馆对新教习的选择。林乐知在日记中写道，他理解这些学生的心情，但还是劝他们不要离开。<sup>③</sup>

一八六七年三月，林乐知重归广方言馆教习位置，第一天上课到了三十三名学生。林乐知发现他们的程度参差不齐，便

---

① 毕乃德 (Knight Biggerstaff): 《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学校》(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第一六一至一六三页。

②③ 本涅特 (Adrian A. Bennett): 《传教士，林乐知及其所办的杂志，一八六〇——一八八三年》(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第二六至二七页。

将他们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学生语法基础比较好。第二部分较差，第三部分有一两个年青学生有发展前途，有一个很差，林乐知劝他立即停学。在教学中，林乐知引导学生反复进行各种词组类型的练习，还向学生进行西方科学知识的教育。他向学生示范一些科学仪器，如电报机、电池等。他带领学生参观法国人在上海开办的煤气厂、现代化的面粉厂，参观江南制造局的机器车间。<sup>①</sup>这样，学生在学习外语的同时，也学得了一些科学知识。

林乐知是一个传教士，他在教学中也没有忘记向学生灌输基督教教义。他自己承认，他在教学中“向学生巧妙地灌输了基督教教义”。<sup>②</sup>他要学生读一些传教士已译的含有基督教义的简明读物，例如《黎明时分》、《亨利与他的脚力》、《两个朋友》等等。这些故事说的都是所谓基督教的美德，但它们又不是赤裸裸的宗教小册子。林乐知说，这样做便不会遭到什么非难，“我希望这些书籍不但对教他们英文有用，而且在传播浅显的基督教真理方面也有用处”。<sup>③</sup>

江海关道和江南制造局总办不仅是广方言馆行政上的负责人，在学习业务上也有具体管理措施，并非挂一空名而已。据林乐知记载，在他担任英文教习期间，江海关道每星期天下午都要对学生进行考试，其办法是叫学生们将简短的英文照会译

---

<sup>①②③</sup> 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学校》(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第一六一至一六三页。

成中文。这些照会都是这位道台大人最近一个星期内从美国或英国领事馆收到的。由于这些英文照会都附有一份中文译本，所以这位不懂外文的道台大人也就能够对照领事馆的文件，检查每个学生的翻译水平。林乐知认为这是一种颇为有用的考试方式。<sup>①</sup>

广方言馆虽是适应近代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但不少学生仍然把相当多的精力，有的甚至将主要精力放在科举八股上。这是因为，广方言馆之类的学校虽是官办，但这类官办学校还没有与相应的功名联系在一起。按照章程，广方言馆学业优秀的学生，最高待遇就是给予生员、监生头衔，“一体乡试”，或充当翻译之职。他们既不能直接参加全国一级的会试，翻译一职又为一般士大夫所鄙夷。功名所在，人必争趋，广方言馆的学生自然想由乡试而会试，谋取功名。当时乡试考八股文而不考外语，所以，广方言馆的学生一边在读外语，一边又习制艺，口读外语而心在八股。林乐知说，在一八六七年夏天，他发现广方言馆那些已是附生的学生，“正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专用于准备不久将在南京举行的三年一度的考录举人的乡试，因此在这个夏天，他们几乎没学什么英文”。<sup>②</sup> 此类情况，江南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蔡汇沧也曾谈及，他们在一八八一年四月十九日（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向南洋通商大臣禀报说：光绪五年以前，广方言馆有一批学生，“敷衍岁月，多攻制艺，不复用心西学，故中学尚有可观，西学几同墙面，此何异内地书院？

<sup>①②</sup> 毕乃德(Knight Biggstaff):《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学校》(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第一六一至一六三页。

殊失设立方言馆之本意”。因此，他们便于光绪五年十月，在这些学生中“择其安详者改派翻译、文案等事，其余一概撤退”，另招幼童入学。<sup>①</sup>外语学校的学生不学外语而钻八股，这显然是违背当局办学的初衷了。一八七〇年，冯煥光、郑藻如曾要求对广方言馆优秀学生，给予举人头衔，允许一体会试，意在从制度上克服重八股轻外文的弊病。这条后来没有实行。即使实行，会试仍以八股取士，学西学的人还得去钻八股。封建的考试制度不改革，学生重八股轻外文的倾向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过来。一八九四年《简明条规》强调指出：“仅习中学、偏废西学者，应令赴各处书院肄业，不得住馆。”这说明“仅习中学、偏废西学”的弊端，到一八九四年还继续存在。

由于广方言馆西学教习很多是传教士，有些教习如林乐知在教学中又有意宣传宗教知识，英文教习舒高第则时常令学生读旧约《圣经》，“诱人入教”，<sup>②</sup>因此，广方言馆有些学生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有的干脆入了基督教。林乐知说，一八六四年十月，即他在广方言馆任教六个月期满被辞退后一个月，就有他教过的三个广方言馆学生参加了他的教会工作<sup>③</sup>。究竟共有多少学生参加基督教，不得而知，但广方言馆一些学生在学习西学的同时，也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则是无疑的。最著者为陆征祥，他在入学以前已入了基督教，在广方言馆又受到宗教熏

① 《广方言馆全案》，第七八页。

② 《广方言馆风潮始末记》，《苏报》，一九〇三年五月十日。

③ 本涅特(Adrian A. Bennett)：《传教士，林乐知及其所办的杂志，一八六〇——一八八三年》，(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a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第二六至二七页。



陶，1911年改信天主教，离开政治舞台之后，在比利时出家做了天主教修士，并成为修道院院长。

当然，广方言馆毕竟不同于旧式书院，它毕竟培养了一大批懂得外语和近代科学知识的新型人才(详下节)，它的学生对于馆方也不象书院学生那样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他们从所学西方的公理公法等书中，从外国教习那里，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在行动上也有所表现。同治末年的罢课事件和一九〇三年的退学风潮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同治末年罢考事件起因是，广方言馆学生见上海龙门书院学生每月皆有津贴五两，而自己每月才三两，“未免相形见绌”，感到官府对广方言馆学生与龙门书院学生不是一视同仁，遂挽人与管学的制造局总办冯焄光商谈，求其仿照龙门书院章程，也给津贴五两，结果“未邀允准，诸生愤愤”，于是闹了起来。吴宗濂记其事甚详：“时适新任沪道沈公秉成将来馆开考，遂有黠者以罢考进言，众咸赞同。故当沈公步进右门，被等即从左门而出，仅告闾人曰：‘今往邑庙四美轩茶候，如总办有命，可速来报’。迨沈公升案点名，应声接卷者仅有一生。沈公大异，急问原因，总办曰：‘此乃学生捣乱行为，行当开除以儆，另招新生补充可耳’。沈公曰诺，与总办午餐毕，即亦返署。冯总办乃颁一谕，大意谓：今日诸生罢考，谅系误听人言，兹姑从宽不究，该生等如愿回馆，着即书面声明。诸生在茶肆坐待至晚，不得不仍回校舍，既见明谕，皆书愿回。总办乃择其中好出风头之十余人，一律开除。得留者方自庆幸，被裁者唯有脱离，该馆遂得

悉缺招考，新生乘机以进，反受其惠，而余即其中之一。<sup>①</sup>因争待遇平等而至罢考，尽管一瞬即平，但在当时，也算是有一些斗争精神了。

一九〇三年退学风潮简单情况是：总教习舒高第一一贯顽固守旧，教学不负责任，压制辱骂学生，五月三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七）因事激起公愤，学生们团结起来与之斗争，于五月六日全部退学以示抗议。学馆总办初拟调制造局炮队营勇前来弹压，后恐压制愈重，公愤愈亟，被迫与学生妥协，同意改良学馆章程，要求学生留馆继续学习。学生于是复课。

据当时上海出版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苏报》报道，学生们揭发总教习舒高第的“罪状”有七条：一、玩课。按章程，广方言馆每日授课至少四小时，上下午各两小时，可是舒氏授课每日上午授书不过数行，余时便责令学生自己背书，下午便叫学生作洋文论，上下午实际共只授一个半小时的课程；其余时间，舒氏“不过到堂敷衍耳目，身倚藤椅，足搁木凳，昂然高卧”。所用课本，亦陈旧不堪。二、把持。在馆内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凡馆内革新事，必加阻拦，“近来广方言馆改良事业，所以屡兴屡辍，则以舒高第横梗于中之故”。三、卑鄙。谄媚逢迎上司，每换一任总办，舒氏都能找到恰当的逢迎之术，博取欢心，“谄媚政策及于总办，并及于总办之姨太太”。总办毛庆蕃在任时，舒氏每日夜闻，抱一西琴至毛寓，“调其琴，短足跳舞，毛之子女环视笑，丑态百出”。由于舒善于鼓琴，毛庆蕃竟在其五十两

<sup>①</sup> 吴宗濂：《自述》，《人文月刊》第二卷第二号（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薪水之外，再加银五十两。四、贪黩。广方言馆每次招试新生，舒高第必先荐七八人或十余人不等，其人之托荐者，皆有定价，多则三十元，少则十余元，谓之包荐包取。当时社会上流传谚语说：“方言馆，招学生，舒先生，骗铜钱”。五、猜忌。舒高第所以每日授课甚少，原因在于他“惟恐人之早日成就”，正因如此，学生如果以功课以外的书问他，“则绝之而不答”。六、压制。舒待学生，极为暴戾，“每日到堂，或诵读之间稍有拂意者，立即胥骂，其胥骂皆鄙陋不堪，如市儿村媪，诟辱他人父祖以为快心”，辱骂讥嘲犹为轻者，“重则施以敲扑”。七、传教。舒高第“每日来馆，必令人读旧约《圣经》，诱人入教。”<sup>①</sup>

舒高第如此专制、暴戾、无行，学生们早已“恨之入骨”，但由于先前“学界之风潮未盛，专制之命运未穷，能冲突之者甚少”。<sup>②</sup>到一九〇三年，学界情况有了变化。先是，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上海南洋公学生因学校当局压制新思想掀起了退学风潮，二百多名学生愤而退学。教员蔡元培以辞职来支持学生，并与中国教育会同人开办爱国学社，接纳退学学生。同时，《苏报》增辟《学界风潮》一栏，对学潮加以揄扬。其后，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学生风潮迭有发生，尤以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事件影响较大。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激荡下，资产阶级的学生运动在全国特别是东南各地此伏彼起，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地处上海的广方言馆学生对舒高第蓄之已久

① 据《广方言馆风潮始末记》，《苏报》一九〇三年五月十日；《广方言馆舒高第罪状》，《苏报》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② 《(广方言馆)教习历史》，《苏报》一九〇三年五月七日。

的愤慨自然也就爆发出来了。

广方言馆退学风潮系因反对舒高第而激起，但学生的目的决不仅仅要去掉一个暴戾无行的教习，而在于反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以及作为这种制度后盾的封建统治。《苏报》一篇“来稿”说，学生反对舒高第的指导思想是“欲图自强，首贵教育，欲善教育，尤重师资”，<sup>①</sup>反对恶劣的教习的目的，是为了搞好教育，以图国家自强。由此可见，退学风潮是与自强爱国联系在一起。广方言馆学生在退学风潮中，“以平等自由之说为口头禅”，<sup>②</sup>以“忘私利，明公理，求合天演之旨”相勉励，<sup>③</sup>这说明，不但从当时整个学生运动的时代背景，即使单从广方言馆退学风潮自身内容来看，这次风潮也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并促进了当时爱国学生运动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当时一篇文章评论说：对于广方言馆学潮，“姑无论其事之成与否，是固可惊可羨，而为吾国家教育前途放一线光明也”。<sup>④</sup>

#### 四、成就

广方言馆历时四十二年，一共培养多少学生，已难确计。如果按每期四十名（开始时不足四十名，后来则不止四十名），三年一期计算的话，则先后共培养学生应为十四期五百六十名。<sup>⑤</sup>

① 《广方言馆风潮始末记》，《苏报》一九〇三年五月十日。

② 《华紫翔茂才龙教广方言馆某君书》，《苏报》一九〇三年五月十八日。

③ 《广方言馆风潮始末记》，《苏报》一九〇三年五月十日。

④ 《广方言馆舒高第罪状》，《苏报》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⑤ 这个估计数字应当说是比较保守的，因为一八九四年以后，广方言馆学生定额远远超过四十人，至少从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五年，额定人数是八十人。

这个数字并不大，但在当时的中国，已是十分可贵的了。这些学生分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择其优秀者送京师同文馆深造，一种是分配到各种工作单位，有的到海关当翻译，有的到工矿办实业，有的到学堂教书，有的到驻外使馆或领事馆办外交。无论是送京深造的，还是立即分配的，都有一些人在学术或事业上作出一定的成就。

广方言馆从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九六年先后五次共送二十八名学生赴京师同文馆深造(名单详附表)。他们在京师同文馆的学习大多成绩优良。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记学生大考榜单，光绪五年大考英文第一名汪凤藻，汉文算学第一名席淦、天文第一名徐广坤，光绪二十四年大考法文言语的第一、二、四、五名获得者周传经、徐绍甲、陈思谦、唐在复都是上海广方言馆送去的。同治十一年岁试英文格物第一名朱格仁，也是上海广方言馆送去的，他的试卷被作为范本，登在《中西闻见录》第七号上。所有同文馆学生中，只有两人获取翰林院编修职位，其一就是广方言馆首批送京学生汪凤藻。

送京的二十八人后来大多在外交部门工作，其中有八人先后做过中国驻外公使，他们是：

汪凤藻，一八九一到一八九二年四月为署出使日本大臣，一八九二年七月到一八九四年为出使日本大臣。

杨兆璜，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五年为出使比利时大臣；

刘式训，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一年为出使法国、西班牙大臣，一九一一年免兼西班牙，改兼出使巴西大臣，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六年为驻巴西、秘鲁公使；

陆征祥，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一年为出使荷兰大臣，一九一一年转任出使俄国大臣，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八年为驻瑞士公使；

吴宗濂，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一年为出使意大利大臣，辛亥以后到一九一四年为驻意大利公使；

刘镜人，一九一一年为出使荷兰大臣，辛亥以后到一九一八年为驻俄公使，一九一九年调任驻日公使，未就任；

唐在复，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〇年为驻荷兰公使，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为驻意大利公使；

戴陈霖，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〇年为驻西班牙兼驻葡萄牙公使，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为驻瑞典兼挪威、丹麦公使。

这八人中，民国以后，陆征祥几次担任外交总长，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刘式训两次出任外交次长，又兼任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刘镜人历任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副会长、外交委员会副会长等职。

广方言馆毕业生担任过驻外公使的还有胡惟德，他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七年为出使俄国大臣，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〇年为出使日本大臣，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〇年为驻法国兼西班牙、葡萄牙公使，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二年为驻日公使。一九二六年出任外交总长，并代理国务总理。

其他在外交部门担任过参赞、领事、翻译等职的人还有很多，不一一胪举。

广方言馆学生毕业后从事政治活动的，除了已经提及的陆征祥、胡惟德分别代理过国务总理外，比较知名的还有唐在礼，

他是一八九五年进上海广方言馆英文馆学习，三年后被两江总督选派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新军中任职，民国以后，官至署参谋总长。

广方言馆学生毕业后，有相当一批人从事教育工作。比较知名的有汪凤藻，他先在京师同文馆任算学副教习，后来又任上海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席淦，先在京师同文馆任算学副教习，一八八六年升任教习，“讲授垂三十年”，<sup>①</sup>成为继李善兰之后最有名的算学教习；经亨咸，北洋海军医学校校长；吴匡时，上海交通大学教员；徐绍甲，江苏高等学堂法文教员；郭世绂，北京大学教员；钟天纬，上海三等公学创始人，首先采用“新法”施教，即以识字讲解为先，而不是死记硬背；其余严良勋、朱格仁、瞿昂来、朱敬彝、黄致尧、吴宗濂、周传经等都曾在上海广方言馆任过教。

广方言馆学生在读书时期，就没有翻译一课，他们往往与外文教习合作翻译西学，其中有些后来出版了。他们毕业后在从事教育、翻译工作的同时，所译的东西就更多了。仅从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来看，其中广方言馆学生参加翻译的就有三十余种，包括政法、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外交、数学、冶炼和外文语法等各个方面。其中严良勋译的《四裔编年表》，以年表体例编辑各国帝王总统年代，“用以查检各国缔造更革及种族政教争战之大势，便易如指掌”，<sup>②</sup>为中国近代此类书籍之发轫。严良勋翻译的另一部书《挺纛外乘》，依据史实，

① 《青浦县志》，附编，席淦传。

② 《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一，一九〇九年版，第一、四页。

“广《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之不足”，是当时人了解世界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籍。<sup>①</sup>李景镛译的《西美战史》，凡二卷十六章，“详晰贯综，可与《普法战纪》相颉颃”，时人认为它是“兵志中佳本”。<sup>②</sup>钟天纬译的《英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魏昂来译的《法国水师考》，详细记载英、美、法国水师数目、费用、征调、管理、操练、俸饷等情况，为时人了解这些国家军队状况的必读之书。汪凤藻译的《英文举隅》，是京师同文馆学生学习英文的必读之书；他译的《富国策》是京师同文馆高年级学生的教科书。

上海广方言馆培养的人才，遍于国中（详见附表），涉及外交、教育、科技、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有九人位至公使，两人任过外交总长，两人代理过国务总理，一人署参谋总长，这在晚清的此类学堂（包括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中是很突出的。一位广方言馆学生说：“一馆之中，极勋位于首辅，展奇韬于秘府，遍使节于环球，振古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sup>③</sup>这个评价，并不过誉。美国学者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做过一个统计：纯粹由京师同文馆自己培养而位至驻外公使的学生仅五六人，广州同文馆培养的此类人才更少，而经上海广方言馆培养位至公使的学生就有八人之多（其实是九人）。他由此得出结论：“广方言馆学生比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学生质量都高。”<sup>④</sup>

①② 《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一，一九〇九年版，第一、四页。

③ 参见吴宗濂《上海广方言馆始末记》，《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第一至二页。

④ 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学校》（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第一九六页。



上海广方言馆培养的学生，为什么会质量高？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上海当时具有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优越条件。晚清的上海，是中国最大通商口岸，有最大的外国租界，不但华洋杂处，而且外国人在租界办了不少学校，这使得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人接触、学习外语的机会远远多于其他地方。很多没进过校门的人，也会说几句洋泾浜外语，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傅兰雅一八六七年在一封信里说，由于那时上海很多青年都在寻求接受英文教育的机会，因此上海广方言馆便可以从挑选最优秀者入学。相反，北京等地风气不够开放，京师同文馆开始时招生又限制在八旗子弟中，这就大大地影响了学生的质量。<sup>①</sup>第二，与北京、山东等地相比，上海地区传统文化因袭较轻。中国儒学发源地在北方，其重心也长期在北方。上海作为一个城市的兴起，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从历史上看，上海地区从未充当过儒学重心，它所受传统儒学的渲染也就远不及山东、北京等地深刻。这就决定了上海对封建文化的因袭较北方为轻，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力相对弱些，吸收力相对强些。京师同文馆创办后，引起大学士倭仁等人那么强烈的反对，导致了那么大的一场风波，上海广方言馆开办时就没惹什么麻烦，这除了因为一个是辟路前驱，一个是萧规曹随，地位不一样，地区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所谓“京派”与“海派”不同文化风格的形成，当与两地文化传统的差异有一定关系。在六十年代，广方言馆首批学生入学以前就

<sup>①</sup> 傅兰雅的信写于一八六七年七月五日，见毕乃德：《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学校》，第一九六页。

已粗知一些外语，到八九十年代，出现了青年学生为入广方言馆，不惜向总教习纳资行贿的情况，这正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上海地区的人们吸收包括外语在内的西方文化的热情。第三，从语言传统上看，上海属吴方言区，吴依软语，不似北方话音调高亢，上海地区的人较北方人更易于模仿英、法等印欧语系语言的发音。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便使得上海广方言馆学生较纯粹由京师同文馆培养的学生质量高些。

## 附 表：

### 一、广方言馆历任总办名单

（由江南制造局总办兼充）

陈兰彬，字荔秋，广东吴川人，一八五三年庶吉士，一八七五年至一八八一年任驻美国兼驻西班牙、秘鲁公使。

冯焯光，字竹儒，原为候补道，旋补苏松太兵备道江海关监督。

郑藻如，字玉轩，广东香山人，后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

李兴锐，字勉林，湖南浏阳人，一八七二年始任总办，以后历任福建按察使、广西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等。

蔡汇沧，字二源，原为候补通判，后补南汇县知县，并充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委员。

潘露，字镜如，原为候补道。

聂缉规，字仲芳，湖南衡山人，一八八四年任总办，后升苏松太道、浙江按察使、安徽巡抚、浙江巡抚等。

蒋德钧，字少穆，原为候补道。

刘麒祥，字康侯，湖南湘乡人，原为候补道，后补江海关监督。

林志道，字稚眉，福建闽侯人，原为候补道，后补直隶通永道。

赵滨彦，字渭青，原为候补道。

沈邦宪，字幼彦，原为候补道。

郑孝胥，字苏戡，福建闽侯人，以后历任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辛亥以后以清朝遗老自居，“九·一八”事变后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

潘学祖，字芸孙，原为候补道。

毛庆藩，字实君，原为户部郎中，后补津海关监督。

张庆勋，字元邕，原为候补知府，后补江苏扬州知府。

魏允恭，字番实，原为候补道。

## 二、广方言馆历任监院名单

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朝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章安行，上海县儒学教谕。

叶承铤，待考。

程锡书，字松筠，原为候补知府。

禹国仪，字孚卿，原为候选知县。

吴增仪，字可圆，原为候补知府。

贺良朴，字履之，后补邮传部员外郎。

张通典，字伯纯，湖南湘乡人，辛亥后，曾任孙中山大总统府秘书。

李仲壶，待考。

袁绪钦，字叔瑜。

刘采年，字甸侯，为代理监院。

达锡纯，字粹伯，为代理监院。

### 三、广方言馆历任教习名单

#### (一) 英文教习

林乐知(Young J. Allen)，美国监理会传教士，一八六〇年抵上海传教，一八六四年三月始任上海广方言馆英文教习，同年九月被辞，一八六七年重任英文教习，到一八八一年为止。

黄胜，广东人，一八四〇年入澳门马礼逊学堂，一八四七年与容闳等随该校校长塞缪尔·勃朗(Samuel Robbins Brown)赴美留学，翌年秋以病回国，一八六四年十月继林乐知之后为广方言馆英文教习，一八六七年以孝养告退。<sup>①</sup>

严良勋，字子犹，江苏吴县人，原为广方言馆英文馆学生，一八六八年送京师同文馆深造，后以中书衔附监生回到他的母

---

<sup>①</sup> 黄胜任教事，参见毕乃德：《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学校》，第一六〇页；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十一页。

校任教，一八七六年离沪到福建稽查福州船政学堂，后升福宁府知府。<sup>①</sup>

汪凤藻，字芝房，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原为广方言馆学生，一八六八年送京师同文馆深造，毕业后先留京师同文馆任副教习，后回母校任教，不久授编修并擢出使日本大臣。

朱格仁，字静山，原为广方言馆学生，一八七一年送京师同文馆深造，毕业后曾任北洋大臣公署翻译，授直隶候补道。

沈佑甫，待考。

瞿昂来，字鹤汀，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一八七二年(同治壬申)进上海广方言馆英文馆学习，毕业后曾充驻英使馆随员。

舒高第，字德卿，浙江镇海人，自幼赴美国，在美国十余年后回国，一八七七年始为广方言馆英文教习，据说他“西学甚深，导引得法”，<sup>②</sup>有译著多种。一九〇三年因压制学生，引起学生退学风潮。

凤仪，字夔九，京师同文馆学生，毕业后以户部员外郎随使英国，他在广方言馆任教起止时间不详，仅知他一八九五年为英文教习，<sup>③</sup>不久便调任为驻新加坡总领事。

朱敬彝，字乙尊，原为广方言馆学生，一八九〇年送京师同文馆深造，毕业后授知府衔候选同知。

## (二) 法文教习

---

① 参见《船政奏议汇编》第十七卷第十六页。

② 《广方言馆全案》，第七页。

③ 毕乃德：《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学校》，第一七九页。

傅兰雅 (John Fryer), 英国传教士, 一八六一年抵华, 一八六三年被聘为京师同文馆教习, 一八六五年到上海, 一八六八年受聘为江南制造局翻译, 后兼任广方言馆法文教习, 到一八七九年专事翻译不复兼教习之职。

克利蒙(法籍), 待考。

顾文藻, 上海人, 原在福州船政局法文学堂读法文, 后入江南制造局为司事, 一八七九年始为教习, 于教习之事“尚能胜任”。<sup>①</sup>

卜沃野(Boyer), 法国人, 由中国特从巴黎聘来, 据说他“莅任后, 第一步以法文教授学生, 待其于法文既有门径, 而后再授以国际学。”<sup>②</sup>后因看望父病, 死于旅途。

黄致尧, 字伯申, 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 原为上海广方言馆学生, 一八七九年送京师同文馆深造, 毕业后曾充出使美国翻译官, 驻西班牙二等参赞。

璞珺(Adolf Bottu), 法国人, “博通欧洲各大国之言语, 而操之又至为纯熟。莅任后, 不特于教授事宜极形勤奋, 且视诸生如子弟, 以故师生之间, 至为相得。”<sup>③</sup>他在广方言馆仅两年便辞职, 转为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书记员, 兼任葡萄牙驻沪总领事。<sup>④</sup>

① 《广方言馆全案》, 第五十二页。

②③ 甘作霖:《江南制造局之简史》下,《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六号。

④ 据陆征祥回忆, 他十三岁进广方言馆, “当年的老师是一位很热心的 玻杜(Bottu)先生”(见罗光《陆征祥传》, 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六年版, 第十九页)。陆氏生于一八七一年, 他十三岁当为一八八三年, 由此可知 Bottu 在广方言馆任教时间是一八八三年前。

游学楷，字步云。

吴宗濂，字挹清，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原为上海广方言馆学生，一八七九年送京师同文馆深造，在广方言馆任教时间不详，后曾任出使意大利大臣等职。

周传经，字赞尧，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原为上海广方言馆学生，一八九六年送京师同文馆深造，后曾任驻奥地利使馆参赞，民国以后任外交部通商司司长。

徐绍甲，字近勇，上海人，原为上海广方言馆学生，一八九六年送京师同文馆深造，后曾任江苏高等学堂法文教员。

裴勃盟(Bebelmann)，法国人，本为铁路工程师，受聘为广方言馆教习之第二年，即病逝于上海。<sup>①</sup>

### (三) 德文教习

金楷理(Carl T. Kreyer)，美国人，一八六六年来华，一八七〇年到江南制造局当翻译，后曾任中国驻俄国使馆参赞。

冯国钧，待考。

### (四) 算学教习

时曰醇，字小雪。

席淦，字瀚伯，上海青浦人，原为上海广方言馆学生，一八六八年送京师同文馆深造，毕业后先留馆充副教习，后擢教习。他何时到上海广方言馆任教不详。

刘彝程，字省庵，江苏兴化人，幼喜数学，后与李善兰、邹特夫等数学家交往，自著《割圆闾率》、《开方闾率》等书，冯焄

---

<sup>①</sup> 甘作霖：《江南制造局之简史》下，《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六号。

光耳其名，聘为广方言馆算学教习。<sup>①</sup>

沈善蒸，字立民，与刘彝程合编过《广方言馆课艺》一书。

(五) 天文教习

周曰栝，字克生。

贾步纬，不详。

黄文涛，字友松。

火柴业迪生(英籍)，不详。

张刚，字子邕。

(六) 汉文教习

王树善，字杉绿。

顾琨，字厚斋。

陈衍，字叔伊。

许震蕃，字雷门。

袁希涛，字观澜。

汪人骥，字逸如。

钱国祥，字二笙。

单恩溥，字隶花。

洪锡祁，字筠孙。

吴子贞，不详。

张文江，不详。

葛奎，字缉生。

孙彦博，字啸仙。

丁兴民，字牧生。

李岳衡，字茹真。

萧穆，字敬敷。

莫文炳，字研三。

黄福昌，字小菊。

王端芝，字兰陵。

#### 四、广方言馆先后五次咨送京师同文馆学生名单

(学生简介见附表五)

第一次，一八六八年四月一日(同治七年三月初九)，共五名<sup>②</sup>

严良勋、席淦、汪凤藻、汪远燧、王文秀

第二次，一八七一年九月(同治十年八月)，共七名

<sup>①</sup> 《兴化县续志》，刘彝程传。

<sup>②</sup> 原拟送六名，其中王宗福因丁父忧未到，被延至第二次送京。



朱格仁、杨兆莹、金仁杰、王宗福、徐广坤、杨兆璠、黎子祥  
第三次，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一），  
共二名

吴宗濂，黄致尧

第四次，一八九〇年八月（光绪十六年七月），共七名

朱敬彝、陈贻范、杨书雯、陆征祥、刘式训、刘镜人、翟青松

第五次，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共七名

周传经、唐在复、戴陈霖、黄书淦、徐绍甲、方传钦、陈  
思谦

### 五、广方言馆学生可考名单<sup>①</sup>

姓名	字号	籍贯	何时进(出)馆	何馆	后来工作
严良勋	子犹	江苏吴县	一八六八年离开 广方言馆进京	英	广方言馆教习，福宁 府知府
席淦	瀚伯	上海青浦	一八六八年离开 广方言馆进京	英	京师同文馆教习，广 方言馆教习
汪凤藻	芝房	江苏元和	一八六八年离开 广方言馆进京	英	出使日本大臣，南洋 公学总办
汪远焜	卓人	江苏六合	一八六八年离开 广方言馆进京	英	
王文秀		江苏吴县	一八六八年离开 广方言馆进京		
朱格仁	静山		一八七一年离开 广方言馆进京		北洋大臣公署翻译， 直隶候补道
杨兆莹			一八七一年离开 广方言馆进京		

① 本表参照《广方言馆全案》、《同文馆题名录》、《同文馆学友录》等资料编成。

(续表)

姓名	字号	籍贯	何时进(出)馆	何馆	后来工作
金仁杰			一八七一年离开 广方言馆进京		
王宗福		浙江仁和	一八七一年离开 广方言馆进京	英	
徐广坤			一八七一年离开 广方言馆进京	英	驻神户领事
杨兆璠	诚之	浙江吴兴	一八七一年离开 广方言馆进京		出使比利时大臣, 四 品衔候选知州
黎子祥	吉士		一八七一年离开 广方言馆进京	英	
吴宗瀛	挹清	江苏嘉定 (今属上海)	一八七六年进, 一八七九年出, 赴京	法	两度为驻意大利公使
黄致尧	伯申	江苏宝山 (今属上海)	一八七九年进京	法	驻西班牙代办使事
陈贻范	安生	江苏吴县	一八九〇年进京	英	留英, 外交部特派交 涉员
朱敬彝	乙尊		一八九〇年进京	英	留英, 广方言馆教习
杨书雯	仲卿	湖南长沙	一八九〇年进京	英	使英随员, 驻加拿大 总领事
陆征祥	子兴	上 海	一八九〇年进京	法	出使荷兰大臣, 出使 俄国大臣, 外交总长, 代理国务总理
刘式训	紫升 箴笙	上海南汇	一八九〇年进京	法	出使法国、西班牙大 臣, 驻巴西、秘鲁公使
刘镜人	士熙	江苏宝山 (今属上海)	一八九〇年进京	法	出使荷兰大臣, 驻俄 公使
翟青松	健人	安徽泾县	一八八二年进, 一八九〇年出, 赴京	法	出使德国翻译, 外交 部通商司帮办
周传经	赞尧	江苏嘉定 (今属上海)	一八九六年出, 赴京	法	外交部通商司司长
唐在复	心奋	上 海	一八九六年出, 赴京	法	驻荷兰、意大利公使

(续表)

姓名	字号	籍贯	何时进(出)馆	何馆	后来工作
戴陈霖	雨农	浙江海盐	一八九六年出,赴京	法	驻西班牙兼葡萄牙、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公使
黄书淦	丽生	湖南长沙	一八九六年出,赴京	法	驻荷兰使馆秘书官
徐绍甲	近勇	上海	一八九六年出,赴京	法	江苏高等学堂教员
方传欽			一八九六年出,赴京	法	
陈思谦			一八九六年出,赴京	法	
蔡祚来	绥之	上海	一八八八年进	英	怡和洋行翻译,烟酒公卖局坐办
钱家骥				英	
何六吉	仲谿,一字驾山	上海奉贤		英	驻西班牙使馆秘书,外交部通商司办事
宋如圭	摺渠	上海川沙		英	在上海经商
李昌瀚				英	
朱绪阁				英	
钟天纬	鹤笙	上海华亭(今属松江)		英	三等学堂教员
周传沂				法	
程福庆	芝庭	安徽黟县	一八八七年进	法	琼海关监督,黑河领事
周传谋	伯贻	江苏嘉定(今属上海)	一八九三年进	法	陇海铁路会计处工作,中法实业银行工作(驻巴黎)
李鸿杭				算学 天文	
龚君杰				算学 天文	
朱祖槃				算学 天文	

(续表)

姓名	字号	籍贯	何时进(出)馆	何馆	后来工作
许延祺		浙江人	一八七〇年进		中浙江庚午(一八七〇年)科乡试副榜,其后情况不详
程 奎		嘉 善		英	一八七八年原拟送京,一八七九年前后病故
顾耀彝				法	
朱正元				算学	
胡俭德	馨吾	浙江吴兴	一八八三年进	算学	出使俄国、日本大臣,驻法公使,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叶耀元				算学	
李锡恩				算学	
刘生顺					一八七九年前后病故
张坤德					
梁普璇					
王斯元					
万钟元					
吴锡三					
吴匡时	应乾	江苏嘉定 (今属上海)	一八九六年进	法	上海交通大学教员、农商部商标处处长
吴克倬	汉波	江苏盱眙	一八九六年进	法	驻古巴总领事
李家瑞	辑甫	上 海	一八八七年进	法	京汉铁路机务处课长
李恩庆	蒹田	奉天铁岭	一八八八年进	法	农商部帮科长
沈承俊	宜荪	浙江桐乡	一八九五年进	法	京汉铁路机务处处长
周家义	子宜	江苏宝山 (今属上海)	一八七九年进	英	交通部司长
唐宝潮	俊夫(一作俊甫)	广东香山		法	总统府军事参议

(续表)

姓名	字号	籍贯	何时进(出)馆	何馆	后来工作
唐在礼	执夫(一作执夫)	上海	一八九五年进	英	署参谋本部总长
张其栋	振伯	上海		法	外交部条约司办事
陈祖良	味轩	浙江余姚	一八九七年进①	法	京汉铁路总局工程师,工程文牍课长
陈广平	式之	浙江平湖	一八九七年进②	法	外交部秘书
郭世绾	绛侯	安徽亳县	一九〇〇年进	英	北京大学教员
舒厚德	石父	浙江慈溪	一八九六年进	英	总统府军事咨议
廖世功	叙畴	江苏嘉定 (今属上海)		法	外交部通商司办事
刘家骥	梦飞	江苏宝山 (今属上海)	一九〇二年进	法	京汉铁路工务员
刘家骏	调箴	江苏宝山 (今属上海)	一九〇二年进	法	京汉铁路工务员
经亨咸	子清	浙江上虞	一九〇二年进	英	北洋海军医学校校长
龚渭林	佩清	上海	一八七九年进	法	外交部主事、编档员
吴云鹏	笠仙	湖南湘阴	一八九八年进	法	湖南银行稽核员
宋善良	椒临	浙江吴兴	一八九五年进	法	驻西班牙使馆二等秘书官
周传让	仲濂	江苏嘉定 (今属上海)	一八九〇年进	法	嘉定电话局
张朝基	本台	江苏吴县	一八九五年进	英	陆军测量局长
舒厚仁	栋臣	浙江慈溪	一八八七年进	英	汉阳铁厂卫生股长
杨 坝	伯琴	江苏泰县	一九〇一年进	英	女子高师教员

① 一九二四年编的《同文馆学友录》注明为“光绪丁酉”即一八九七年进馆,但《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注明为“光绪乙未”即一八九五年进馆,不知孰是,暂从前说。

② 《同文馆学友录》注明为“光绪丁酉进馆”,《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注明为“光绪甲申”进馆,不知孰是,暂从前说。

(续表)

姓名	字号	籍贯	何时进(出)馆	何馆	后来工作
谈汝廉	祝安	上海	一八七九年进	法	上海交涉署翻译, 徐州铁路局总翻译
钱广禧	伯良	广东番禺	一八九四年进	英	外交部办事员, 驻纽约领事馆随习领事
严恩桐	南璋	江苏宝山 (今属上海)	一八九七年进	英	留学日本, 驻美留学生监督
李景镐	希周	上海	一八九六年进	法	陇海铁路局
章彦骏	继诗	湖南善化	一八九四年进	英	总统府军事顾问
瞿昂来	鹤汀	江苏宝山 (今属上海)	一八七二年进	英	驻英使馆翻译, 广方言馆教习
吴克伟	魁士			英	浔阳道尹
朱炎	炎之			英	教育部金事, 留欧学生监督
汪茂春	龄九			法	江南制造局
周诗蘊	养纯			法	驻西班牙使馆随员, 外交部通商司办事
张坤德	少塘			英	在上海工作
陆宗游	观甫			英	北京西城电话局会办
华龙	紫翔			英	长沙明德学校
赵鸿钧	运文			英	湖南青年会干事
钟冰	志刚			法	住上海
吴承结				英	
黄绍文				英	
朱贵申					
郑汝霖				英	外交部任用
沈功章				艺学	
单启鹏				英	

(续表)

姓名	字号	籍贯	何时进(出)馆	何馆	后来工作
张永焯				德	驻德使馆翻译
张景麒				艺学	
刘循程 <sup>①</sup>		江苏兴化	一八九三年毕业	算学	
李元鼎 <sup>②</sup>					

① 据《兴化县小志》稿本，游学篇，第七四页：“刘循程氏早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于前清光绪十九年”。

② 据《格致书院课艺》。

# 龙门师范学校

周承忠 朱梦华

清末，开始变法，废科举，兴学校，江苏接近海口，得风气之先，于是公私立小学一时勃兴，可是办校易，得师资难。当时学制学风骤然改变，一般私塾老师不但对于声光电的科学，以及英语、算术、体操、唱歌、手工等知识，茫无所知，就是教授方法和管理手段也得改弦易辙，方可适应需要。因此造就师资的师范学校遂在各大城市次第设立，其著名者南京有以钟山书院改设的两江师范，在苏州有以紫阳书院改设的江苏两级师范，在上海有以龙门书院改设的龙门师范。龙门师范对上海及松江、太仓一带学校的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

## 一、开办经过

龙门师范全称“苏松太道官立龙门师范学堂”，由苏松太道拨给经费聘任监督办理。自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开办，迄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结束，凡二十三年。其间分前后两阶段：自开办到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为龙门师范阶段；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至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结束，为江苏第二师范阶段。前后名称虽有改换，而校中办理情形以及规章制度，仍是一脉相承，并无多大变更。



龙门书院，系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苏松太兵备道丁日昌以上海城中蕊珠书院之瓊华堂创办的。越两年迁入县城西南隅新院舍(李氏吾园旧址)，并将先棉祠、应公祠房屋基址并入，后因员额扩充，房屋不敷应用，又陆续添购东、西、南三面基地，书院面积比原来扩大两倍以上。院舍建筑极精致，中央为大厅大楼，四面环以荷池，有台榭花木之胜，石梁三道通向门外，其规制详见应宝时《龙门书院记》及《上海县志》。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时，清廷因有各省、府、州兴办学堂之上谕，该院山长汤寿潜，即请准将书院停课，改办学堂，定名为苏松太道官立龙门师范学堂，招考道属三府州县学生，造就师资。翌年由道台袁树勋聘李钟珏(字平书)、姚文枏(字子让)为董事，沈恩孚(字信卿)为代理监督，延请教职员招生开课，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学。

## 二、学生情况

第一年招收学生三班：简易理科一班，定一年修毕；简易文科一班，定一年修毕；本科一班，定三年修毕，三班共七十六人(此系毕业生名额，入学新生数无考)。学生资历，随班而异，入简易科一年修毕的，多系生员出身及同等程度曾为私塾教师三十年左右者；入本科三年修毕的，只要具有同等程度，均可报名投考，考试成绩及格，便录取入学肄业，对其入学前之资历，并无规定。

学生入学后的待遇，比一般中学优厚，免缴学费，住宿膳食也一律由校供给，入学时还发制服全套。学生只须在开学时

缴保证金大洋拾元，并自理书本什费。保证金为预防学生在校发生事故供赔偿损失之用，如在修业期内无事故也非中途退学者，到毕业时可以领回。本科生三年毕业时，要到苏州提学使处复试经义策论，成绩优良者奖给训导或贡生衔，但要为国家义务任教两年，如不任教而考升大学者，奖衔取消，这是当时师范学校通例。不过此项奖励，仅实行一两次，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之后，即行废止。

该校所开班级，以本科为主体，每年夏季例招一班。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以前招收的，修业期为三年；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以后改为五年。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起校名改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后，添招预科班，一年毕业，递升本科，本科改为四年毕业。一九一四年冬季起，改招本科第二部一班，定一年毕业。一九二六年秋季起，每年招收初中生一班，三年毕业。此外，有时还添办讲习科，修业期一年或两年，则为奉贤、金山、上海、南汇、青浦、崇明、松江府属各县委托代办，开班不固定。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曾开手工科两班，修业期仅半年。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曾开文科专修科一班，修业期两年，则为应当时学校需要，特别开班。统计先后招生四十三班，其中简易科十班，本科十四班，本科第二部九班，讲习班三班，文科专修一班。历届毕业生共一千八百七十四人，其中二师初中及黄渡分校学生不详。

前几期所招学生，多半是生员和老塾师，以后所招本科生都取同等程度，不限资格。预科生，则全系高等小学毕业生，但都必须由各县地方行政机关备文保送，方能参加入学考试。

本科第二部学生，均系旧制中学毕业或经过同等程度各种学科考试及格者；讲习科学生则由托办各县教育行政机关备文保送各该县之高等小学毕业者到校应试，照托办名额录取。文科专修科学生，须已在师范本科及旧制中学毕业。初中则各县高小毕业生都可应考，与普通中学同。照章所取学生，以苏州、松江、太仓两府一州为范围，其他各县学生不得入学，其理由以该校经费由苏松太道拨给，亦即是苏松太人民所负担，倘其他县中学生也要入校，是无异科举时代的冒籍应考，苏松太学生可以鸣鼓而攻之。但当时一般投考学生认为师范毕业后出路有一定的限制，并不重视师范。掌教者为招揽学生起见，乃不得不谅情通融，久之而此项定章遂成为一纸空文。不过在民国以前，龙门师范苏松太所属以外州县学生极为少见。

该校向来专收男性学生，自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金山县托办之讲习科兼收女学生后，一九二二年录取之本科第二部学生，一九二三年录取之文科专修科学生，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录取之初中学生，及一九二二年起历年录取之预科学生，均男女兼收，以适应时势之发展。

### 三、课程设置及课外活动

师范学校课程和普通中学相似，但添加教育学、教育法、伦理学、心理学等课。最为着重的还是国文课，这一课分为四目：（一）范文，选读两汉和唐宋八家文章，有时采用《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纂》。（二）文学源流，自编讲义。（三）应用文，为预备将来应用需要，选授通行酬世小品。（四）读经，选

授四书及《诗经》、《左传》(民国初元废)。

最初所授教育法，都取法于日本。在今日言之，仅是所谓教授法，即教课的法则。主要学习的是对不同班级的教法，当时小学开设班级，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其一是单式，即一级一个课堂，教法单纯；其二是复式，即两个年级合一个课堂，如一班在讲课，其他一班只好复习，一静一动，要有适当安排；其三是单级，即一年级至四年级合在一个课堂，一人要调度四级，使各级普遍获得教授效果，安排各得其宜。此种单级教授，在乡村中比较普遍，如缺乏熟练修养的教授法，无以应付。所以为预备将来独挑单级起见，在校要悉心研究教授方法，第一要熟悉编排单级课程表，第二要在课前配备计划教案，第三要充分实习试教，临场不致于慌乱。担任单级课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有名的小学教员多以此得功，外校教师来观摩的，亦主要到单级课堂取经，盖优良的单级教师，非师范毕业和有多年经验者，不能胜任。这种从日本学来的单级教授法，适应兴学初期的简陋小学的情况，具有一定的成效。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后，教育普遍发展，学校规模扩大，单级教授已不合时宜，乃成为历史名词。

民国三四年（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后，西洋教育法传入我国，取日本教育法而代之，遂有所谓道尔顿制、动的教育、自学辅导主义，随后还有杜威、杜黎舒等教育法，于是师范教育不断变换方式。龙门师范地处上海，地方小学最多，感受外来的东西最快，校方为将来毕业生能充分应付起见，惟有对教育法不断革新，盖其时已由形式的教授法进入研究教育方式的

阶段了。

体操课注重兵式操，由苏松太兵备道发给步枪一百三十余支，惟式样古老，又无子弹，不过聊壮声势而已。逢到地方出些小事故时，学生便荷枪出外游行示威或分段站岗。当时上海城内除商团救火会外，唯一的武装队伍就是龙门师范的学生。

一般说来，学生对课外活动是不积极的，这是因为师范学生年龄比较大，有好些已经入洋，提过考篮，做过塾师，入了师范俨然以师资自负，暮气沉沉，对于团体生活和社会活动，自然淡漠乏兴。比较感兴趣的活动，首推教师和学生共同组织的“金石社”，该社分书法、篆刻两门，学生自愿报名入社，有指导四人，分组监督教授。为督促进步起见，规定社员每星期要刻交石章两枚，评毕批分，历年造就能书能刻者，为数不少。又设有图书室，供学生借阅。自求志书院并入后，旧书设备尤为充足。

校友会曾编辑过杂志，在龙门师范阶段付刊过四期，在第二师范阶段付刊过七期。最后刻了一本小册子，名为登龙集，详载历届师生姓名和通信处。这是一本很宝贵的刊物，可惜付印匆促，漏误不少。数十年屡经变乱，现已成为罕见奇货。

#### 四、职教员情况

龙门师范是由培养封建科举人才的书院所改设，一切规章风气，仍不脱封建气味，因此职教员与当时一般中学具有很大的差异。

掌校的称为监督，由苏松太道聘任。监督是官名，如海关

监督、矿务监督等，一定要具有道台头衔才有资格担任，虽为掌校，但实际上是放的差缺。监督平日难得莅校，一切校务由代理监督处理，他只在行开学和休业典礼时到校。监督坐着绿呢大轿，穿着补服套子，戴着蓝顶花翎，长班前后簇拥，教师屏息参见，十足是一个大官僚。代理监督也要有知府、同知头衔。教务长、斋务长、中文老师等也必须是举人、秀才，他们都穿着箭衣外套，戴着红缨帽子，必恭必敬，雁行般跟着监督参加典礼。典礼最主要的一项节目是谒圣，堂上悬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像，监督率领全体教师学生向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拈香肃立，仪注非常隆重。最先几年，每逢朔望亦行谒圣礼，但监督不一定到，由代理监督领谒，到辛亥革命后才废止。

在龙门师范阶段，掌校的监督先后四人，首任沈恩孚，后是袁希涛、夏曰璈、贾丰臻。贾丰臻字季英，上海县人，掌校时间最长，自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接任监督，至辛亥革命后，该校改属江苏省，易名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仍由江苏都督程德全聘任为该校校长，直至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离任。所有二师异日的成就，都出于他手，故一提起二师，人们便会联想到贾氏。贾校长办事认真，天天到校，督策学生用功，监督教师勤惰，改进校务措施，不到几年，校中面貌焕然一新，成绩斐然。他到校后的第一项改革，就是把进膳制改为分食制，这种方法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学来的。当时各处师范学校来参观，都认为最合卫生，争相仿效。

教职员中与贾校长相处最久、始终其事者为教务长朱香晚，

他服务忠实，但思想守旧，管理学生过于严肃呆板，学生只能服从，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因此学生对他很少有好感。与朱教务长相反的国文教师吴公之，常在《民立报》、《民权报》上发表文章，并著《宥言》一书。他主张火葬，主张对古来传统的孝道予以批判，守旧派的人都侧目而视，认为离经叛道，学生中则有不少人赞成他的观点。提倡国故和朴学的国学教师顾铁（僧寔）、胡朴安（蕴玉），皆著述宏富，卓然名家，对学生掌握治学途径，影响不小。史地课教师姚孟焄（明辉）、童季通（世亨），皆该科专家，所写著作，风行全国。二师毕业生，各学校多延揽教授历史地理，是与姚、童两氏培植之功分不开的。此外该校对于体育、技术各课，亦颇注重，体育课除柔软操、器械操之外，尤重兵式操，学生平时分队编制，荷枪上操，有时还请上海铸造局派员到校指导擦枪和装拆，还特请海门人某教师教授国术。该校为了响应政府推广国语运动，特请北京人到校教授普通话；由于手工是新兴课目，国内缺乏师资，还特向日本延请手工专科教师小仓顺、和田村半九郎到校教授。

师范学生毕业之后，唯一的出路是任教，其中偶有升学及从事其他职业者，但毕竟是少数。在简易科及本科第一部、第二部毕业生，可以担任高等小学教员；在文科专修科毕业生，可以担任初级中学教员；在讲习科毕业生，可以担任初等小学教员。

由于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历届学生毕业后在外都担任了重要职务。不数年，太仓、松江各县学校中的重要职教员，大都是二师的毕业生，对于发展地方教育，他们

作出了贡献。

## 五、学校兴替

自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至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江苏省教育厅在每年春假期间考查各县小学教员,在二师辖境内者,自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起,均委托二师办理。所谓辖境,在道立龙门师范时期为苏州、松江、太仓三属;自民国元年改为省立二师后,为上海、松江、奉贤、金山、南汇、青浦、川沙、嘉定、宝山、崇明十县。

该校为便利师范学生实习,设有附属小学两部:第一部设在尚文路何家弄口,第二部就梦花楼南首刘公祠及愍忠祠房屋设置,所有高级小学、初级小学之单式、复式、单级等编制,以及乙种工业、乙种商业各级,均应有尽有。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又在黄渡镇设立分校,照讲习科课程授课,三年毕业。每年招收学生一班,一切待遇与本校同,所需经费则由省发给本校,由本校转给分校。分校设有附属单级小学一所,以资实习。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初夏国民革命军到沪,学生开会,反对贾丰臻,贾氏匿不到校,由政府派杨言江到校接替,校中印信款项,贾氏托文书周承忠备册代交。到暑假将近,国共分裂,杨被以共产党嫌疑列名通缉,遂避走日本。继之由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派原在大夏大学任教的欧元怀接任校长,欧先请会计潘序伦代表接收,并将师范学校与省立商业学校合并,改组为上海中学,其两三年级师范班,仍附在上中肄业,



直到各该班次第毕业，师范部从此结束，不再招生。欧校长莅校甫经月余，省方又改派大夏大学另一教授郑通和为校长。经过七八年，郑校长请准上级将原有二师房屋基地连同先棉祠、应公祠全数出售，改为居民住宅，而上海中学则在吴家巷地区另行购地建筑新校舍，李氏吾园遗址完全改观，已无从考寻了。

# 清末上海两大学潮

张 大 椿

一八九八年康梁维新运动前后，我国各地陆续出现官立和私立的新式学校。上海学校较多，内地青年纷纷来沪求学。当时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及震旦学院，均较有名。前者系官立学校，后者虽系私校，也受帝国主义及教会干扰。因此这两所学校在清末都曾发生政治性的学潮，笔者身历其境，分述如下。

## 一、南洋公学概况

上海南洋公学，系由清朝督办轮船、电报大臣盛宣怀请准清廷创办，成立于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经费由招商局及电报局拨付，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膳宿也都免费。盛宣怀自任督办，另派总理（后改称为总办）一人，负责行政工作。美国人福开森为监院，总揽全校校务，权力很大。

南洋公学初开办时，设师范班及中院若干班，以后添设上院及特班（商学班），后者为保举经济特科而设。从开办到发生学潮，总办换了五人：（一）张焕纶；（二）何嗣焜（字梅生）；（三）张元济（字菊生）；（四）沈曾植（字子培）；（五）汪凤藻（字芝房）。汪于一九〇二年到校，那时中院共有六班，其中第五班的汉文

教习郭镇清，字子绛，江苏如皋人，是个秀才。其弟郭镇瀛，字冰侯，是个举人，也在大学教汉文，大家称他们兄弟为大郭、小郭。这两人思想顽固，见到学生有阅读新书报或谈论时事的都要加以禁止或斥责，因此为其他进步教习及各班学生所不满，而学校当局则认为“正派”而重视之。

## 二、墨水瓶风潮及爱国学社

一九〇二年旧历十月十五日，郭镇清所教五班教室教师座位上，摆了一个墨水瓶，大郭去上课时，责问何人所摆，大家都答不知道。下课后大郭把一个比较年幼的学生杨之福叫去盘问，杨为讨好起见，诬指一个平素和他不睦的同学伍正钧（后改名伍特公，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所摆。大郭据以报总办，要求把伍及坐在其两旁的同学陈承修、贝均等三人一并开除，因为这三个人平日喜欢阅读新书报，具有新思想，素为大郭所不喜。

总办汪凤藻对校内情况全不了解，就凭大郭一面之辞，以侮辱师长，不守校规的罪名，下条开除伍正钧、陈承修、贝均等三人。五班全体同学大为愤怒，一则为伍等无辜受罚不平，二则痛恨郭镇清压制学生，三则憎恶杨之福诬陷好人，全班开会议决，申请学校当局收回成命，并要求辞退郭镇清，开除杨之福，否则情愿全班退学。汪凤藻袒护教习，不辨是非，采取高压手段，反诬学生有革命扰乱嫌疑，竟出布告将五班学生全体开除。这样引起了全校同学公愤，连日开会，诉诸总办、督办，都不得要领，遂决议全体退学，以示抗议。

十六日，特班总教习蔡元培劝学生姑待后命，学生坚持翌日上午十时前总办非去不可。迄十七日上午十时无结果，全校学生二百余人遂实行退学。当时各班学生排队出校，秩序井然，步行至静安寺路张家花园(味莼园)，在广场上集合，由特班学生贝寿同向公众宣布退学缘由：指斥“教习以奴隶待学生，为种种之束缚，总办顽固，欲抑制学生言论自由，是等奴隶教育，凡为国民，谁能堪之？今日之事为我们学生脱离专制学校之新纪元，今后将奋力以求前途之光明”等等。演说完毕后，集体摄影而散。

事后督办盛宣怀派人劝学生返校，但全无结果。嗣盛以督办名义于十月二十二日发一布告，略称五班学生，因与教习龃龉，不遵规矩，特班生数人邀约多人，借声诉为由、结伴哄闹、实属不成事体。五班汉文教习平时教育无方，任意起居，漫无觉察，应即辞退。五班学生借端滋事，应全班俱撤。特班为诸生之望，诂料内有数名昌言煽惑，以致一、二、三、四、六班学生畏事散学。其有立时悔悟，限内回校者，准即归入原班肄业。惟结伴闹学各生，断不准再行入学，以示区别。并规定年内只授洋文功课，所有汉文教习暂行回籍，候再延聘等等（布告全文见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申报》）。其后又发招生广告招收新生，以补各班缺额（广告见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报》）。同时，改派张美翊(字让三)为总办，延聘新教员，竭力笼络学生，为重新开学之计。

学生方面，事前有老同学杜洲龢、谢元量、项伟臣等请假离校，创办译社，此时倡议成立共和学校，实行学生自治，定章

程，立课程，延教员，皆公议以多数决之，并实行“共和营业”，每人每日劳动若干小时，从事译述、编辑、书面等，以所得充学校经费，一面请求社会人士赞助，以为善后之计。由于同学水平不一，并缺乏资力，最后求助于中国教育会，建立起爱国学社。

中国教育会系蔡元培、蒋智由、林獬(字白水)、叶翰蓝等发起，于一九〇二年四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被推为会长。当时接受南洋公学退学同学请求，于十一月十六日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租屋开办爱国学社，由蔡元培为总理，吴稚晖为学监，教员均由中国教育会会员义务担任，其中多半是国内有名学者和爱国志士如章炳麟等。学生分为四个班级，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理科、英文、体育等。学校内部组织采取学生自治方式，一切兴革事宜概由学生开会决议，交主持者执行。校内革命和自由空气非常浓厚，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一九〇三年五月还参与《苏报》的编辑工作，由学社组织教员七人轮流担任编辑，成为发表言论的园地。接办不久，因发表了好几篇鼓吹革命的文章，并介绍了邹容的《革命军》，遭清政府压制，《苏报》被封，章炳麟被关了三年，邹容死于狱中。爱国学社受到牵连，于同年七月被迫解散。至此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又告失学，嗣后乃有部分学生转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肄业。

附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名单(一部分已回忆不全)：

特班：程志姚、王世谦、贝寿同、钱诗桢、张承樾、陆梦熊、穆湘璠、吴宝地、钟枚、林祖同、魏斯灵、萨君陆、田康、殷崇亮。

头班：胡炳生、杨德森、王寿祺、胡壮猷、杜永清、金頌康、王明照、杜悬曾、李昌祚、任榆、张在清、林仰伟、王孝纲、张保熙。

二班：夏元琛、裘维铿、徐侗、郁德荃、稽芩孙、赵景简、王世澄、王开源、张大椿、秦岱源、陶连、陈同寿、吴继果、王缙曾、石襄善、陈元勋、范承祐、裘岱龄、邵长光、谢学运、钱秉瓚、汪祖杰、吴铭、程良楷。

三班：陈修瑜、王汝平、刘宝铿、杜汝耀、邓益光、徐经郭、张铸、夏生鹏、徐恩元、周善同、朱文鹏、杨嘉运、何整珪、杨曾谊、杨曾询、杨曾诗。

四班：吴连生、陈昌骥、朱庭祺、蔡运泽、杨景森、盛观颐、张百生、王剑石、陈修璟、叶昌叙、杨荫樾、胡寅生、胡鸿猷、杨承彝、冯元升、邹文炳、张汝熊、张汝墀、陈吉庭、雷祖焕。

五班：王增文、曹大樞、张德环、陶树荣、史文彬、俞乃来、李德晋、陈肇运、孙翼舜、曹钧、葛敬猷、伍正钧、胡宾律、陈承修、施传盛、沈联、唐在贤、张述贤、贝致祥、叶涛、张传本、陶赞、贝均。

六班：项大受、徐铭鼎、徐兴鹭、冯中鑫、胡浚济、刘崇儒、罗鸿年、丁锡龄、严锡皋、沙曾藩、郁申、孙彬、蒋曾焕、曾学藩、俞根福、吕本璋、刘世杰、瞿庆普、秦淦、郭鹏、戴棣龄、周端伊、曾宗鲁、钮长庆、曾栋、张铿、谢行端、金保熙、王孝缙、陈永钦、汪之椿、范崇望、沈慕曾、汪振鹏。

### 三、震旦学院的成立和解散

清季上海学校，除奉旨创办的官立学堂和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学校两种类型外，私立学校最初有爱国学社，独树一帜，但仅昙花一现，即遭专制政权摧残而解散。震旦学院之创立稍后于爱国学社，一九〇三年三月一日开学。创办人马相伯，江苏丹徒人，是爱国的天主教徒，当时已六十六岁，在上海松江之间隐居十余年，忽然抛弃林下生活而创办震旦，为祖国作百年树人之计。

震旦学院校舍系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以后就空地自建一部分，各科教师系请教会委派教士义务担任，最后学生仅二十余人。马相伯自任总教习（即院长），项微尘为总干事，郑子渔为会计干事。校章揭示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材”为宗旨。课程分文学、质学两科，并区分正课及副课如下：甲、文学科：正课为古文、今文、哲学三门，副课为历史、地理、政治三门，政治又分社会、理财、公法等课。乙、质学科：正课为物理、化学、数学三门，数学再分算术、几何、代数、三角、力学、天文各课；副课为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农圃学、卫生学、簿记学、绘图、音乐、体操等课。

每日上下午各上课两小时，其中三小时授正课，一小时授副课。文学科两年毕业，共授课二千四百小时。第一年授拉丁文，第二年授英、法、德、意大利文，由学生任择一种，以达到能翻译为目标。除授课时间外，每日有四小时的自修时间，两年亦为二千四百小时，质学科则于两年外，再延长两年毕业。

震旦学院特点有四：(一) 提倡学生自治，院内各部事务在院长监督下，由学生自行管理，称为干事。其中总干事和会计干事系固定职务，由专人担任，其余干事，如文牍、庶务等，于学期开始时，由学生互推分别担任，初级教课亦由高级生转相传习。(二) 指导学习门径，学院肄业期限只有两年，如按照寻常办法授课，时间不许可。为此，一切课程的讲授，着重于指示门径，以养成学生自修之风。(三) 经常举行学术及时事讲演，开拓学生知识面，使其关心时事，知所奋发。(四) 实施军事教练，延聘外籍军官为教员，实弹打靶，以加强体育。依以上精神办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开一新纪元。另一特点是，学院创办人虽是天主教徒，校舍也借自教会，然在院内绝对不谈宗教，故学院虽处在宗教气氛浓厚的环境中，但能巍然独立，不受宗教影响。基上情况，学院开办一年，已成为全国学子所瞩目的求学场所，除以上南洋公学部分退学学生外，各省学生纷至沓来。迄一九〇五年春季开学时，学生人数超过二百人，几达创办时之十倍。又学院虽不公开昌言革命，但对当时见嫉于清廷的青年掩护甚力，例如陕西人于右任因文章中有革命排满字句，为当时陕西巡抚升元所通缉，幸事前得到老师沈卫（浙江人，曾任陕西学政）的关照，化名为刘学裕逃来上海，经人介绍，马相伯即收容其入院肄业。此外各地有志之士闻风而来的很多，如马君武、蓝公武、章行严（章士钊）、邵仲辉（邵力子）等，都曾在震旦肄业。

一九〇五年春季开学后，震旦学院与教会之间开始发生裂痕，原因是由于英、法文的教授课目不平衡，法文课目远较英



文课目为完备，而学生方面则要求两者并重。当时上海天主教会英美传教士远较法人为少，教会方面无法满足学生要求，虽经院长极力同教会磋商，问题不得解决。而教会方面反向学院提出干涉学院行政的要求，声称非有满意答复，即将所派教员撤回，同时以各课教师名单通知学生，有关英、法文课目的差别，较前更大。全院学生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心情惶惑，痛感天主教会不仅要攫夺震旦学院主权，而且要引诱学生专习法文，俾日后为法帝国主义服务，不得不与之决裂。院长马相伯完全同情学生，当即率领全体学生离开徐家汇老天文台，着手寻觅校舍，重新建校。学生既退出后，许多中坚分子即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永年里租赁房屋一所，作为建校筹备处。

#### 四、复旦公学的诞生

震旦学院全体学生退学，充分表现了民族自尊心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坚强决心，因此重建学院的号召，立即获得社会热心人士的支持。当时在上海抵制美货运动中最为积极的曾铸(少卿)首先捐款一万元为建校经费，其他响应捐助者不在少数，筹备工作因之得以顺利进行。学生本拟仍用震旦学院名义在新址复校，不意天主教会竟影射名义，仍用震旦学院原名，在徐家汇老天文台原址，另行开办，并仍推举马相伯为创办人，企图蒙骗社会，并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如下：“徐家汇震旦学院通告：震旦学院前因学生误会意旨解散，而本堂与各教员于中国教育之前途热心未懈，即院中书籍标本等亦一切无恙。现拟延请中国声望素著讲求教育之人，为本院名誉赞助员，商讨学科

规划，定期招考学生，于七八月间开学。特先广告。”（见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申报》）

震旦退学学生对此非常愤慨，更加强了自办学校的决心。为了揭露教会阴谋，即于次日登报声明：“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学院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书籍、标本等，早经迁出，毫无纠葛。现暂借吴淞旧提台衙门，定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已经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址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从前震旦学院无涉、特此敬白。”（见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申报》）

震旦学院改名复旦公学，系经许多人研究决定的，含有恢复震旦之意。重新建校最难解决的是经济问题，单靠社会人士捐助不能持久，震旦学生原在马相伯领导下退学，马氏遂出全力争取建立新校，除邀请张謇（季直）、王丹揆（清穆）、曾铸（少卿）、严复（几道）、熊季廉等参加建校工作外，并电当时两江总督周馥，请予援助，周馥接电后，立即电飭上海道袁树勋查明情形，设法援助。后经上海道与各方面协商，将吴淞蕴藻浜的旧提督衙门（当时作为提督行辕，俗称六营公所）拨作复旦公学的临时校舍，又拨款一万元作为开办费，以后还拨到永久的校基和常年补助费。这样，复旦公学就在吴淞提辕建立起来，因房屋不敷、就近租赁吴淞镇上民房若干幢作为学生宿舍。

复旦公学于一九〇五年九月初正式开学，仍推马相伯为校长，聘袁希涛（观澜）为教务长，除震旦退学学生一部分加入新校肄业外。另招新生一班。当时学生一百七十余人，分甲乙丙

丁戊五班。学校组织方式虽与震旦稍异，但仍能贯彻民主自治、刻苦奋斗的精神。草创之初，一切事务工作及初级教课，均由旧震旦的退学同学担任，如于右任教国文，邵力子教法文，张大椿教英文，叶仲裕任总干事等，而叶对新校的建立贡献尤多。新聘教员中，以李登辉最重要。李系南洋华侨，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当时刚从美国毕业回国而来上海的有两人，一为颜惠庆，一即李登辉，马相伯本想都聘为复旦教员，因颜系圣约翰书院出身，已先被该院后身的圣约翰大学聘去为母校服务，故只聘到李登辉一人。

复旦公学成立后，开始整理科目，使教育课程纳入正轨，其程度相当于当时各省官立高等学堂（即大学预科），使学生毕业后能直接升入外国的专门大学。成立不久，袁希涛离校，李登辉继任教务长。两年后，马相伯辞去校长职务，由严复继任。其后又两易校长，一为夏敬观、一为高凤谦。迄辛亥革命前夕，马相伯重任校长，但革命军兴，校舍为淞军所占，经费也停发，学生星散，多有参加革命工作者，学校遂暂时停顿。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批准将徐家汇李公祠拨作复旦校舍，仍推马相伯为校长。其后马氏因事不能兼顾，推李登辉为校长。从此时起，李登辉致全力于复旦的建设，两次出国去南洋，募得巨款，扩建校舍。一九一七年复旦公学扩充为大学，当时因吴淞原有校基被政府拨作他用，改在江湾购地建筑校舍。一九二二年将大学部迁入，其李公祠原址则作为复旦附中校舍。其后复旦大学又陆续添建校舍，增设院系，以迄解放后人民政府加以调整和改造，发展成为今日综合性的复旦大学。

## 马相伯先生传略及其办学经过

李青崖遗稿 马玉章校补

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二年之间，上海的学校教育无论在规模上或者在质量上，均已俨然处于领导全国的地位。

一九〇三年春，震旦学院以异军突起的阵容出现于上海教育界。

震旦学院创办目标是为了振兴祖国和民族。办学的方针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主张思想自由，对不同意见展开讨论，并挈举纲领，开示门径，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探索研究。其创办未及一年，即为国内学子所瞩目，而且五十年来上海教育能够发展到解放以前这样的规模，也大都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受到了震旦学院的影响。

震旦学院的创办人马相伯先生，彼时六十六岁，在上海松江之间隐居了十来年，抛弃了悠闲的林下生活，创办这个空前的新学校，为国家民族作百年树人的大计。

先生姓马名良，原名建常，字相伯，清江苏省镇江府丹阳县人，寄籍丹徒，是宋末大儒乐平马贵与先生端临的二十世孙。世奉天主教。镇江在帝国主义者侵入中国以前，府属各地土制染色的红布、红绳是国内著名的家庭手工业，成品遍销南北，马氏世业染色，渐以致富。先生一八四〇年生于丹阳，后

寄居丹徒。幼时在父亲松岩先生的训示下读完了儒家的经书，到上海进了徐家汇天主教所设的学校，总计约在二十年间，读完了普通科学，以及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经院派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科，得到神学博士学位，罗马教廷授先生为司铎。是时先生年甫三十岁，而声誉所及，已经由师友之间传到了国际，不过先生始终不肯把自己的学问为外国人服务，清廷当局因此器重先生，争相延致。彼时国事日渐衰弱，外患纷起，先生认为非充实国力不能雪耻图强，非有基本建设不能充实国力，因此屡以建设之策上之当局，未能为当局所用。

一八八三、一八八四年间，朝鲜新旧两派互哄，各图夺取政权，日本的野心家从而加以煽动，以便侵略朝鲜。清廷应朝鲜国王的求援，遣派提督吴长庆统兵到汉城坐镇。长庆延致先生同行，荐先生为朝鲜国王的政治顾问，意在替他们筹划政治上的改进，使他们渐自振兴。可是当时朝鲜的李朝象清廷一样，是腐朽的封建王朝，所以先生的种种建议终没有一件获得实施。

在种种建议中间，其最具有意义而又不难施行的，莫过于上朝鲜国王条陈所列举的九条：一曰“省刑罚”。先生认为设置刑罚的目的，原在于儆戒罪人，使之悔改，并非戕害其肢体，而朝鲜的刑罚每每伤人筋骨，造成残废，所以应当废止此种刑罚，而以强迫劳动去改造罪人。二曰“定刑典”。先生认为法制必须依时代予以变更方能收效，而朝鲜的《大典会通》所刊《刑典》(大概是一种例则，而非条文)多不合于时代，以致狡猾的官吏借此为奸，以欺百姓，应当重新删定。三曰“广取才”。先生

认为罪人不孥，古有明训，而当时朝鲜凡罪人的子孙一律不许参加考试，因此国家缩小了吸收人才的范围，危害甚大，所以应当废止此制，以便广取人才。四曰“恤奴婢”。先生认为奴婢的子女永为奴婢，是世界上最不人道的事情，而朝鲜仍固守此则，所以应当废除。其自己卖身为奴婢的，应准限年以官价赎身，一律获得自由。五曰“求富庶”。先生认为立国非人口蕃庶不能致富，而当时朝鲜不知讲求蕃庶之道，所以应当禁止未成年者早婚，提倡寡妇再醮，限制纳妾，不许妨碍及年婢女的婚姻，不许男子令妻妾服劳而自身专务坐食。六曰“慎疾病”。先生认为讲求卫生是使人口蕃庶的积极政策，而朝鲜每每把死者悬之树上并不掩埋，因而造成传播疾疫的祸根，所以应当严禁此风，一面设法接种牛痘，扫除里巷的污秽，疏通沟渠的淤积，并建设消防制度。七曰“兴工艺”。先生认为贸易上入超是国家的漏卮，而朝鲜民间的日用物品大都依赖进口，以致人民失业者日多，所以应当开设工厂，募集金工、木工、织工、陶工来制造物品并且派人出国学习精奥的技能以备回国传授。八曰“兴学校”。先生认为不施教育则民智不开，而朝鲜的大病莫过于此，所以应当令各府各县建立公共学校，令民间子弟习学语文、计算及史地等科，限三年毕业，以图教育普及。九曰“正经界”。先生认为朝鲜的土地每每经界不明，以致不仅主权时起纠纷而且妨及租赋，所以应当选派通晓计算之士，分途丈量全国的田亩，以正土地的经界，定租赋的多寡，租赋既均，则餉源自然充裕。并应免征实物，代以白银，以免输送之苦。先生复于条陈末尾下了下列结论：“右列数事，大抵日本国久已行

之矣。无须大举动，大更张，所以只见其利未见其害，且多有只须一纸文告即可猝办者。文告原不足以为治，然使文告而亦靳焉，更将何以为治？若夫交涉衙门应行事件，则兼与本署人员先后议及，兹不敢渎陈也。”但是，先生这些意见终未能为朝鲜的摄政大院君所用。

不到两年，吴长庆奉命撤兵，先生也随同内渡。当局者不久又派先生到法国考察商务。前此十余年，先生曾居美国，因而得以了解乔治华盛顿及林肯之所以成功。至是居欧洲约三年，乃复了然拿破仑之所以崩溃，以及巴黎、罗马学术之所以昌明。当时国内能通晓欧美情势者，先生殆为巨擘。旋由清廷任为驻日本长崎总领事，后调任为东京使馆的参赞，最后以中日甲午之战归。

从那年到一九〇〇年，祖国历史一直是祸乱叠起，先生既归，即不愿再为清廷服务，于是隐居松江的佘山，教会命他管理徐家汇天文台。数年之间，著述有关天文度数的书约百余卷，又与其弟眉叔先生合著《马氏文通》，采用古希腊人葛郎玛的分类法，以辨认中国文字的词性，从词性以辨认语句的官能，并引唐汉以前典籍中的名句以作佐证，于是清代汉学家有关文字考证的遗产大部分得到了区分部别的归纳，为认识古代文字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至今谈中国文法者仍不能出其大原则之外。先生爱弟心切，故令眉叔独署著者之名。先生并不因埋头著作，而置国家民族的忧危于不顾，他认为救忧危莫重于昌明学术，昌明学术莫重于设立完备的学校，震旦学院之创立正是先生这种认识的证明。事前数年，先生曾把祖遗已份的沙田

三千亩捐给教会，立下字据，以作资助日后教会所设立中西大学堂中贫苦高材生的基金，其事至最近始为局外人所知，详见本文的附记。

震旦学院在一九〇三年春间开课，先生自任院长兼主持教学计划，并教授拉丁文和哲学初步，以手编的《拉丁文通》和《致知浅说》作教材，其英文、法文、数学、理化乃至兵式步枪教练，均由教会选派教师承担，他们不在学院支薪。就设备而论，当时学院仅在草创之中，但学院具有发扬民主和钻研学术的特点。而最使我们学生敬仰的，就是先生对我们绝不提宗教，并掩护当时以政治见嫉于清廷之青年甚力。震旦学院创办不过一年，就成了国内青年向南方求学的目的地。

到了一九〇五年春季开学时，学生人数超过了二百，较创办时约为一与十之比。其间添建校舍、购置书器等费用，都取之于学生的学费，而经营出纳的都是学生选出的干事担任，先生提倡学生自治的主张，这时已经确见成效。至于学科方面，当然也迭有进展，不过自从第三学期期中起，已经渐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分歧。当时，天主教会难于提供英文科目足够的教师，而法文科目的教师则颇为齐备。此种分歧延至第四学期更为明显，我们彼时认识的天主教英美教士远不及法国的多，因此学习英语发生困难。先生虽极力向教会磋商，但终难于从根本上解决。

第五学期开学，教会向学院提出了干涉学院行政的通牒，并且声称非有满意的答复，则其所拟派的教师将不来院开讲，同时以各科目的教师名单分别通知学生，其有关英、法文两种



科目的差别，较以前更为巨大。当时先生再三同教会商量，迄无结果。我们知道教会不仅决定攫取学院的主权，并且以有关法文科目的较为完备的布置来引诱学生专习法文，指望日后可以为法帝国主义者服务。这自然是先生和我们万不能容忍的，所以先生于一九〇五年三月间率领我们二百余人离开了学院所在地徐家汇老天文台，而着手组织新院。

先生率领学生离院之事，充分表现了其民族自尊心，所以组织新院之举，获得了海内热心人士的赞同。同年七月成立了复旦公学，公推先生为校长。先生请于当时的两江总督，不仅拨到了临时校舍和一部分开办费，而且拨到了永久的校基和常年补助费。又因为复旦公学既已成立，则震旦学院永不复存，设日后仍有人以震旦学院做号召，自然是影射名义，于是先生又会同名流多人登报声明此意。其后天主教会果在徐家汇老天文台利用旧的名义另设“震旦学院”，并拥戴先生做创办人，不仅事近离奇，且亦颇生疑义。其后此学院升为大学，终于一九五一年由人民政府接收。至是我们才知道先生有捐款教会的事。根据有关文件，我们更知道先生的原意是要教会开办中西大学堂，而立约多年，教会未开办，继乃想巧夺我们的学院据为己有，以搪塞先生；终又因复旦既已成立，遂硬用震旦旧名续办学院，以便支配先生的捐款。

此后六、七年间，先生的精力几乎大半耗于复旦公学。历年延聘名师，整理科目，使之成为东南重要学府。后先生北上，但仍荐贤自代，且随时尽其维护之心，复旦之能由公学扩大而为大学，正赖乎此。

辛亥革命军兴，临时政府任先生为南京府尹兼江苏外交司长，旋兼代江苏都督。那正是百端更始之时，而先生的擘画能使中外翕然，尤善于以诙谐的语言阐明政治真理，使意气用事的武人心悦诚服。袁世凯从前在朝鲜时，想师先生而不可得，等到篡夺总统职位定都北京，乃通过教育总长蔡元培请先生主持北京大学。先生明知袁世凯不是个诚心为国家民族服务的人，不过教育事业是百年树人大计，及时振励也是得策，所以应允北上。到校以后未及设施，袁世凯政治面目日见狰狞，先生遂即去职，与英敛之等创办西山讲学社(辅仁大学前身)，又办了培根女校。其时先生犹冀袁世凯能作树人之谋，建议取法欧洲的学术研究院，在北京成立函夏考文苑，以作研究高深学术的大师，且为之筹画固定基金，不烦另动公款，世凯阳为许诺而终不肯开办。嗣后先生对政治日益灰心，虽旅居北京七八年，然只和旧日信仰相同的教侣往来，而与所谓朝士伟人者隔绝。至于参加文化性的集会，则先生的兴致始终不衰，且每每发挥亦庄亦谐的演说，以警醒国人共负振兴国家民族的责任。同门南昌黄远生曾笔述先生于一九一三年春在北京的法律学会成立大会的演说词，略谓先生首则指斥当时全国无论南北，眼中均无法律，误解自由，以致放肆横决，毫无秩序。不知法律一词，在语源上不论中西均有束服之意，故此种有束服的自由乃人类的自由，其反束服者非是。继云，惟其无秩序所以无建设，所以不能同心协力以谋公共之利益，所以不能发挥人类的理智和灵感。试问现在号称建设之中枢，其建设之道安在？终乃根据事实以作比喻曰：“某某门生奉职于各署者不乏

人，问其每日所事，大都自称无事可做，到署之后，人人口衔雪茄，眼望钟表，时刻既到，则命驾归家而已。此与前清积习何异？彼部署林立而无事可做者，正以执政者无秩序，以致无从造成有组织有系统之政治故也，正以国家无齐一之法律，如原则细则之类故也。国家如此，是以所谓总长、次长、司长、金事、主事之流，在职位上虽有高低之分，而权其轻重，不过是在一所大庙之中，安置数尊菩萨、二十四金刚和无数小型的土偶木偶。所以既令其能清洁克己，不贪赃不枉法，亦不过金刚政府、菩萨政府而已。”先生说至此，声色俱厉，继续说：“今欲求法律之普及，此决非手枪炸弹所能为力，亦断非某党某会所能号召，且其责亦不在政府，而仍在我辈能以平等之身建设国家耳。”

一九二〇年冬，先生从北京回到上海，休养于徐家汇南的土山湾。彼时国内南北军阀交哄已经数年，而且一年比一年扩大，先生虽已年过八十，但于斥责军阀、反对内战、培养民生、提倡民治种种问题，休养之中仍不断发表意见。其意见集中的著作，首推《民国》、《民照》、《心镜》三篇，全文约二万言，都是警醒民国的人民如何内省以作自救的，就中斥责袁世凯之处屡见不鲜。先生又取旧时给门人讲授过的《致知浅说》的原稿加以整理，写定了卷首的《原言》篇问世，虽其《原行》、《原道》各篇未能脱稿，但首篇定名之慎审，立论之精确都是空前的。“九·一八”之变突起，国难日亟，先生愈益大声疾呼，对国内上下尽力说明救国图存的大计，肯定非从事于团结精诚无以敌日寇方张之焰，灼见所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这当然是和

蒋介石的意识相反的，也当然是被他嫉视的，不过因为先生是海内人望，蒋未敢加以迫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因法国教士违背诺言，停付应给先生的生活费，造成老人生活困难，于右任闻之大怒，说以后马老再不要用法国教士的钱了，乃于一九三七年为老人申请安排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先生移居桂林约一年，后取道越南转昆明，而衰病日增，仅仅行至凉山而止，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溘然长逝于凉山旅寓，上距先生诞生之岁刚好是一百年。遗体于一九五二年归葬于上海新泾区息焉公墓。十年浩劫中公墓被毁，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决定迁葬，墓址暂定在上海万国公墓，迁葬时间定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先生诞辰一百四十五周年。

先生的著述除已列举的以外，尚有关于宗教的甚多，但先生对门人数十年无一语涉及宗教，所以我们不能赞一词。不过，我们当时曾闻先生对来自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天主教教士多不满意，因此类教士恃其本国在中国取得的领事裁判权，所有行动每超出宗教范围，于是先生遂起而与之斗争。天主教友徐君曾发表论文，述及先生当年斗争事迹，认为国内天主教信徒之激于爱国热忱，奋起而对帝国主义展开斗争的，先生是第一人，先生事迹在天主教徒中早已留下很大影响，成为榜样。至于世传的《马相伯先生文集》，是教会中人方豪所编，凡例严谨，可称最能使人窥见先生意识的读物。其他关于先生的言行的记述尚有好几家，不过其所叙的年代、地点或有关制度则多与历史真实不符，甚至有的超出常理以外，我们未敢认为信

史。

附记：

马相伯先生捐产天主教会助学之事，我们已在传略中一再提到。为了赞扬先生助学热忱，揭露帝国主义分子假借此项名义进行文化侵略的事实，特作此附记。

一九五二年秋初，先生令媳马邱任我邀集先生门人在上海者二十多人，出示先生捐产助学的文件，其中多数系先生手写的墨迹。我们诵读再三，不仅了解了先生最初的决心和最后的遗憾，而且进一步了解了前后数十年间种种有关前后两期震旦学院经过。这里所说“前后两期”，就是以先生于一九〇三年创办的为前期，而一九〇五年以后由教会袭用旧名所办者为后期。此项文件中有五件是很重要的，今摘录于下：

第一件：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八月，先生以自己分得之遗产全部捐出作助学之用。其书面原文曰：“全部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门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当时先生将自己名下青浦及娄县之稻田三千亩捐为基金，亲书字据设立“典于记”名义，交与教会管理，以示与教会的一般产业有别，此外又捐出全部私产现金四万元作为在卢家湾购买校址及建造校舍之用。又捐出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地皮八处，价值十余万元。

第二件：一九〇四年（清光绪三十年甲辰）三月，先生认为第一件内各项捐赠的用途未免太狭，通知教会，把第一件中引号内的语句改为：“予捐给个人之财产于耶稣会，以备资助学生或耶稣会会长所认为适当之其他用途，如设立或维持耶稣会所

办以西学教授中国学生之高等学校。”此项语句系用法文书写，由教会译成中文，以对照的方式宣布。

第三件：一九三一年，后期的震旦学院，久已升为震旦大学，因照章成立校董会时公推先生为主席，遂用先生名义呈请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准予立案，并照章填具表册三种候核。其呈报事项表节要内称：“资产金及其他收入之规定：现有校产在四百万元以上；经常经费有庚子赔款利息，马相伯之田租捐赠，耶稣会教士之捐薪，而最大项目厥为耶稣会之尽量补充一应不足之经费或其他收入之详细项目。”“资产项下：估计地基价值二百万元，建筑一百万元以上，图书、仪器、标本、校具约共一百余万元……。经常之收入：为中法文化费所拨庚子赔款利息每年规银五万两，马相伯捐赠泗泾田租每年一万元，耶稣会教士之捐助薪水十六万元，耶稣会补足费以尽量补足各种需费为度，故无定数，去年为九万四千元，学生学费五万元，宿费一万元。”

第四件：同年十月先生之令媛徐马宗文及令媳马邱任我，因为第三件所列之先生捐赠项下不实不尽，乃以震旦原创办人的家属名义，另行列出细目，呈请南京教育部察核。她们在提到捐赠项下时声称：“除泗泾田租外，尚有（一）上海法租界地皮六七处约十余亩，（二）震旦校基地皮约五十余亩，（三）榨油坊一所售价十万元，（四）泗泾田亩租积余增购稻田三百亩，（五）现金五万元。”（注：三千三百亩的每年田租约在旧斗三千三百石白米以上）她们同时又说到震旦大学之办理情形，“该校是否照国家教育规程办理，原创办人既老病侵寻，因以无从得知，惟

念偌大基础于教育上苟不能有长足进步，亦殊与原创办人之原旨背驰。至于校董一节，关系学校至重且巨，尤应就热心教育及与学校有深切关系者遴任，方能发展教育，巩固校基，故提出之时先须慎重考虑，既任之后尤宜使负全责。”（注：该项校董共八人，四人是商人，四人是教士，而以先生居主席之名。）

第五件：一九三×年×月先生因对第三件所列呈告教育部的文书及表册等深为不满，遂亲笔书出备忘录一纸以志遗憾。首述捐产兴学之根由及意志，次言：“至民国十六、七年（一九二七、八年）间，租界法权归还，并有收回租界之说，西籍教士乃有将震旦大学迁往西贡之秘密商议，因恐相伯干涉而中止未敢实行。延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方呈报教育部立案，但将相伯以全部产业创设震旦之根由始末概未叙及，并乘余病重时组织校董会，聘请校董多未邀我同意，以致所聘任者均非教育界及与震旦素有关系的人物。况其呈报教育部事项表节要内，尚有所谓耶稣会教士之捐助薪水每年十六万元云云。查耶稣会教士矢愿服务教育，除供养衣食外例无薪水；且震旦担任教授之教士，试问其得有博士学位者共有几人，而每年竟有十六万元薪水捐助震旦，不免失实。至余所购之校基与指作经费之地产，除仅于呈报教育部之事项内承认田租一万元外，余皆抹煞不提。故书亲笔记录以资备忘。”

## 记马相伯先生两三事

韩景琦

马相伯先生是我国近代闻名中外的教育家，宗教界爱国领袖和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关于他的为人和生平事迹，记述者很多。笔者曾随侍先生多年，亲聆教诲。兹回忆若干事，藉志纪念。

### 一、八十岁学吹打

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早在中年即已蜚声国内外，被誉为“一代宗师”。但他一生好学不倦，从不自满。一八七二年任徐汇公学校长后，除综理校务、兼任教学外，仍悉心研究哲学及数理科学，译书一百余卷。一九一六年辞去袁世凯总统府最高顾问，隐居上海土山湾乐善堂，更是潜心学术，孜孜不倦，终日手不释卷。八十岁时，临池学习书法，九十岁时又学习绘画，常笑着对人说：“我是八十岁学吹打。”虽是戏言，但他那种不断学习的进取精神，老而弥笃，确是我们后辈的楷模。一九三六年，于右任在先生九六寿辰庆祝会上说过，“三十年前，夫子教诲我们，以不读书不足以救国，不研究深邃科学，更不足以救当前的中国。右任回味师训，更引班志语‘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作为当头棒喝。夫子耄而好学，手不释



卷，尤足为后辈楷模，右任深信国人能秉承夫子努力读书之诚，则中国必有长足之进步。”

马老对读书学习有独特之见，在他晚年将全部藏书捐赠丹阳图书馆时，曾对我们提出许多告诫：“（一）过目成诵是人们的天才，读书得间在人们的学力。（二）兀兀穷年，方知老夫手不释卷的回味。（三）钻在故纸堆中，要活读才免做蠹虫。（四）学海茫茫无梁筏，留心我下的苦功夫，便知有所抉择。（五）有些书成为海内外孤本，应该爱惜，更加要勤读。”这些箴言永远值得我们记取。

## 二、中国第一大演说家

马老多才多艺，能言善辩，早年即擅长演说，被誉为“中国第一大演说家”。故老传闻及我所亲见，有以下一些范例。

清光绪年间，马老为组织镇郡学会，在镇江思益学校发表演说，提倡新学。当时有一旗人大为不满，走上讲台，攻击先生，说是“劣驷不受鞭策”，“驽骀不受羁勒”等等，引起全场听众公愤，有人甚至要恣以老拳。马老从容大度，一面摇手制止，一面讲了几句冷隽的话，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大意是“千里驹要方九皋才知神骏，巢堂燕何尝不笑鸿鹄。”那人听了，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会场。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颁布预备立宪的上谕，马老适在南京，应两江总督邀请，在两江大操场演讲两个多小时，演辞通俗而有系统，把世界民主和君主国家的政治利弊和立宪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听众没有一个不满意，无异上了

一堂宪法课。

马老在中国驻日本公使馆任参赞时，有次公使宴请各国使节和日本官员名流，大家要求他演讲。马老对东西方政治、社会有一定的看法，但在这种外交场合是不能得罪任何人的，于是他从容地说：不久前我在欧洲游历，看到西方的政治舞台五花八门，西方的政治的确比东方清明，西方的社会的的确比东方进步。我看到这种情形，不胜赞叹。现在来到东方，看到东方政治舞台上有一面大镜子，竟把西方政治舞台上的东西一模一样映照出来，我很惊奇，好比学生效法先生，青出于蓝。先生好，学生也好，我恭维先生好呢，还是恭维学生好呢？……当他演说完毕，掌声如雷，四座外宾纷纷趋前和他握手致意。后来马老对我们回忆那次演说情景，还很高兴。

辛亥革命后，有次在上海张园安凯第举行中美法联欢会，马老和外交家伍廷芳应邀参加。两人分别用法语和英语即席发表演说，也是议论风生，言惊四座。

马老对演说很有研究。他认为演说不要浮于形式，而应注意内容，又要研究方法和技巧。他在创办复旦公学时，就提倡学生演说，定出讨论题目，由学生各抒己见，并进行评比。他先给学生讲述演说方法，怎样开头，怎样分段，怎样发挥，还得以动作助语势。学生根据他的指导进行准备，演说后再由他评论得失所在，有时还作示范性演说，让学生观摩。有时先由一学生上台演说，然后推举一两人加以批评问难，使学生都能发挥意见，从而调动学习演说的积极性，贯彻互励互学的教育方法。马老说：“演说只是人类社会发表意见的一种工具，擅

长演说的人不一定就是好人，但真正有才德的人，其演说必有可观。这就叫做‘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

他演说不大用稿子，有时备而不用，每每随意发挥，恰到好处。一九三八年，他在复旦同学会祝贺他九十八寿辰的集会上讲话，讲了一半，接不上来了，他风趣地说，“老机器不灵了！”后来看了一下稿子，继续讲下去。在这次讲话中，他严肃恳切地说：“老夫三句不离本行，现在国难当头，盼诸君奋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各尽其力，大献身手。大家一齐起来，中国前途有望。老实说，这比为我祝寿更重要呢！”言为心声，对老人忧时忧国的心情，全场的人都有深刻的体会。

### 三、造福桑梓

马老诞生在江苏丹阳县北乡马家村，但早年填写籍贯往往写丹徒，晚年才改写丹阳。我曾为此事问过他老人家，他讲了一段情节。原来在清代，他和胞弟眉叔（建忠）在丹阳应童子试时，丹阳一伙头脑冬烘的读书人，为了他兄弟两人有些文名，怕占了生员名额，便拿他家信教作为攻击的把柄，反对他们应考。恰巧丹徒方面有人拉拢，他父亲又在丹徒行医，并开药店，这样就在丹徒县入泮，所以后来有时写丹徒籍贯。

辛亥革命后，我舅父姜祉禅任丹阳县民政长，邀约马老回乡商谈家乡建设计划。马老根据王可庄太守引河遗法，计划将丹阳练湖全部面积划成一个大“井”字，边浚边垦，纵横各开引河两道，浚深河床，挖出的泥土叠成高高的土墩，种稻栽桑，不怕水淹，也不怕旱涸。引河内蓄养鱼虾菱藕，还可通行游湖

的瓜皮艇。四围堤岸，广种果木，不但环湖风景改观，且大绝大收益。然后修复四闸九涵，随时蓄泄，灌溉受惠的田亩很多，坐收农田水利和水上交通之效。当时沿湖农家思想保守，群起反对，聚众请愿，要烧我舅家的房屋。马老见情况如此，叹息而回，后来和我谈起，引为憾事。抗战胜利后，我乡束云章世丈根据马老规划原意，对练湖进行浚垦改造，建立了练湖农场，可惜马老未及生见。

马老对家乡建设一贯关心，晚年将全部私人藏书数千卷，捐赠丹阳图书馆，经地方人士和旅沪同乡会商定，准备就原有图书馆扩建为相伯图书馆，以作纪念。他的藏书中有手写《出使高丽日记》一巨册，还有康有为未刊行著作数种。可惜这批图书运抵丹阳，还未打开书箱，即被日军炮火烧毁，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抗战胜利后，我们准备恢复相伯图书馆，请于右任、柳亚子、邵力子诸先生主其事，并得李宗仁将军赞助，因计划宏伟，一时未能实现。一九四八年，在丹阳建立相伯农业技术学校以纪念他老人家。并辟有小农场为学生实习场地，由马老外甥朱光尧先生和我等主持董事会，惨淡经营，粗具规模，解放后移交政府管理。

由于马老对家乡感情深厚，造福桑梓，在他逝世后，乡人在追悼会上共上私谥“文敏先生”，以示崇敬。

# 记震旦学院几件事

陆 章 甫

## 一、震旦学院创立经过

震旦学院成立于一九〇三年，系马相伯一手创办。他自任院长，教师则请教会派神父义务担任。校舍除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外，自建三层楼房一所，上层为宿舍，中层为教室，下层为饭厅。最初开设英法文各三班，我于一九〇四年秋季考入英文第三班。除法文班、英文头两班和数学等课系由神父任教外，英文三班即由头班学生张元济（即张菊生）和沈步洲两人任教。另有头班学生邵仲辉（即邵力子）、项伟臣（即项襄）、叶仲裕等分任校务干事。当时校工亦少，一门房，一摇铃杂差，并炊事数人而已。马氏主张因陋就简，勤俭办学，故校务多由学生担任，养成自治风气。每星期六晚上有擅长音乐的神父来教音乐。星期日则由马氏演讲时事或学术，无一定范围，他总是广征博引，启发学生努力向前，并常以谈笑出之，故学生极感兴趣。记得有一次演讲中，马氏谈到：“我们中国是一个古老守旧、贫穷落后的国家，必须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庶可挽回颓势。也必须朝野人人觉悟，振作起来，彻底改革。我们建设切不可效法欧美，因为他们已很发达，浪费些不在乎，我们如何

有此财力？借债要还，并且条件苛刻，好处得不到，主权先已丧失。我们只能向日本学习，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各种建设都从勤俭节约着手，靠全国人民紧张努力，几十年中俨然进入世界强国之列，成为不可轻侮的工业国家。他们是一个岛国，经常遭受飓风、海啸、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但并不能阻止他们奋发图强，我们应当从中得到启发，有所振作，群策群力来建设国家。”这一席话我至今留有深刻印象。

## 二、震旦学院曾开哲学课

震旦学院招生章程，首先揭示不涉宗教。入学考试只要写国文一篇，视其是否通顺而决定录取与否，因之学生入学都已具有相当知识。当时课程，每周有一次哲学课，内容却是宗教哲学，由一个中国神父李问渔讲授。当讲到天主创造人类、天主创造世界等问题时，学生纷纷起立，引征达尔文学说加以反驳，使李面红耳赤，无法解答。

## 三、于右任入学经过

我在震旦时遇见一很奇特的同学，名刘学裕，与我同一自修室，同一宿舍，但他既不与人往来，也很少与人谈话。他读法文班，但从没听他读过法文，有时竟伏在课桌上瞌睡。在宿舍中，他常执一诗集，低声吟哦，人家去看他，他只报之以一笑。他的发辫早经截去，满面黑胡子，连嘴都看不见。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于右任，因为宣传革命，当局要逮捕他，经他老师暗中通知，于是化名改装逃来上海，有人把他介绍给马相

伯，马就把他收容在震旦。以后于和汪寿丞等办《神州日报》，失慎被焚后，又办《民呼日报》，被封，再办《民吁日报》，被英帝国主义应上海道要求，拘押相当时日，结果逐出租界。随后临近光复之前，又在法租界办《民立报》，持论激昂，极受拥护革命人士欢迎。

## 叶澄衷与澄衷学堂

王 震

叶澄衷，原名成忠，原籍浙江慈溪，后其祖父迁居镇海西管乡庄市镇附近，改籍镇海。九岁父亡，入庄市镇三和豆腐店当学徒。十五岁学徒期满，因对老板娘不满，一年后离开该店乘船来到上海。到上海后，为一开设杂货店的姓朱的人所收留，并经他介绍到码头当搬运工。两年后，他用自己的积蓄购买了一条小船，往来于浦江上供应外轮所需货物。后在岸上开设一家小杂货铺，以经营五金起家。先后在上海开设老顺记、新顺记、南顺记、义昌成，在汉口开设汉顺记，在天津开设津顺记，成为巨富。他还办有纶华缫丝厂、燮昌火柴厂、可炽铁号等企业。一八九九年在上海创办澄衷学堂。

叶澄衷在上海办学堂的起因是：一八九八年，他拟在虹口地区创办缫丝厂，有一天前往张家浜（今在新建路附近）一带去看地，见一群儿童聚集在河滩边争捕蝌蚪，此时正值虹潮初涨，便劝儿童们离滩作他嬉，儿童们不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澄衷归后深思，因此，产生了办学校的想法。次年某日，他备筵两席，约请规模较大的各肆经理，如樊棻（时勋）、陈祖烈（瑞海）、王予坊（海帆）、叶志铭（洪涛）、曹予璋、阮可钧、乌洵夫等会谈。席间，澄衷宣布拟设一学校，以教化儿童，并



愿列位兼董其事。列席者皆发言，有主张设育婴堂，有主张办医院，有主张开施材局，有主张办其他社会福利事业，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独樊、陈两人坚持澄衷意见，力排众议，始行决定。议毕，澄衷捐地一块，银十万两，托列席者分头接洽，购买张家浜地区的土地，建造校舍，并推定樊棻为接洽办学的负责人，陈祖烈为建筑校舍的经管人。一月后，购就十八亩九分余地，每亩价值二百元左右。翌年，正式聘请樊棻、陈祖烈、王子坊、曹子瑜、乌询夫、叶志铭六人为校董。山余记工头承包建筑校舍，建造罗马式两层楼房计四十二间，教师宿舍、膳厅两层楼房计二十六间，小养正里平屋十五间，并设置一印书处。建筑校舍时，美国人福开森访澄衷曰：中国人少持久性，办学固是好事，何以善后，很难逆料，不如仿聂中丞例，献出虹口荆州路若干地皮给英工部局，由局方代为创立聂中丞公学（即今之市东中学），以校有土地和资财授权于工部局办理，可资永久而享盛名。叶婉言却之。同时又有上海尚贤堂教士李佳白访叶，劝他改办医院，叶答以志已决，且已宣诸社会，决不可中途变更。从此遂无人阻其事，校舍继续加紧施工。

一八九九年农历十月三日，澄衷病逝。临死前，遗命樊棻、陈祖烈、曹子瑜、王子坊、叶志铭、阮可钧、叶雨庵、乌询夫八人董理校事；学校经费由老顺记、南顺记、义昌盛三肆分担，可定一值年制，周而复始，由经理兼校董者分掌其事。学校体制和一切规模与设备应完全取决于校长，我子我孙尤应善绍我志，勿参与校事，希望大家共同协助，力促其成。又对诸人说：我的立校意旨，大半出于自己的感伤，我今授意君等，清

人将我意撰成一联，悬于礼堂，以明我志。嘱毕，不数日而逝，享年六十岁。

武进人赵凤昌，孝廉出身，与樊相友善，推荐同乡刘维屏（号葆良）任校长。刘系翰林出身，供职部曹，时适丁艰守制于家，一经接洽，刘欣然允就。在校舍将竣工时，刘即部署一切，定校名曰“澄衷蒙学堂”，请张謇书额（额系石制，嵌于前埭屋前），并聘蔡元培任总教习，临海章一山任副教习，南通白作霖为监起居（即后来的舍监），并仿宋人胡安定讲学制，设东西两斋，依年龄分教室。同时又筹办澄衷蒙学堂印书处，仿点石斋例，石印讲义，有教师数人兼任编辑，所出课本至今还有流传。有《字课图说》一部，共计四册，指事清晰，为时人所称道。

部署粗定，即由校董樊棻等请于当道立案，由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余联源（字晋珊，湖北蕲水人，出身榜眼，后升浙江巡抚）详准两江总督刘坤一转详督学部堂大臣赵书翘核准办理，并奏请付国史馆列传。文到时，适在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的春季，即启用铃记，开始招生，定额为四十名，择于农历四月十六日开学，后即定此日为立校纪念日。

当时所聘教职员计有八十二人，均供膳宿，每人各居一室，生活起居，设备齐全，笔墨文具概由校给。所招学生，除免纳学费外，并发给书包、课本和竹布长衫。其后来学者众，又添设英语班和法语班，开始酌收学费，每年定为二十元（每学期十元），直至一九二七年以前，绝未增加。后又缩减免费生名额，计中学（添设中学始于一九一三年）四十名，小学二百

名。

一九〇二年秋，刘校长守制期满，出任安徽芜湖观察使，校长一职由总教习蔡元培代理。初开办的一年中，耗费极巨，司年各店啧有烦言，而蔡校长更有扩充蒙学、添办师范之建议，各校董集议多次，设法维持，因谋于叶公长子松卿，松卿愿以析产所得十万两，献于学校。不足，赵凤昌进言于叶公诸子勉卿、子衡、又新、铁卿等，共襄助十万两，因之经费困难得以解决。是时各校董戒于过去支用无度，集议持久办法，谓可废各店司年旧制，购置不动产，坐收其利，充作学校基金，使之永有保障。于是购进三十七亩余地，建造房屋出租，别以东、西、南、北、新、中六处养正里，附属于叶公所设的经租处，号曰“树德公司”，由老顺记总其事，从此学校经费有长期稳定的来源。

一九〇三年五月，蔡校长联系革命党人，创办爱国学会，为清廷所侦悉，仓皇出走日本，遗职由章一山代理。其后章氏去职，由南通人白振民代理校长。白氏任职不久，由校董会改聘常熟蒋子帆为校长。一九〇五年，中学班突起风潮，蒋氏去职，校董会改聘武进谢利恒为校长，停办中学，专办小学。一九一一年，上虞人曹慕管自日本留学归国，校董会聘为校长。翌年，添建校舍，复办中学。曹氏任职十六年，继其后而任校长者，为葛祖兰、励乃基、陈彬和、吴友孝、王震诸人。

当学堂正式开学时，督学部堂颁给匾额一方，文曰“启蒙种德”，系清帝光绪“御笔”。又有“械朴权舆”四字匾额，系喀刺沁王过沪参观时所赠。还有其他一些匾额，均挂于大讲堂中。还有署

镇海叶成忠撰、阳湖汪洵书的联语挂于礼堂中，上联是“余以幼孤旅寓申江，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思秉烛；”下联是“今为童蒙特开讲舍，所望髫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叶公死后，为了纪念其斥资兴学，特修建怀德堂，英工部局总董华尔和董事福开森赠送高寻丈的大钟，置于七寻高楼上，附近居民称为“虹口大自鸣钟”。一九二一年为纪念学校成立二十周年，由校友会发起，并得到校董赞成，建立叶公铜像一座。一九三一年三十周年纪念时，葛祖兰校长向校董建议，建造“世美堂”高楼一所，以赞扬叶氏父子斥资兴学的功德。学堂开办以来，购置古籍甚多，搜集各地方志，尤为完备，为了便于阅览和查考，这些图书分置在藏书楼与图书馆两处。

一九三七年淞沪战役爆发，学校地居虹口，首遭沦陷。日军占领后，先把它作为兵站，后改为国外无线电放送处。除在抗战中被日机轰炸破坏外，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四日，学校又遭来自重庆的美机的轰炸，损失更巨。

一九五一年六月，我以年老退職。一九五六年人民政府将学校改为本市第五十八中学。

（黄鉴铜 整理）

## 记上海三所教会大学

葛 祖 兰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除武装侵略、经济侵略外，还通过传教、办报纸、办学校、办医院等，进行文化侵略。有的帝国主义分子公开宣称，“传教对于获得殖民地有大功”。在广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英国驻上海领事说：“给广学会捐一元钱，等于两军交战时枪中发出一颗子弹。”李提摩太解释说：“办广学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中国人民的反帝思想和行动。”伦敦商会负责人曾说：“节省些广告费到中国去办学校，可使中国学生和学生的亲友变成我们的活广告。”如此等等，可见他们在中国举办文化教育事业的用心。

鸦片战争前，一些国家就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鸦片战争后，开始在广州、福州、厦门、上海、宁波各口岸设立教堂兼办学校。当时它们所办的学校都称作书院，因为那时清政府在各府州县都设有书院，所以它们也跟着称作书院。这些书院也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列入课程，同时讲授算学史地，但最着重的是传播新旧两约圣经。别的功课不及格可以补考，惟独圣经不及格，即有被斥退的可能，足见其重视传教。

那时在上海的基督教会有好几个宗派：即安立甘会（后改称中华圣公会），卫斯理宗（亦称卫理会，其中最大的为美以美

会，卫理会中的一部分，也有沿用旧名监理会者，一说卫理会是由监理会改称者），长老宗（亦称长老会、后改称中华基督教会），浸礼宗（亦称浸礼会，又略称浸会），路得会（亦写作路德会）。这五大宗派都办有书院。其中办得最早的为裨文书院，其次为清心书院，再其次为圣约翰书院的前身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等。这些书院后来有的改为中学，有的发展为大学。此外教会还在上海直接兴办大学。本文就作者所知，叙述解放前上海的三个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沪江大学的沿革和概况，供史家参考。

### 一、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的前身是圣约翰书院。圣约翰书院是一八七九年合并培雅、度恩两书院而成，具有美国式学院的雏形，主持者为施约瑟主教（Bishop Samuel Schevshewsky）。施为俄国籍犹太人，生长于美国，一八五九年来中国，先在北京学习汉语，而后在华北从事翻译与布道工作，有十三年之久。一八七七年十月在美国受主教职，翌年十月重来中国。他认为安立甘会必须在中国办一个美国式的高等学校，因而积极从事创办圣约翰书院。一八七九年合并培雅、度恩两书院，即是他的主张。

圣约翰书院创始于一八七九年（一说为一八七七年，但按一九二九年刊行的《圣约翰大学五十年简史》来看，当以一八七九年为可信），至解放后院系调整的一九五二年为止，共有七十三年历史。初开办时，只有学生四十九人，第二学期增至七

十一人。一八八一年始授英文，第一个英文教师为美国姓施的女子，被称为用英语教授中国学生的老前辈。校址约有八十余亩。

圣约翰书院先后设立文理科、神学科、医科和预科。一八八八年圣公会传教士卜舫济(F.L. Hawks Pott)继任院长后，英文与自然科学并重。一八九〇年加拿大体育教师李嵩门来校，提倡开运动会，规定年赛两次，学生都不愿参加，越十年，始盛行。学校开运动会为圣约翰所始创。一八九〇年设大学部。越两年重建校舍。一八九五年首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当时不授予学位。一九〇六年，学校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后，始授学位，后来学生大学毕业后如在校多读一两年，就能获得硕士学位。甲午中日战争后，美国人顾斐德来校，翌年创军事训练，直到一九二〇年才废止。

校内学院，除文理两院(最初称文理科，后分为两院)一开始就设置外，神学院(最初称神学科)开办于一八七九年，主任为郭斐蔚(F.R. Graves)主教。医学院(最初称医科)开办于一八八〇年，主任为美国人文恒理。至一九一七年，与本雪凡尼亚医校合作，更名为约大本雪凡尼亚医学院，主任为美国人莫西亚。莫辞职后，由刁信德继任。土木工程院开办于何年何月，无从查考。农学院一九四二年始开办。理学院的格致室是在一八九八年添造的，后改称科学馆。科学实验室则在一九二〇年得美国煤油大王洛克斐洛资助后才添建。

大学原设有附属中学，一九一八年与大学分开。不久移入圣玛利亚女校旧址(圣玛利亚女校于一九二三年迁到白利南路，

即现在的长宁路)。时有名西门者捐资扩建校舍，因而命名为西门堂。订课程为三年，称附属高中部。大学青年会原在曹家渡所设的小学内，至是也改称附属初中部，校长为前高中教师履同庆。

同学会成立于一九〇〇年，分会遍于全国各大城市。自一九一四年五月假母校开大会后，以后每年五月在母校开大会一次。历届毕业生对母校的建设，多有捐助。

除同学会外，还设有校务咨询委员会。有重大事项，卜舛济辄就商于该会。

毕业生的出路，以海关、邮政两处为多。因为庚子年后，海关、邮政实权都操于帝国主义者手中，文件十九为英文，不通英文，不能入两处工作，而圣约翰学生的英文程度较高，故多被录用。曾任重庆关税务司的李贵荣，曾任邮政总局总务处长的朱孟侯，都是该大学毕业生中的前辈。除海关、邮政外，在政界中的名人亦有三十余人，如施肇基、顾维钧（为卜舛济所斥退，后留学美国）、刁作谦、史悠明、张祥麟、曹云祥、严鹤龄、刁敏谦等。在医学界有颜福庆、刁信德、刁有道父子，牛惠霖、牛惠生昆仲和倪葆春等。在企业界有刘鸿生、刘吉生昆仲，张嘉甫、吴清泰等。在宗教界有朱友渔、沈志高、毛克宗、汤忠谟四人，均受主教职。在金融界有周作民，科学技术界有吴纫之、徐凤石等。

校内建有纪念建筑物甚多，如：（一）怀施堂，建于一八九二年，纪念创办人施约瑟。（二）思颜堂，建于一九〇四年，纪念在该校服务最早的颜永京。教授和学生的宿舍均设于此。（三）



思孟堂，建于一九〇九年，纪念美国人教授孟嘉德。孟曾避暑庐山，为拯救友人而溺死。毕业生嘉其好义，筑此堂以纪念之，后充大学高年级生宿舍。（四）图书馆，建于一九一三年，纪念校长卜舫济任职二十五周年。馆中收藏中西图书甚为丰富，尤多善版孤本，美国客氏和平基金出版物咸藏于此。（五）体育馆，建于一九一七年，纪念军事训练首创人顾斐德。（六）交谊室，建于一九一八年，纪念卜舫济的已故夫人黄素娥。黄原籍福建，曾任圣玛利亚女中校长。（七）西门堂，建于一九一八年以后，纪念西门，因为他捐资扩建附中的校舍。

卜舫济任校长时，压制学生爱国活动，曾酿成风潮。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中，圣约翰大学学生坚欲参加示威游行，卜舫济横加阻止。学生大怒，全体离校。时有王省三、张寿镛等发起创办光华大学，容纳圣约翰大学离校学生。一九二七年因北伐军到上海，停办文理学院及高中，仅留神、医两院，教授们在外赁屋设丁卯学社，继续授课，学生学业赖以不辍。一九二八年后，设校董会，改组大学部，复办文理学院，沈嗣良任院长。不久，国民党政府下令，凡教会所办各级学校，必须在各省市县的教育厅局与南京教育部立案或备案，圣约翰大学拒绝立案，因而其毕业生的出路大受影响。一九二九年一月，沈嗣良兼代副校长。抗战开始后，卜舫济仍任校长，到一九四一年日本对英美宣战，卜入集中营，校长一职由沈嗣良担任。抗战胜利后，沈嗣良被捕入狱，校务由新组织的委员会处理，先由刁信德任委员会主任，继由吴清泰任主任，卜舫济的儿子乾姆斯·卜舫济（卜其吉）任文理学院院长。又开设春季始业班，

故一九四九年一月毕业生有一百七十一人之多，其中文理两院一百四十余人，土木工程与农学院三十人左右。

卜舛济在我国抗战胜利后回美，旋又重来视事，不到半年去世，由校董会聘请前沪江大学物理学教授涂羽卿博士任校长，时在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八年涂辞职，学校再组委员会维持校务。解放后，学生增加到二千四百余人。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归并，圣约翰大学各院系按其性质分别归并于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同济大学、华东师大、上海第二医学院。原校址由华东政法学院、华东体育学院及华东师大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系分用。一九五四年、一九五六年师大四系和华东体育学院先后迁出。

## 二、东吴大学法学院

东吴大学成立于一九〇一年三月，由苏州博习书院、上海中西书院合并而成，其本部在苏州天赐庄，为监理会所办。葛赉恩主持校政。开办初所授课程仅中学程度，至一九〇五年始开设大学课程。除办文理两院外，也办医科、神学科。后来医科仅办预科，神学科则并入南京金陵神学院，故在天赐庄的大学本部仅有文理两院。

一九一四年美国人兰金，创议在上海设立东吴大学法科。此在当时是一创举，以前全国各教会大学从未办过法科。兰金本系设在上海昆山路中西书院旧址的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校长。东吴大学法科于一九一五年九月成立，兰金任教务长。借用东吴二中校舍，二中日间上课，法科晚间上课。第二年，兰

金辞去二中校长，专办法科。

开办时没有经费，所有教授纯尽义务，当时经兰金请求允就义务教授职的，有罗炳吉，工部局总办费信悖，驻沪美国律师公会会长佑尼干及我国的王宠惠、梅华铨、罗泮辉等。

一九一八年夏，法科第一届学生毕业，获得法学士学位者七人。一九二一年教务长兰金因事去职回国，校董会推校长美国人文乃史，教区长美国牧师韩明德与中国人周承恩为委员，讨论办校方针，并聘美国人刘伯穆继任教务长。是年秋成立“型式法庭”，每两星期开庭一次，命高级生轮流实习。翌年四月，刊行中英文合璧的《法学季刊》。是年秋，第二届毕业生陈霆锐在美国获法学博士学位归来，特聘为专任讲座，又设比较宪法自由讲座。

一九二三年夏举行第六届毕业典礼时，授予罗炳吉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暑假后，学校迁入昆山路一〇三号新校舍，九月增办预科一级。美国人萨来德博士加入教授团，并参加校务会议。翌年二月，成立法律哲学社。六月举行第七届毕业典礼时，授予王宠惠、董康两人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暑假后，刘伯穆告假回美，请萨来德代理教务长，并任第三届毕业生已获博士学位的吴经熊为教授。吴曾在沪江大学肄业，当时兼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顾问。一九二五年夏陈霆锐辞职，聘第六届毕业生石颢继任。一九二六年增设法科硕士班，本科毕业后升入该班读两年后，可获得硕士学位，由萨来德任硕士班主任兼英美法教授。又聘德国高恩厚博士为德国法教授，法国宝道博士为法国法教授，董康为中国法教授，姚启胤博士为助教。

一九二七年春，法科更名为法律学院，由校董会聘吴经熊为院长，盛振为为教务长。扩充预科，聘胡适、林语堂、徐志摩、陈布雷、潘光旦为预科教授，又聘德国女博士翁刚夫人为教授。此时学生骤增，一九二九年夏因校舍不敷，将预科并入苏州大学本部。翌年将原来中英文合璧的《法学季刊》，分成中文和英文出版，中文的定名为《法学杂志》，英文的仍沿用旧名。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由于校舍靠近战区，损失极大，暂假西摩路华侨中学授课。翌年春，董事会聘周承恩任事务长兼训育主任。秋，又聘孙晓楼博士为副教务长。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吴经熊去内地，院长由盛振为代理。一九五一年盛振为被捕，校务暂由新组织的委员会维持。一九五二年大学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法学院撤销，各系按性质分别归并到华东政法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原校址归上海财经学院开办夜校部之用。

### 三、沪江大学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帝运动起，在我国内地传教的外国传教士逃到上海。江浙两省的浸礼会牧师集会，有人提议在中国办一所大学。第二年成立联合委员会，万应远牧师与北浸会（即浸礼会的略称）会友磋商于上海，柏高德牧师与南浸会会友计议于浙江，决定南北两浸会通力合作，先在上海办程度较高的神学院（当时称道学书院），而后再办大学。

为贯彻这个计划，万应远、柏高德两人先后回美筹措建校

经费，美国南北两浸会均允捐巨款以助其成。两人返华后，一面选定杨树浦黄浦江边军工路一带作为大学校址，兴建校舍；一面在北四川路租屋先开办神学院，时为一九〇六年。北浸会所办的绍兴道学书院归并于此，学生全部在此肄业。

沪江大学于一九〇八年正式成立，最初的校名为浸会大学堂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初分两部，即大学与神学院。柏高德担任大学校长，万应远担任神学院院长。一九一一年，大学与神学院合并，柏高德回美，由南浸会的戴佐施任校长。戴生性固执，任职不到一年，校内即发生风潮。原因是学生要求援圣约翰大学例，在复活节和清明节放假三天，戴坚不允许，且欲开除要求放假的学生，学生遂全体离校。董事会召集紧急会议，派北浸会神学教授魏馥兰(F. J. White)和中国教授董景安（鄞县秀才，宁波浸会中学教导主任，由魏馥兰邀请来神学院任教授）两人出面调停，全部接受学生的要求，一场风潮才告平息。董事会将戴撤职，任魏馥兰为校长，魏推荐董景安任副校长。

一九一四年春，董事会易校名为沪江大学，英文仍沿用旧称Shanghai Baptist College，简称Shanghai College。

大学校址原只有一百六十八亩，后来扩充到三百四十亩。高楼大厦陆续建立起来，第一幢为北房，一九〇七年神学院由北四川路移此。大学的膳厅亦于此时竣工，可容三百人同时用膳。最初的主要建筑物为思晏堂。这是为纪念第一个来上海传教的晏马太而建的。此堂落成于一九〇九年，据说共费四万元。一九二五年前，大礼堂、校长及秘书办公室、图书馆、理

科实验室、大学与神学的教堂，均在此堂。预科学生的宿舍，也在此堂的四层楼上。过了四年多，第二幢大厦竣工，这是为纪念神学教授裴拉克而建的，故名为思裴堂。堂高四层，第一层充大学教室，第二、三层充大学高年级生宿舍，建筑费二万二千元，为美国米苏利浸会所捐赠。一九一六年普济医院落成（在校门附近），建筑费八千元上下，为校内外师生和社会人士所捐助。主任医师为美人雷盛休，助理医师为陈葆真。除为校内师生治病外，并为附近居民治病。一九一七年体育馆落成，建筑费二万五千元，美人郝司开大佐独力捐助。馆长一百十尺，阔五十尺，高二层。一九一九年四层大厦思伊堂落成，建筑费六万元，后充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宿舍及教室之用。一九二〇年师生集款建游泳池。一九二一年四月电灯厂落成。一九二二年科学馆落成，建筑费二十万元。物理、化学、生物学的教室和实验室均设在科学馆。一九二二年游泳池建成使用，中学上院亦竣工。上院竣工后，大学与附中完全分开。上院建筑费六万元，为美国南浸会所捐助。一九二三年女生宿舍楼落成，建筑费十万元。一九三一年后，建造图书馆、大礼堂。抗战胜利后，又建造了第二女生宿舍与教授住宅。

一九一七年冬，美国佛吉尼亚州的教育部授权沪江大学颁发学位，承认沪大毕业生获得的学士学位。从此凡读完大学课程而平均分数得三分的，均能获得文学士或理学士学位。凡要得硕士学位的，第一必须先获得学士学位，第二必须至少读完二十八个学分，且平均分数不得在二分以下，第三必须写一篇论文，五月一日以前送交教授会审定。

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三十二年中共有毕业生一千七百四十余人。一九四五年起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止的八年中，共有毕业生多少人无记载可凭。据胡尹民同志回忆，一九四七年毕业生人数为一百五十一人，按此推算，八年中毕业生至少有一千人左右。

毕业生有同门会的组织，在校学生也有以下一些组织：（一）属于宗教的有男青年会、女青年会、恩亲会、祈祷会、立志布道团、让道会、公民社、夏令会等；（二）属于钻研学问的有政治学社、社会学社、商学社、教育研究社、科学社、好学会、中文辩论会、英文辩论会、文学会、国语研究会等；（三）属于学生自治的有学生会、学生自治会、各级班会等；（四）属于艺术的有中国音乐会、西乐社、演剧团、英文剧团、摄影社、美术社、歌咏班等；（五）属于出版刊物的有天籁社、年刊社、教会通告社、两广同乡会出版部、社会学社出版部、中学月刊社等；（六）属于体育的有沪大体育会、足球会、棒球会、网球会、篮球会、排球会等。

\* 沪大的出版物约可分为三大类：（一）定期出版物，首推一九〇七年创刊的《上海浸会大学章程》。初是中英文合璧，到一九二〇年全用英文，通称《沪江大学章程》，共刊行几十卷。其次是大学年报告书，凡关于学校每年的财政，董事会通过的各项议案，以及其他各项报告，都列入这报告书中，也刊行了几十次。再其次是《天籁报》，一九一一年创刊，到抗战时停刊，抗战胜利后复刊。（二）不定期出版物，如科学社的《科学丛书》，两广同学会的十周年纪念刊，沪大《白朗丛书》的社会调

查等。(三)个人著作,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三〇年,教授的著作,比较重要的有董景安、胡尹民合译的《伯勒斯丁历史》,国文教授林朝翰著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历史教授张立民著的《纲鉴劄记》,国文教授王治心著的《中国基督教史纲》和《中国哲学史》等。

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三年,沪大因学生人数不多,体育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一九一八年东南六大学运动会后,沪大体育始渐有起色。所谓东南六大学,即上海的南洋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六大学运动会在沪大运动场举行,比赛结果,南洋第一,圣约翰第二,金陵第三,东吴第四,沪江与之江仅得四分,成绩最坏。从一九一九年起,沪大体育有了长足进步。其所以有如此进步者,有下列四个因素,(一)学生人数增多,校内比赛热烈;(二)物质条件改善,有设备齐全的健身房和宽阔平坦的运动场;(三)训练认真;(四)经费充足,最初每年运动费平均每人两元,一九二〇年以后平均每人六元。当时的体育教师为耆荷福(网球健将)、葛学溥、普体特(三人均为美国人)■教兵式体操和童子军的为美国人韩森与加拿大人伊文思(伊文思图书公司主人的儿子)。

沪大刚创立时,只有神学院略具专科性质,大学未分科分系。到一九一九年以后,始分为文科、理科、宗教科、社会科、教育科、历史经济科、商科等。一九一一年神学院与大学合并。一九二九年立案后,沪大英文校名改称 University of Shanghai,下设文、理、商三个学院。文学院设中文系、外文



系、教育系、社会学系、政治系、音乐系、历史经济系；理学院设生物系、物理系、化学系、化学工业系、数学系；商学院设会计系、国际贸易系、工商管理系、银行系。到此方始具备大学规模。

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除下令教会学校向教育部或教育厅立案、备案外，并下令各校的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沪大校长魏馥兰接令后，一方面进行立案，一方面物色校长人选。他先在毕业生中物色。当时毕业生中已获得博士学位的，有第一届的郑章成，第二届的鲍哲庆，第三届的马成钧，第四届的顾振亚、严恩椿、缪秋笙、姚传法，第五届的陆麟书、唐宁康，第七届的戴贯一、林天骥，第八届的李好善、林化成等。在这许多博士中，若照旧社会习惯，以资格、学问、地位论，应由郑章成担任校长，因为他是第一届毕业生，又是第一个哲学博士，在母校任副校长兼主任教授。但因为恃才傲物，不孚众望，加上美国人教授对他也有恶感，故未能中选。其余的不是年纪太轻，就是能力不够，不是远在国外，就是已投入政界，无人可当校长之选。乃求之于校外，聘刘湛恩为沪大校长。

刘湛恩，江西人，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后留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就聘后，大家都认为他能胜任愉快。郑章成出国讲学，副校长暂付阙如，教务长仍为第四届毕业生留美获得硕士学位的樊正康。魏馥兰留校担任哲学教授。学生由七八百人增到一千余人。又在圆明园路设城中区商学院夜校兼授新闻学，请董显光、张竹平、汪英宾、潘公弼等教新闻学。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沪大适在战区，不得不将图书、仪器搬入租界，并在租界开学。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件爆发时，沪大仍预将图书仪器搬入租界，并假城中区商学院与南京路慈淑大楼开学。翌年四月，校长刘湛恩为日伪特务所暗杀，校董事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请教务长樊正康任校长，学校继续开办。惟行政费及其他一切开支，几乎全赖学杂费收入，教授们的薪金也打折扣，所以有些教授不得不在外兼职、兼课。

一九四一年，日本对英美宣战，日军开入租界后，沪大改称沪江书院，任教育系主任林卓然为教务长。因在城中区开学，交通较为方便，故一时走读生增多，总数在一千五百名左右。抗战后期在重庆设有沪江大学分校，校长樊正康为了学校内迁问题辞职，董事会请朱博泉任院长，郑章成为院务长。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樊正康复任校长，郑章成、林卓然仍留校担任教授，教务长改由胡祖荫（沪大毕业后留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担任。因杨树浦军工路校舍需加修理，仍在市区开学授课。

其后沪大董事会认为樊正康能力不够，暗中物色校长人选，后来选中了孔祥熙的亲信，当时的印刷局局长凌宪扬为校长，希望依靠政治势力，发展沪大。凌为广东人，在沪大毕业生中是后辈，留美获得商学硕士学位，回国时由美国教会介绍，结识孔祥熙，任财政部秘书，曾随孔去英国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并去德、法、意三国活动。嗣后担任财政部印刷局总经理，抗战胜利后回上海。

一九四六年春，杨树浦校舍大致修复，全体师生回到原校，恢复三个学院，任林卓然为教务长，郑章成为理学院院长，李好善为文学院院长，郑世察为商学院院长，学生人数超过一千人。凌宪扬任职不到一年，被派赴美，校长职务由林卓然暂代。

一九四八年凌宪扬辞职，董事会组织委员会维持校务，直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为止。院系调整后，沪大原有各系按其性质分别归并到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华东师大、华东政法学院和财经学院。原校址办上海机器制造学校。

# 昙花一现的劳动大学

秦含章\*

一九二七年五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九十次会议，决定派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十一人为国立劳动大学筹备委员，先成立劳工学院，校址定在上海江湾，并将早经没收的齐燮元、卢永祥的两座工厂拨给劳动大学作为实习工厂。七月，劳动大学筹备委员会推定人员，负责筹建劳农学院，并请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将原上海大学全部校舍拨给劳农学院为院址。

一九二七年十月劳动大学登报招生，当时设有本科、中等科、师范班、训练班共四个班级，本科学生二百人，为第一批学生。翌年春，招第二批新生，本科仅收劳农及劳工两个班级，另招中等班两班。后来，除原有机电系学生一班外，又招土木系学生一班。师范班和训练班学生通过一年学习，于该年七月毕业。

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必须有三个学院，每个学院必须有三个系。因此，劳动大学在这一年分设工学院、农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工学院和社会科

---

\* 本文作者早年毕业于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系，现任轻工业部食品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承应约供稿，特致谢忱。

学院设在江湾，农学院先设在上海大学旧址，后迁至吴淞泗塘桥，与中学部校舍对换。

国立劳动大学属当时南京政府教育部主管，每年经费为八十三万元。校长最初为易培基(字寅村)，湖南人，系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农矿部长。一九三〇年，他为政事所迫，辞去校长职务，由王景岐接任。王是福建人，原系国民党政府驻比利时公使，已卸任。此外，由熊梦飞任秘书长，熊子容、朱通九任秘书，黄凌霜任教务长，程干云任总务长兼工学院院长，王更之为总务主任，最初无训导长，后由李式相担任。

最初的校训为：“双手万能，劳工神圣”，校中还挂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标语牌。课程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体力劳动或工场实习各占三分之一。学校规定每星期一有“纪念周”活动。每星期上两次“党义”课，内容除“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及“实业计划”外，还有时事政策。党义教师易贻甫，由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委派，负责全校的思想政治课。

入学条件主要有四点：(一)不一定要中学毕业文凭，同等学力亦可应考；(二)要通过初试和复试两次考试；(三)将半天农场体力劳动或工厂体力劳动作为新生入学的考试课目；(四)学、膳、宿全部费用由学校供给，每年发青布工服一套、青布学生装一套，讲义费、医药费亦由学校负担。

学生应考没有性别、年龄、民族的限制，所以差别很大。学生中有结了婚的，有已有孩子的，有农村的，有城市的，但大多是贫苦人家子弟，另有少数南洋群岛的华侨子弟，中学部还有少数民族子弟，如朝鲜族等。劳农学院学生和中学部学生

最初同住在原上海大学的校舍内，劳工学院和师范班的学生则住在江湾校本部。全校共有大中學生一千六百多人。附設的劳动小学及幼儿园，也都设在江湾校本部附近。

劳农学院期间的社会科学课程主要有：黄凌霜教《西方知识史》，郑若谷教《社会学》，徐待峰教《心理学》、《逻辑学》，震旦大学徐某某教《政治经济学》，法籍教授邵可侣（Reclus）教《法国大革命史》。改为农学院后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课程，主要有：韩雁门教《作物学通论》和《作物学各论》，夏康农教《动物学》，谢鸣柯教《测量学》，徐人杰教《生物学》，农场主任黄人俊教《农场管理学》和《畜牧学》，林某某教《植物分类学》和《植物病理学》，何尚平教《农业化学》，陈国荣教《普通园艺学》和《花卉园艺学》，朱惠芳教《地质学》和《森林经济学》，冯焕文教《养蜂学》和《养鸡学》，顾复教《稻作学》，冯肇传教《棉作学》和《畜种学》，汪呈因教《农业微生物学》，院长李亮恭教《植物生理学》，魏岳寿教《农产制造学》和《农业微生物学》，陈宣昭教《蚕桑学》，吴觉农教《农业经济学》，张农教《农政学》，蒋某某教《农具学》，某某教《农田水利学》，马寿征教《麦作学》和《作物育种学》，冯言安教《蔬菜园艺学》，毛宗良教《园艺学》和《蔬菜学各论》，张立范教《葡萄学》，周士礼教《观赏树木学》和《造园工程学》，包容教《农业化学》，铁明教《肥料学》，方乘教《分析化学》和《农产品分析》，陈驹声教《制糖工艺学》和《酿造学》，某某教《胶体化学》和《物理化学》，曾毅教《农业化学专论》，陈大燮教《物理学》，某某教《高等数学》，朱通九教《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李剑农教《农业经济学》，邵和生教《稻作

学》，邵可倡、玛丽·泰雷兹、方于、夏敬农、田恩沛等教法语，陆某某教英语，还有一人教世界语。

此外，学院还向外方请一些教授来作专题讲学，陈翰笙、王寅生、唐启宇分别讲《中国农业经济问题》，吴觉农讲《中国茶叶发展概况》，黄枯桐讲《农业政策》，蔡邦华讲《中国的飞蝗》，法国神父萨维奥(Savio)讲《昆虫的危害》，张心一讲《西北的水利》。校本部也不定期地请各方面学者和政界显要来作专题报告，如张继讲《孙中山逝世与西山会议》，王云五讲《怎样自学？》，陶希圣讲《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胡庶华讲《钢铁工业发展情况》。从复旦大学请来到社会科学院兼课的教授有章益、温崇信、孙寒冰等。

劳农学院和师范班的学生上午听课，下午在农场劳动，劳工学院的学生上午听课，下午在附设的铁工厂、胶鞋厂、印刷厂劳动。

学生伙食规定每人每月八元，由学生选出代表组织伙食委员会管理。

当时校方重视军训，组织学生军训，男女学生一律参加。劳农学院由同学中曾在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的李良荣任连长，指挥日常的操练。农学院迁至吴淞泗塘桥后，请当时吴淞炮台的参谋教步兵典范等理论课。

先后当过农学院院长的有：徐某某、蔡无忌、何尚平、李亮恭、张农等。农学院共设三个系：农艺系，主任为韩雁门；园艺系，由冯言安、陈国荣先后任主任；农化系，包容、方乘先后任主任。学生约二百多人。担任过农场主任的有：黄人俊、邵

和生、马寿征和张农。担任农学院训导主任的有林希贤、田恩霏。院长办公室秘书为王鸿年。

先后当过工学院院长的有程干云、何畏冷。工学院设有三个系：土木系，机械系，另一个系已记不清。全院学生约三百人，唐某任工厂部主任。

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章渊若(字力生)。该院亦分设三个系：教育学系，主任为章益；经济系，主任先后有叶法无等；社会学系，主任为龚某。全院学生约三百多人。

中学部主任为李式相，学生约六百多人。

劳大学制四年，应读满一百二十个学分。

在劳动大学公开活动的政治党派是国民党，校长、秘书长、院长、系主任、“党义”教师、各院部训导主任等多数是国民党员。当时校中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创办人中的主要人物吴稚晖、李石曾、沈仲九、匡瓦生等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暗中活动的有青年党、国家主义派。后来得知，在大学部、中学部的师生中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如社会科学学院学生许涤新（许新文），张庚（姚禹全），农学院学生唐川（唐杰侯），工学院学生薛藩，中学部学生向隅等。

一九三一年六月，劳动大学被解散。



## 回忆我的教书生涯

郑逸梅

我的一生，是教书的一生，写作仅仅是副业。在旧社会，教书称为坐冷板凳，是没有出息的，可是我乐此不疲，实足足教了七十年，超过了半个世纪。今日回忆，在脑幕间尚留有依稀仿佛的印象。

我在苏州读书，毕了业即执教鞭，教了若干年，应了上海但杜宇的邀请，担任上海影戏公司的编撰工作，表面上似乎换了一种生活，可是实际仍脱不了教读范畴。原来杜宇的侄曾孙但二春，以小明星驰誉影界，但在学业方面尚须进修，我编撰之余，就教他读书作文。二春很聪颖，作文楚楚可观，字又写得挺秀可喜。其时同乡徐莲舫，办有苏州旅沪公学，坚决要我为其服务，我徇情辞谢了但杜宇，应聘任教公学。同事有顾坤伯，他是教图画的，后来成为海上名画家。又范佩萸、杨剑花，同为星社社友。而学校的近邻沈一冲，也是熟朋友，就和我们组织了云社，一时如顾悼秋、宋痴萍、江红蕉、顾醉萸、沈禹钟等纷纷加入，诗伯酒龙，月必一叙，情况是很热闹的。

我在旅沪公学任课，仅一个学期，但杜宇又复相招，旧地重临，宾主之间，情谊益厚。我索性把家眷搬到上海来，赁屋公司附近的青云路恒裕里，赓续编撰兼教读的工作，直至“一·

二八”之役、公司被毁，寓舍也遭劫火，我才别谋生计。

我正在仰屋兴嗟，老友施济群招我去编《金钢钻报》。其时朱其石任爱群女中的书法课，知道我每天午前尚有余晷，便介绍我去教历史，谢玉岑任文学史，因病请我庖代。该校主持者严浚宣，同事有顾佛影，郭步陶，都是相识的。我每星期去两次，课毕，常便道至西门静修路三乐里探望我母，原来同怀弟润荪，侍母卜居在那儿，距斜桥不远。

暑假多暇，吴竞寸拉我担任青年中学的暑假补习班课务，绿树荫浓，枝头蝉噪，与弦诵声相应和。其时同事有刘铁冷、范叔寒等，多年神交，一旦相逢，那是多么快慰。

沈秋雁约我编辑《明星日报》的文艺栏，并由他介绍我为新华影业公司宣传主任，兼共舞台职务，所以办公室即在共舞台的张善琨经理室中。每天傍晚到那儿去，和汪仲贤、欧阳予倩、金焰、杨小仲等同事。晚饭后，且教张氏的子女读书写字，和以前在上海影戏公司差不多。大约混了一年，仲贤去职，我不久也就脱离。

冯树华所办的青华中学，我担任文史课，最麻烦的是批改学生的课卷，那儿课卷却由校方别请朱宝莹太史公批改。我在这时，也就认识了朱太史，他很谦抑和蔼，给我印象很好。这学校有一很特殊的地方。现在提倡民主与法制，树华在那时，早已从事学校法制化，凡学生犯了过失，由学校所组织的小法院审判，非常严肃，所以学生很少越规行动。

胡叔异是胡石予先师的哲嗣，我和他是师弟兄。国华中学由他主办，就招我去襄助，任课外辅导并兼文牍。同事有王玉章，

乃吴癯安高足，工词章；丘琼荪，也是一位词章家，相处很好。卢石青本是国华的教导主任，他别办沪光中学，招我去兼些课。此后江淮中学，一度 and 沪光合并，我所教的学生，有沪光的，也有江淮的了。最特殊的，有许多校外人员，得校方的许可，每逢我上课，前来充旁听生，我起初有些窘，后来也就惯常了。

抗战军兴，国华停顿了一学期，既而又复召集旧生，并登报招新生入学，但学生人数不多，女生尤寥寥。所以楼上一排女生宿舍完全空关着，叔异许我把家眷搬入居住，从此省往返之劳，益形便利。其时侨光中学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海防路口，请我去任课，和主持人吴继泽很相得。他拟扩充大学部，定名侨光学院，预约我任大学部的国文，结果进行发生阻碍，没有成为事实。

我和国华中学的关系，最为悠久。绍兴的稽山中学，到上海来复课，一时找不到校舍，便和国华订了约，合并上课。初中部归国华，高中部归稽山，我所任的是高中部的，所以又兼了稽山的教务。此后上海环境益形恶化，叔异携家到内地去，国华委托我维持，我深恐力不能胜，邀赵眠云来共任艰巨。本拟请胡朴安担任校长，可是朴安忽抱半身不遂症，没有成为事实，结果由我和眠云，担任正副校长。未几，程小青自黟县来，蒋吟秋自吴中来，都任国华的课，吟秋也住在校中，遇事代为筹措，那是很可铭感的。一时教师，都是知名之士，如倪文宙、陆澹安、顾明道、程瞻庐、严荫武、吴三痴、夏之时等，都担任文史方面的课程。奈国华已往的学生，纪律不很好，我为整

伤起见，大刀阔斧，把不循教的学生开除了若干名，旧时教师不称职的，俟学期终了，不再续聘。这一下，招了不少的仇怨，甚至起着反响。在这种艰困中，维持了两学期，居然学风为之丕变。正深喜幸间，不料校舍发生了问题。原来校址是颜料商奚姓的业产，因商业失败，他把校址全部出卖了。只得于暑假期中让出，可是找屋很不易，没有办法，暂借普陀路北的几间屋舍作为初中部，又借威海卫路的西式楼屋，作为高中部。这样精神涣散，成绩远不如前，加之威海卫路的校舍又遇到了易主问题，我们也就没有勇气再办学了。

我脱离了国华，应聘大夏附中，担任高中部国文，校长是孙亢曾，从事教育有年，当然办得井井有条，我任课约两年。校园颇具竹树泉石之胜，靠左一带，有若干幢的楼屋，出赁与人，徐卓呆全家即住在楼上，因此得时常晤面，颇感乐趣。

康脑脱路(今康定路)与新闸路之间，设有江南联合中学，那是无锡师范及其它中学合组在上海复课的。蒋吟秋在那儿任课，就拉我去同事一堂。主其事的，如张仲友、许洛九、季梁荪等，也很投契。那儿地形低洼，天雨连延，往往沦为泽国。我们兴致很高，雇了人力车摆渡，从不脱课。其时我兼大夏附中的课，又家庭馆教处，忙的不得开交。大夏的课程表排定了，照例不得更动，和江南的课多所冲突，我不得已，向江南辞谢，仲友等再三挽留，把课程表七巧版似的，费尽心机配搭一下，总算十之八九没有问题了。还有一、二节课实在没办法，特许我作文课可以不必到校，只须届时打一电话，出一个题目给教务主任，由他委其他教师代我督促收卷，这真使我五中铭感。

霞飞路(今淮海路)西有一个很幽静的地方，那儿设着一所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我曾去担任两学年的国文课。在该校肄业的，大部分为女学生，尤以学钢琴科为多，也有学提琴、小提琴的，声乐的，音乐理论的。主持人丁善德、陈又新，便是钢琴和提琴专家。每年两次开师生音乐会，或假兰心大戏院，或假青年会举行，很博得社会人士的赞誉。各科学生，国文是必修的，那著名女高音郎毓秀的妹妹毓贤，不但学的一手很好的钢琴，国文成绩也很优异，在我所教的学生中，她是出类拔萃的。后来该校又假中国中学辟第二部，地点在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我每星期两次，要赶到西爱咸斯路去。包天笑住在附近，所以下课后，常访天笑于钊影楼。又画家凌虚住在淡井庙隔壁，也时常晤觐。

我教的学校实在太多了。一度又任肇和中学的课，和蒋吟秋同事。地点在蒲石路(今长乐路)西首，那儿距朱大可、朱其石昆仲的寓所只数十步，我课余，常到朱家去谈，也很有趣。又任课徐汇中学，校舍很大，分上院、中院、下院，足球场有六处，学生从初中起便强迫从事足球运动，所以徐汇的足球队，在上海是很著声誉的。徐汇毕业的学生，大都进入志心修院，那修院为大学程度，院长是法国神父，我由徐宗泽神父的推荐，兼任志心的教授，教的是诗经及文学史。同时又兼徐汇女中的课，教课的大都是女教师，男教师很少，男教师上课，例有一女修士坐在侧面旁听，含有监督性质。初时很觉诧异，日久，司空见惯，当她是女学生，不以为意了。

高校的课，我担任了两所，一是新中国法商学院，院长卢晋

侯，蒙他特别垂青。我接的是姚莲子的课，和吕白华、戴果园同事。一所是诚明文学院，院长是提倡因是子静坐法的蒋维乔，我和他是同为中国国学会的会员，我教的是唐代传奇。

黄炎培主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我也参加过，教的是中华第二职业补校。其他还有大同附中、正养中学，在正养和范烟桥、程小青同事。务本女学和俞剑华同事。最后是模范中学，后改名晋元，又改陕北。陕北时，我和张植同主校政，直至退休。

## 近百年来的刻书与藏书

缪子彬

上海自乾嘉到辛亥革命这一百多年中，城内仅有一个郁松年是有名的藏书家与刻书者。他有一部《宜稼堂藏书目》，其中宋元本有一百种左右。道光二十一年，他又刻了一部《宜稼堂丛书》。但是到了同治年间，他的藏书已大部分归于丁日昌的持静斋，以后亦无人继起。自光绪末年到民国，有一个赵诒琛刻了一部《峭帆楼丛书》，他是上海制造局的一个职员，其时制造局内有一部分刻字工人，专门刻新翻译的西方学术书籍，所以赵氏在这便利条件下能刻成这部丛书。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一般亡清遗老以及富商大贾或稍有资产者，纷纷涌向上海租界，希冀托庇于外人，上海顿时繁荣起来。文人墨士一多，于是古玩、书籍、字画、金石等等，都涌现于市场。其中一部分是逃难的人卖出来以维持生活的，亦有市贾从各处收得来谋利的，因此出现了许多收藏家。

单谈刻书与藏书，当然推南浔富商张钧衡和刘承干两人为巨擘。张刘两氏藏书既多，就联想到若能刻书则可以名传永久。然而刻书需要选择，不能贸然从事。一种是刻古人之书，一种是刻时人之书。古人之书浩如烟海，先要明悉内容之佳不佳，知其流传之多与少，而决定其应刻与否，自非有丰富经验者不

办。其时适江阴缪艺风亦由宁迁沪，张刘两人乃请益于缪，并请其主持一切。

缪氏本是清季提倡刻书最力之一人，数十年如一日，友朋之中被其推动而刻书的颇不乏人。缪氏本人除刻了自己的著作许多种以外，还刻有丛书《云自在龕丛书》、《藕香零拾》、《烟画东堂小品》、《对雨楼丛书影宋五种》，都刻于清末民初。在南京替他刻书的，有朝天宫李义和刻字铺及党家巷姜文卿刻书处两家；在湖北有黄冈陶子麟专刻影宋体，他和影宋体写手饶星舫，都是南北闻名的。缪氏又采嘉善曹溶《流通古书约》中语“节宴游玩好诸费，可以成就古人，与之续命，出未经刊布者，寿梨枣，始小帙，讫巨编”三十二字于《藕香零拾》三十二册首页每一页右下角，用阴文刻出其中的一个字，以计册数，《烟画东堂小品》十二册，则用“冷淡生活胜于征歌选舞多矣”十二字以计册数。这是缪氏提倡刻书的口号，亦缪氏一生志趣的自述。

刘张两氏既推崇缪氏为导师，缪亦乐于从事，就为他们各选出数十种书来，在磋商同意之下，陆续付刊。彼时上海只有制造局散下来的一家朱文海刻字铺。于是又从南京将李义和、姜文卿两家找来，请三家共同承担。影宋本仍由湖北陶子麟刊刻，书手饶星舫也长期住沪缮写，孜孜不息共七八年之久。张钧衡刻成了《适园丛书》一二两集及影宋本《择是居丛书》以后，即行停止。刘承干则刻至民国十四五年才止，计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吴兴丛书》、《希古楼丛书》，又翻刻蜀大字本《史记》、宋本《两汉书》、宋单疏本经七种及其他



零种影宋本，又刻《会稽章学诚遗书》全部，并刻时人之书，如杨鍾义《雪桥诗话》七集及叶昌炽著作，等等，不能详述。他刻书之多，在近五十年来，当首屈一指。

还有贵池刘世珩及南陵徐乃昌两家，刻的书亦不少，都是由清末刻到民国，由南京刻到上海。刘氏刻有《聚学轩丛书》、《玉海堂丛书》。《玉海堂》全是翻刻宋元本，又刻有《暖红室传奇》数十种，每卷首页有图，为湖南李世瑛所绘，精美异常。刘氏自己亦深通音律，有一部《双忽雷传奇》，就是他自己填的曲谱。忽雷是唐朝遗留下来的乐器，共有大小两个，都是刘氏所收藏的珍品。徐氏刻有《积学斋丛书》、《邗斋丛书》、《随庵丛书》，又《小檀栾室闺秀词钞》及其他零种。再有两位词家吴兴朱祖谋与临桂况周仪，亦刻了些书。朱氏专刻词，除自己所作的《疆村词》而外，又刻《唐五代宋金元词总集》四种、《唐词别集》一种、《宋词别集》一百一十二种、《金词别集》五种、《元词别集》五十种，凡一百七十二种，总名曰《疆村丛书》，与光绪间临桂王鹏运所刻的《四印斋词》后先媲美。况氏刻了自著的《蕙风词及词话》，又刻了一部《蕙风簪丛书》，中多零星小品。再有吴兴周庆云刻了一部《晨风庐丛书》，吴兴蒋汝藻刻了一部《密韵楼丛书》，全是影宋体。蒋本人在上海，而书刻在北京，是董康替他经手的，刻得很精。蒋氏富有收藏，鉴赏亦精，他开了一月通远公司，专贩古玩出口，在英、美都有分公司。其时外人尚不知收买书籍字画，以铜器磁器为热门，少数买字画的，只知宋元绢本而已。蒋氏因此获利甚巨。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外分店被迫停闭，存货损失奇重，连上海基店也就此收

歌。

武进陶湘也有藏书，但他并不迷信宋元本，收了不少清代殿板书，都是桃花纸精印。他有一部完整的《武英殿聚珍本》，还有明末吴兴闵齐伋及凌蒙初所刻朱墨两色或五色套印的书一百一十种之多。他刻了一部《涉园丛书》，其余还有不少，不过木刻只是一部分，此外珂罗版、石印、排印都有。因为木刻书的书板贮藏问题带来不少困难，书板怕湿，湿则易蛀，又怕干，干则易裂，须做木架将书板一片片隔开来，置于通风不受日晒的场所，方能持久。在内地住家的人，房子比较宽畅，或者容易处置，到了上海就不容易解决了。即如张刘两家，他们上海产业很多，但贮藏书板还是有问题。好在他们南得都有老宅，花园洋楼，条件十分优越。然而兵火无情，张氏所刻《适园丛书》及《择是居丛书》书板，在抗战期间一炬而完。刘氏存板虽未全毁，亦颇有损失。木刻书无形中受了很大的影响，加以木刻的本身也一步一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大家都趋向影印、石印和排印，而雕梨镌枣之事，从唐中叶起始，到五代而盛行，历宋元明清而至抗战一千多年，遂尔在大体上告一段落。此后只有印书了。

三十年前，哈同花园广仓学窘印了一部《广仓学窘丛书》，完全是铅字排印的，有古人之书，亦有时人之书，如海宁王国维去世后的遗书，大部全印入丛书内。还有无锡丁福保，亦印了不少书，诗话很多，有《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等。番禺邓实印了《风雨楼丛书》、《古书汇刊》等。以上两家虽属个人，但已经是纯粹的商业性质。丁有医学书局，邓

有神州国光社以作门市供应，而大规模的出版公司，如商务印书馆印有《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及《续古逸丛书》，中华书局有《四库备要》。还有某些比它们小一点的书坊，无不有丛书印行，社会称便。这不得不归功于印刷术日见改进。

同时，北方有两个人被人目为研究中国古书古物的专家，但在实际上，他们都以经营古书为常业，而且都爱做国外买卖。他们藏的书很多，而刻的书更多。一是住在大连的上虞罗振玉，一是住在北京的武进董康。罗振玉刻有《鸣沙石室佚书》、《云窗丛刻》、《吉石龕丛书》、《宸翰楼丛书》、《雪堂丛刻》、《玉简斋丛书》、《殷礼在斯堂丛书》等，董康只刻有一部名称涵芬室的，但种类亦在百种以上。这两家都是一部分用木刻，另外则用珂罗版或玻璃版或石印排印不等，而且董康有许多种书还是在日本用日本的美浓纸印的。他们之爱和日本人的打交道，简直是习与性成。我们从董康所著的《书舶庸谈》中间可以看见一点概略。

北京是数百年的国都，人文荟萃，一切均很考究，刻书也不例外。上海则犹如暴发户，所以有些南方人相信北京。还有江安傅增湘藏书亦富，他有一部《藏园书目》，又刻了一部《双监楼丛书》。仁和吴昌绶是一个词家，刻书亦以词为多，有一仿宋体的《双照楼词》，用宣纸及乾隆墨刷印，古色古香，独创一格。同时，两湖刻书之风亦很盛，湖北当然推宜都杨守敬为最著，黄冈陶子麟就是他培养出来的，亦因他的揄扬而出了名。湖南则是王先谦及叶德辉两人提倡之功。王著作极富，不能一一尽举。叶刻有《郎园丛刊》及《丽楼丛书》等等。其余各省都有好学之人，刻书传世。此文非专书，故不作全面记载，仅就清

代和民国递嬗的前后，约五十年，摭拾见闻所及，提供一点材料，为将来研究书林掌故者作谈助罢了。

上文对于藏书写的更少，最后举两个“门外藏书家”，作此文的结束。所以说他们是“门外藏书家”，是因为他们与历来的藏书家不同。一个是前上海租界工部局买办潘明训，他别的书不买，只买宋版书。他有的是钱，出价比别人大，所以书刚一收到宋版书就先送与他看，不到三五年，买了一百部之多，声势惊人，可称豪举，转觉最出名的百宋一廬主人黄尧圃也有些寒酸相了。当嘉道年间，书价很贱，黄尧圃有时遇着宋版书，钱不凑手，常拿别的书去换，有时一半现钱一半以别的书作价，亦有时忍痛放弃。但是他书到手之后，一定要校勘一下，将宋版的好处，详详细细写出来，每每一跋再跋三跋，故于校勘之学造福不小，这才是道道地地的藏书家。而潘明训则不同，他不但自己不常看，即使他的朋友当中听见他收到了有名的孤本书要想见识一下，也颇不容易，因为他买了之后，就往保管箱里一存，拿宋版书与金钢钻、黄金、美钞一样看待。他深知宋版书值钱，将来还可赚钱，真可谓十足的生意经。不过黄尧圃故世已经一百多年，名气还是很响，而潘明训的名气，当时在书贾们的嘴里很响，现在晓得的人已经不多，再过些时候恐怕就湮没无闻了。后来，伪中央银行有一个陈澄中，他的藏书办法与潘不谋而合，只要宋版而鄙弃其他。还有一人是前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他是全国有名的大买办，有的是钱，有三开间三层大楼都藏满了书。但是你要问他藏些什么书，他可以说一概不知。那么他这些书又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大部分是各处抵帐来

的，还有是亲友押给他的。总之，那是他运用资本弄来的，而且花的钱也并不多。他自以为可以算得一个大藏书家，于是请人编书目，并且说是要开办图书馆，定名为“愚斋图书馆”。但是一经清理，内中只有一部宋版，元版没有，连好一点的明朝本子亦没有，全是些普通书。有人说，这个图书馆在收藏上实在太简陋了，最好再收些好本子以充实内容。他一定不肯，因为他舍不得花钱，只得将就编了一部书目。照收藏的体例讲来，宋本之下，有元本、明本、清朝的精刻本、名人批校本、明钞本、清钞本和稿本等，综合而构成藏书中的善本，至于普通本则向不足以言收藏。盛大买办不管这些道理，只将普通本的好一点的加到他的书目里去，以稍别于书账而已。这样的藏书家当然也是站在“门外”的，但是他那部宋版却很有名，书名《圣宋文选》，海内一共只有三部，而两部是不全的，他这部是全的，可以算得孤本。这三部都经过黄尧圃收藏，也都有他的题跋。至于盛宣怀的那座“愚斋图书馆”，从未开放过一天，亦无人参观过。等他本人死后，这座图书馆与他这个“门外藏书家”，就同时没有在上海留下一点好印象而永远消失了。现在只剩下几个人还能指出现在成都路上的沧洲书场就是“愚斋图书馆”的旧址。

# 上海藏书史料片断

薛明剑

我国藏书由来已久，分官书所藏与私家所藏两类。孔子读列国宝书，以及历代皇朝藏书内库，即是官书。孔子手定六经，虽经秦火，犹发现遗藏于鲁壁，此为私家藏书之祖。上海自宋迄今，私家藏书与近代图书馆之可考者分记如下：

## 一、上海历代私人藏书

(一) 宋代庄肃，字恭叔，号蓼塘，宋末人，曾任秘书院(相当后世的国立图书馆)小吏(典藏员)。宋亡，弃官归里，住青龙镇(吴孙权曾造青龙战舰置其地，故名青龙。宋淳化二年设镇。宋为华亭县地，元隶上海县，明嘉靖中在此设青浦县，清因之，民国又隶上海)。他藏书八万卷。陶宗仪在其《辍耕录》中说：“江南藏书多者止三家，庄其一也。”可见当时庄肃藏书享有盛名。元至正间，因须修编宋辽金三史，遣学士危素访庄氏后裔，征集图书，其子孙疑为来查禁书者，立将八万卷付之一炬。惟据《中国人名大辞典》所载，则云：“危素购于其家，得五百卷。”

李甲，字景元，青龙镇人，好藏书，兼能画善诗。苏东坡题其《喜鹊图》诗：“闻说神仙郭忠恕，醉中狂笔势澜翻。百年寥

落人何在？只有华亭李景元。”后世则重其画而忘其藏书之富。

董宜阳，字子元，其先世汴籍，宋高宗南渡后，徙居沪上，书无不读，藏书尤富。著有《云间诗文选》、《近代人物志》、《云间百咏》、《松志补遗》等（见范濂《云间据目抄》）。

（二）元代杜元芳，字玉泉，宋祁国公衍九世孙，略迟于庄肃，曾任德清县主簿，老年退隐青龙镇西南、白鹤江畔杜村，建翊翠碧云楼（一说无碧云两字），度藏图书万卷。

（三）明代陶宗仪，字九成，由黄岩迁居上海，元举进士，再试不中即弃去，武武累征不就。写有《辍耕录》三十卷，编《说郛》，搜罗小说，皆为当时不经见者。幼时家贫，晚年惟好藏书，尤多精抄本。

郁文博，景泰时进士，官湖广副使，致仕归，藏书颇多，建书室曰“万卷楼”。行年七十有九，依然丹铅不废。曾为陶宗仪校订《说郛》，有自赋诗云：“白头林下一耆儒，终岁楼间校说郛，目力心思俱竭尽，不知有益后人无。”

陆深，初名荣，字子渊，号俨山，弘治十八年进士。世宗南巡，掌行在翰林院印，进詹事府詹事。藏书多而有名，有《江东藏书目录》行世。著述亦富，有《俨山集》等二十一种。子陆楫尝辑《古今说海》一百四十二卷，亦有名之古小说选本。

黄标，字良玉，陆深外甥，不仅富于藏书，闻名沪渎，且善读书，翻阅经史无间寒暑，对各书内容尤能洞彻。陆深临文，遇有疑义，必囑标考核。陆深之子陆楫，辑《古今说海》时，由标供资料者有三十卷之多，占全书五分之一强，足证藏书之多。惜其藏书尽毁于明代倭寇进犯上海之役。

董传性，字柏山，隆庆中由贡生官河南光州副守。好藏书，闻有佳刻，不惜重价购之，既得，丹铭在手，必再校仇，每忘寝食（见同治《上海志》）。

王圻，字元翰，嘉靖进士。官陕西布政参议，后乞养吴淞江畔，藏书颇多，种梅万树，终老家中，著书为乐。年逾耆耄，犹篝灯帐中，两夜不辍，有《续文献通考》、《东京水利考》、《稗史汇编》刊行，与施大经、宋懋澄、俞汝辑为万历间松江郡四大藏书家。

施大经，字天乡，号石屏。万历十三年举人，任瑞州、惠州通判，转崇府审理正。著有《泽谷农书》。藏书冠群中，室名“获阁”。子沛，字沛然，天启间通判廉州，复购益“获阁”藏书。石屏有朱文藏章曰：“施氏获阁藏书，古人以鬻借为不孝，手泽犹存，子孙其永宝之。”印有书目四册。

潘允端，字仲履，嘉靖四十一年进士，以四川右布政移疾归，构“乐寿堂”以奉父（潘恩，字子仁），筑“天然图画楼”收藏书籍（见《图书馆学大辞典》）。

顾从义，字汝和，号砚山，授中书舍人，隆庆初擢大理评事，居家构“玉泓馆”以藏书（见宋如林《松江府志》）。

张金，住龙华里，藏书之堂曰“宝穰”，有《宝穰堂藏书记》（见同治《上海志》）。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以礼部尚书入阁参机务，先世籍中州，宋高宗南渡时迁苏，祖竹轩，始自姑苏迁居沪上，遂为上海人。通籍四十年，歿后除中西科学书外，家无他藏，遗稿《农政全书》，崇祯诏令有司刊布之。徐氏藏书虽不甚富，惟



能中西并陈，实为当时所难能。史称光启通籍四十年室庐不改，故藏书虽少，亦足为藏书界光（详见作者所编《徐光启年谱》）。

吴中秀，字端所，工岐黄，蓄书万卷，筑“天香阁”藏之。乙酉城破，书与人同亡，时年八十。

（四）清代曹炳曾，字为章，号巢南，康熙末诸生，藏书颇多，标其书室曰“是亦楼”。与兄煜曾、弟煥曾齐名，时人比之刘孝绰（南朝梁人）。

顾锡麒，由娄江迁沪，藏书颇多，名其书室曰“谏闻斋”。歿后遗书为郁松年“宜稼堂”所得。

李筠嘉，字修林，号笋香，候选光禄寺典簿。嘉道间收购明代朱察卿“慈云楼”古宅，藏书六千余种。清道光六年，龚自珍写其《藏书志》序云：“上海李氏藏书四千七百余种，论议牖注至三十九万言，承平之风烈，与鄞范氏、歙汪氏、杭吴氏鲍氏，相辉映于八九十年间。”以“天一阁”、“振绮堂”、“瓶花斋”、“知不足斋”，相提并论，可见当日气概，足以笼盖海隅。又乔重禧挽筠嘉诗注云：“君身后藏书尽散”。又咸同间甘泉乡人所著《暴书杂记》载，李笋香旧藏金刻《孔氏祖庭广记》，为同时人马笏斋所得。因何散书，则语焉不详。有《慈云楼藏书目》八卷，道光六年编印。

李钟庆，字筠嘉，工诗，以收藏书画著名，如“小李将军春江图”，山谷老人书“千字文”，张择端“清明上冢图”诗卷，都为稀有物，而钟庆俱藏之，故名噪一时。

梅益征，字复斋，嘉道间人，好藏书，遇有善本，手自仇校，积数十年，成《得一阁藏书志》四十二卷，惜后人不善珍

藏，蠹蚀强半。

郁松年，又名泰峰，字万枝，号泰丰。道光二十五年恩贡生，饶于财，好读书，藏书数十万卷，皆明旧本，世不多见者。于道光二十一年刊有《宜稼堂丛书》十一种。

太平军克江南时，清军溃乱劫掠，吴中藏书尽散。明末清初，苏州所藏宋元书籍，当推钱谦益、毛子晋两家。两家散至季振宜，复归于黄尧圃，再归于汪闳源，未越吴门一步。惟汪氏书散，即有部分流入上海，为宜稼堂郁松年所得。上海因在军事区域外，郁松年乘机购藏。郁氏书散，又为丰顺丁日昌所得（时丁氏任上海道）。丁氏书散，有部分归涵芬楼。

徐渭仁，字文台，号紫珊，与郁松年同时人，寓北城顾氏“露香园”遗址。工画善隶，鉴别碑帖，时人推为巨眼。因得隋开皇时《董美人碑》，乃自号隋轩。又得昭雁足镫，即颜其居曰“西汉金镫之室”。藏书尤富，现在孤本中之上海嘉靖志及万历志上，均有“徐紫珊所藏”朱文长印，且有徐氏手跋，实可贵也。嘉靖志已由传真社影印，万历志藏徐家汇藏书楼。其子徐允福，原名大有，号石史，益购书以实父藏，并有《春晖草堂丛书》十二种行世。

姚文栋，字志梁，一字东本。咸丰二年生于上海西门祖宅。著述一百二十种，藏书十六万卷于南翔“昌明文社”，“一·二八”之役被毁。

李心怡，字昆和，号竹田，清监生。藏书万卷，题书室曰“味经楼”。著述亦多，惜被友人散失，仅存《草岩诗草》传世。

（五）民国沈恩孚，字信卿，原籍吴县，幼即迁沪。藏书

颇多，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全数捐赠“人文社”主办之图书馆。

王培孙，创办南洋中学，任首届校长。藏书七万册，内有各地方志二千册，后均捐赠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

张大梁，字绥卿，慈溪迁沪。藏书不少，有关佛教者尤多。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捐赠上海佛学图书馆。

徐郎西，藏书二千余种，一九三四年捐赠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友淑图书馆。

黄警顽，好藏书，善交际，尤注重乡村教育，一九三二年出其所藏书交北新泾绿秧图书馆及黄华村晨光图书馆，便利乡村读者。

郑洪年，好藏书，珍本尤多，任暨南大学校长时，尽出所藏，捐赠校方图书馆。

薛仙舟，中国合作运动创始者，藏书颇多，悉捐复旦大学图书馆。校方纪念其功在社会，即以仙舟名图书馆。

薛端性，字华阁，原籍无锡，幼贫求书不得，长从廉南湖居小万柳堂，偶有所得惟事买书，藏方志年谱万册，曾在东方图书馆公开阅览，悉以赠之。

丁福保，字仲祐，由锡迁沪，著书亦富，办有医药书局，出版佛学古钱等辞典，以藏书闻名沪上，多宋明版本。

姚明辉，字孟坝，我国学校地理用书由其创编，并编写蒙古志等，藏书颇多，有关中外古今地理不下数千种。

杜云舒，藏生物学、算学书籍独多，一九三〇年悉捐中国科学图书馆。

郭辅庭，藏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颇为珍贵，于一九二一年移赠大同大学图书馆。

叶恭绰，字誉虎，原籍番禺，自幼侨居上海，藏有古籍珍本不少，各地湖山庙宇志千余种，一九三九年移赠合众图书馆。

胡朴安，好藏书，珍本尤多，一九四〇年以所藏三千册捐赠合众图书馆。

旧社会私人藏书，虽属少数士大夫或地主资产阶级之专利品，但对文化亦有相当之贡献，故本文分别详述之。又藏书之盛于宋代以降者，实基于印刷方法之改进，非关人与书之本身也。

## 二、上海公私图书馆

第一阶段，萌芽时期(一八四七——一九〇四年)

一八四七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耶稣会传教士定居徐家汇，即从事征集图书，以供参考。未几，天主堂藏书楼宣告开始，曾藏书三十余万册，以庋藏各地方志杂志报纸著名。越二年一八四九年(道光二十九年)，英租界外侨组织之上海图书馆成立，延至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始由公共租界当局接办。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英国皇家亚洲文会上海支会主办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成立，一九三一年藏书二千五百册。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圣约翰大学成立图书馆，分科学系、神学院、中学、医学院、工程学院五分馆，藏书四万三千零五十八册。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英人傅兰雅、美人潘慎文创办格致书院藏书楼于北海路，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迁龙

华路，后失慎被毁，烬余残书四千三百四十册，在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归入上海市立图书馆。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育才公学图书馆成立于山海关路校内。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东方图书馆之前身涵芬楼成立，上海国人自办之藏书楼，由此开始，较全国最早成立之南京国学图书馆（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创立），已迟三十九年矣。此楼一九〇七年藏书一千九百种。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江苏五属图书馆成立，设于老西门内关帝庙楼上，藏书八万册，辛亥时被驻军散去。此为国人藏书之用图书馆名义之第一家。同时国孚保存会图书馆成立，由邓实、黄节、刘光汉发起，藏书五万册，辛亥停办。延至“一·二八”事变前夕，并入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青年会中学亦办图书馆，藏书五千三百册。

第二阶段，渐进时期（一九〇六——一九二〇年）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中国环球学生会成立图书馆，藏书五千册。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沪江大学图书馆成立，藏书七万二千册，杂志三百八十种。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华童公学图书馆成立，藏书六千五百余册。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万竹小学创办图书馆，藏书一万册，此为小学图书馆之首创。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法文协会图书馆成立，藏书二万

余册，以法文为多。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十月，教育当局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十一条。十一月，又发布《图书馆规程》十一条，促进各级学校筹设图书馆。是年即有南洋中学图书馆成立。中华书局编辑所亦设立图书馆，藏中文书七万册、日文书一万册、西文书五千册，惟仅限局内职员可以流通借阅。东吴法律学院图书馆成立，藏书一万册，以中外法学书占多数。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私立市北中学图书馆成立，藏书二万五千七百四十三册。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交通大学图书馆成立，藏书八万余册。由梁启超发起，成立了松坡图书馆，一九二三年梁氏又在北京三海建造蔡将军祠，上海松坡图书馆亦即移入祠内，上海馆址让售与同昌纱厂厂主。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成立，馆址在博物院路，藏书三千八百五十册。由日侨村上贞吉等四人发起，成立了东亚攻究图书馆，藏书四千册，以研究东亚问题为目标，故藏书以方志及史地书为主。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中华学艺图书馆成立，馆址在宝通路。“一·二八”时损失极大，后迁绍兴路自建馆舍。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上海商学院图书馆成立，藏书五千册。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图书馆成立，藏中文书九千六百十种，西文书七千八百种。

以上各图书馆，仅部分公开，非普通读者皆能阅读。

### 第三阶段，发展时期(一九二二——一九三七年)

#### (一) 属于公众阅览者：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上海总商会商业图书馆成立，藏书五万八千册，组织委员会管理之。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上海图书协会成立。商务印书馆之涵芬楼正式改名东方图书馆，实行对外开放，藏书三十四万册。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毁于日军炮火。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民众图书馆成立，设在十六铺咸瓜街，藏书二千一百六十五册，由民众图书馆协作者社员出资创办，后即解散。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上海商科大学图书馆允许校外读者借阅，此为上海学校图书馆最先对外开放。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上海市立图书馆成立，设在文庙路，藏书一万八千五百四十八册。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鸿英图书馆成立，系由人文图书馆改组而成。藏书四万二千二百册，史料九十三万九千八百二十四片，索引十万九千六百八十二片。

#### (二) 属于流通出借者：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上海通信图书馆成立，开全国流通供应读者精神食粮之先声。同时广智流通图书馆成立。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邮务工会图书馆成立，藏书三万册。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友声旅行社图书馆成立，藏书三千七百七十三册，游记及风俗志为多。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市立流通图书馆成立,设在邑庙二门楼上,有书五千册。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申报流通图书馆成立,设在大陆商场,只需交保证金一元至两元,即可借出阅读。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蚂蚁图书馆成立,有书一千八百册,采用蚂蚁流动办法,传播于读者。

### (三) 属于机关内部者: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物理、化学、工程三研究所图书室成立。一九三三年迁长宁路(当时名白利南路)。同时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局创办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设在岳阳路(旧时名祁齐路),藏书二万一千册。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国民党第一区党部图书馆成立。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有中华职业教育社业余图书馆,藏书三千六百五十册,杂志二十五种。上海邮工图书馆,设在河北,藏书万余卷,原名邮务工会图书馆,“一·二八”被洗劫,由工会拨款规复。上海邮政管理局图书馆,藏书二万余册。上海银行工会图书馆设在香港路,藏书五千册。上海银行图书馆设在四川路,藏书五千册。中国银行研究室图书馆设在四川路,藏书三千册。上海工商银行储蓄会图书馆设在海防路,藏书一万册。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海关图书馆成立,设在新闸路,藏书一万五千册,并藏有重要档案。又外滩另设江海关图书馆,藏普通图书。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上海通志馆成立藏书室,藏书



二百八十九种，有关上海史实者多。马桥农民教育馆图书馆成立，藏书一万五千七百册。北新泾绿秧村图书馆及黄华村晨光图书馆同时成立。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佛学图书馆成立，设在闸北新民路；雷士德医学院成立医学研究图书馆；由世界社李煜瀛等发起，成立了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设在武康路，藏书五万册、杂志五百余种；女子图书馆，设在淮海路女子书店内，由黄心勉筹设。

#### (四) 属于专门事业者：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世界语图书馆成立，设在河南路民智书局楼上，办理五年，即告解散。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有图书馆学图书馆，由图书馆协会与国民大学图书馆系合办，未久即停办。立达学园成立图书馆，设在江湾立达路，藏书一万册，以种畜书为主体。麦美伦样本图书馆，设在博物院路，陈列美国图书出版公司所出版之书籍，备采购者选购时参考。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民众教育图书馆成立，设在闵行，藏书四千五百册。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人文图书馆成立，由黄炎培、史量才等发起之人文社主办，一九三二年藏图书杂志二万九千九百七十七册，后改鸿英图书馆，专事选辑史料。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中国科学社图书馆由宁迁沪，为纪念发起人之一胡明复去世，改名明复图书馆，藏书四万二千七百七十七册，以自然科学书籍为多。又实业部国际贸易局

图书馆成立，设在海关四楼，藏书四千五百种。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戏剧图书馆成立，设在重庆路，藏书一千册。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中华慈幼协会图书馆成立，设在博物院路，以供应会员研究慈幼事业为目标。世界佛教居士林图书馆成立，设在海宁路锡金公所内，一名环球佛教图书馆，藏书万余卷。

又徐家汇有大修院图书馆、小修院图书馆，以教会修养用书为主。

(五) 属于学校附设者：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中华职业学校图书馆成立，藏书一万二千册。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有大同大学图书馆，藏书二千八百六十九册；中法国立工学院图书馆，藏书五千册；上海商学院图书馆(原名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图书馆)，藏书六千九百六十八册；澄衷中学图书馆，藏书一万八千册。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有复旦大学仙舟图书馆(为纪念中国合作运动创始者、该校已故教授薛仙舟命名)，藏书四万册。黄渡乡村师范学校图书馆，藏书五千册。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有民立中学图书馆，藏书一万五千四百册；清心中学图书馆，藏书一万二千九百四十七册。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有持志学院图书馆，藏书三万三千册，毁于“一·二八”之役，后复随校恢复；中国公学图书馆，藏书一万册；法政学院图书馆，藏书一万六千册；敬业中学

图书馆，藏书一万二千册；浦东中学图书馆，藏书一万五千册；复旦中学图书馆，藏书一万七千册；中西女学图书馆，藏书一万册；徐汇中学图书馆，藏书六千四百五十五册。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有光华大学图书馆，藏书二万四千七百八十册；大夏大学图书馆，藏书二万九千四百三十二册；东南医学院图书馆，藏书三千册；上海法学院图书馆，藏书二千一百七十四册。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有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图书馆(一九一五年苏州东吴分设法科于上海，至本年改名法学院，成立图书馆)，藏书万册；暨南大学洪年图书馆，藏书四万一千一百六十册；上海医学院图书馆，藏书五千册；中国公学大学部图书馆，藏书一万册；惠霖中学图书馆，藏书一万三千册；南洋中学图书馆，藏书五千册。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有震旦大学图书馆，藏书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七册；务本女子中学图书馆，藏书七千册；爱群女子中学图书馆，藏书三千册。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有正风文学院图书馆，藏书三万五千册；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图书馆，藏书三千六百四十九册；新民中学图书馆，藏书二万册。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有东亚同文书院图书馆，藏书七万三千零七十四册；吴淞商船学校图书馆，藏书三千六百册；上海中汇学院图书馆，藏书一千四百五十一册。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有光华中学图书馆，藏书四千册；民光中学图书馆，藏书一万三千册；沪江商学院图书馆，

藏书五千册。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有同济大学图书馆，藏书五万册，爱国女学图书馆，藏书六千册。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有水产学校图书馆，藏书三千册。

(六) 属于儿童阅读者，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儿童少年宣讲团儿童图书馆成立。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东方图书馆组织儿童图书馆开放。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众图书馆成立儿童图书馆部。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儿童第一图书馆、第二图书馆同时成立。

查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中国图书馆协会第一次报告，全国有图书馆五百〇二所，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增为六百四十二所，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增为七百八十六所。其中新疆、蒙古、西藏等尚未计入。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前教育部调查全国图书馆总数为二千九百三十五所，此数虽不十分可靠，然大致趋向增多，亦为事实，上海当然亦非例外。故此一阶段图书馆事业较有发展，特分述六项如前。

第四阶段，消沉时期(一九三七——一九四八年)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抗战军兴，吴淞、闸北以及真如变为战场，相持三月有余，沪上沦陷，不仅战区

各图书馆毁于炮火，即非战区亦以主管无人，书籍每多遭劫。迨至敌伪统治八年，机关学校每因内迁星散，图书馆损失甚大。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百废待举，而国民党执政者又未能力图恢复，各图书馆皆趋于消沉。现将新设图书馆之情形，分列如下：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鉴于沪上图书馆之公立者分散，私立者停顿，机关学校之附设者大都遭劫，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除先后收购外，又有胡朴安、叶恭绰、裘可桴等捐赠，共藏书籍三十万册，实为此时期内藏书最多之图书馆，读者每日满座。至一九五三年改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

同年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发起设立太炎文学院图书馆，地址在五洲大楼，藏书一万册，由潘景郑主其事。后因不愿向伪组织立案，于一九四〇年中途停办，存书移送无锡迁沪之国学专修馆及复旦沪校。同时玉佛寺图书馆藏经楼成立；佛学图书馆成立，由佛教会办，设在武胜路。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常熟在沪人士为纪念翁松禅(即翁同龢，字叔平，又号瓶庵居士)，发起筹设松禅图书馆，集书两万册，未及开幕，宣告中止，书即星散。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上海银行成立海光图书馆，设在愚园路，一九五四年并入上海市图书馆。

## 民初上海文坛

李 健 青

—

民国初元，同盟会在上海有嫡系报纸五家，即于右任掌握的《民立报》，李怀霜掌握的《天铎报》，周浩掌握的《民权报》，邵元冲掌握的《民国新闻》，邓家彦掌握的《中华民报》（以创刊先后为序）。这五家报纸，都是直接拿同盟会的津贴来维持的。

上列五报中，以《民权报》最注重小品文字，其时《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年深月久，各有其巩固的地位，稳定的销路，而“民”字号报纸中，《民立报》因《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两度被封，光芒甚盛，《民权报》欲求出人头地，竞争于报业市场，非树立一种迎合群众心理的特殊色彩不可，所以在小品文字上，竭力经营。所谓小品文字，即后来所称的“报屁股”。《民权报》日出三大张，论评、新闻、广告等等，共为十二版，而小品文独占一版，第二版社论末栏，亦刊登小说，以为伸缩地步。

《民权报》发刊以后，声势甚盛，因其着意小品文字，日需万字以上的材料（五号字排植，分为八栏），由是奖掖投稿，吸收新作家，培养了不少青年文艺人才，徐枕亚、李定夷等，即于此时崭然露其头角。徐枕亚第一部小说《玉梨魂》，即于其时刊登于《民权报》小品文字第一栏，李定夷第一部小说《震玉怨》

刊登于社论版末栏。当时借《民权报》登载其作品而著名的，还有吴双热、刘铁冷、蒋箸超、丁悟痴、沈肝若、胡仪邶、吴东园、李警众、管际安、韦秋梦、杨南村、陈匪石、郑正秋、姚民哀（即朱兰庵）、钱病鹤、包醒独、徐吁公、俞天愤、陈索然等。这些人各以鬻文为生，但因主编人的倾向，颇尚艳丽文字，骈骊琢句，词藻成章，当时小品版的编辑，系周浩（少衡）兼摄，用尽心力，后由蒋箸超继任。

癸丑讨袁失败后，同盟会中坚人物纷纷出国，作东瀛寓公，在上海的机关报先后停刊。《民权报》自三洋泾桥北堍公共租界迁至桥南法租界（时河浜尚未填平），努力支撑残局，押出印机，盘出生财，濒于当尽卖光地步，亦仅仅维持了半年。馆内政治色彩浓厚的人都做了亡命客，留下一班小品作家，既无东渡之力，亦无出国之资，于是栖息于租界之内，由徐枕亚主持《小说丛报》，李定夷主持《小说新报》，均为十六开大本月刊，于民国三四年先后问世。经常写稿的，有不少是《民权报》旧人。吴双热虽回故乡海虞教读，仍常写稿投寄《小说丛报》等刊物。

后来蒋箸超、刘铁冷先后编辑民权出版部的《民权素》（不定期的刊物，月余出一册，共出十七集，由民权报会计陈冷僧经营，与《民权报》无关系），各树一帜，附丽者日众，排偶文字的小说，势力日益膨胀，一般读者几于非这类哀艳多情的刊物不足过瘾，因此《玉梨魂》、《虞玉怨》等小说发行单行本后，不胫而走，成为社会上一时的风尚。

## 二

前清末季，社会小说的领域本出言情小说之上，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的《孽海花》，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张春帆的《九尾龟》等，均曾风行一时，享有盛名。但同光间魏子安写的小说《花月痕》，系白话章回体，亦极为一般人所倾倒。后来在民初继社会小说而起的排偶小说，词华典贍，文采斐然，与其说是脱胎于《燕山外史》，毋宁说是拾《花月痕》的牙慧。《燕山外史》句句排偶，通体骈词，有时失诸滞笨，不及《花月痕》的生动流畅。《玉梨魂》擷入许多诗词，也可说是学步《花月痕》，不过笔墨有与文言语体的不同。当时一般文艺作品，多数夹杂诗词，但不如《玉梨魂》为多，故举《玉梨魂》为代表作，此为排偶小说的第一种起因。

癸丑讨袁失败后，辛亥革命成果全被北洋军阀劫夺，进入所谓“江山如故，狮梦重酣”的时代，广大青年男女和爱国志士思想苦闷，于是排忧消遣之文蜂起。此类文字，一唱三叹，满纸哀音，几乎专从文字上费工夫，造意日落窠臼，革新更非所计。此类小说销路的广泛和迅速，可说全是一种逆流，此为排偶小说的第二种起因。

民初十余年间的社会，既沉浸于此类作品，一时如洪水泛滥，沛然莫之能御，写作者不但不设法挽救其弊，且推波助澜，从而鼓荡激扬，争先恐后地走这条路，唯恐不艳不衰。究竟为什么？一言以蔽之：卖文谋食。一般所谓洋场才子，既无技



术性的生产能力，又不能手缚一鸡，为仰事俯蓄，只有绞尽脑汁，出于卖文的一途，且必须这般文字这般作品，才有人领教，才受人欢迎，这真是“著书都为稻粱谋”，管他进步和落后。甚至陈陈相因，处处雷同，专在文字上讲铺排，以多为贵，换取金钱，为养命之源，此为排偶小说的第三种起因。

以上所述，略举排偶小说的起因，似此陈陈相因，即使没有外来的攻击，也日趋孤城落日之势，非被淘汰不可。因为日月对星辰，鸳鸯对蝴蝶，这一类写法，只能使人兴奋于一时，久而久之，习而生厌。

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坛上并无“鸳鸯蝴蝶派”的名称，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学兴起，有些人才称这些排偶言情作品和作者为“鸳鸯蝴蝶派”，并以徐枕亚、李定夷为作俑者。其实在《民权报》系统下形成的这些作品，可说都是媚世之文，但作者各行其是，并无集体组织，根本无所谓派。后来这些人虽在《小说丛报》和《小说新报》上各有领域，但相助写作的人都有很大的流动性，并不限于只为某一方面写作，其作品亦散向四面八方，并不集中于《小说丛报》和《小说新报》。李定夷于民国十年以后搁笔，没有续写小说，即民国八年至民国十年间，作品也很少。他常说：“我写作活跃时，不给我扣帽子，到退隐深藏以后，反来了一顶千钧压力的帽子，似乎是所谓‘鸳鸯蝴蝶派’的开山老祖了。”至于徐枕亚，他为了维持其独资经营的清华书局，比李多写了十年左右，但后来的作品，兴致阑珊，已非初年可比。

### 三

在清末民初之际，最脍炙人口的小说，当推曾孟朴的《孽海花》，林琴南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些小说虽出版于清末，入民国后，犹畅销不衰。林译尚有《迦姻小传》、《红礁画桨录》、《洪罕女郎传》等，描写细致，刻画入微。包天笑的《双泪碑》，短短不足万言，而情文相生，可歌可泣，可算是以后一切哀情小说的鼻祖。此外尚有吴趼人写的《恨海》，亦属清末之事。又若陈冷血，我已想不出他曾否为痴男怨女作传，但记得《时报》上刊登的《火里罪人》、《土里罪人》诸侦探小说，剥茧抽蕉，醞醞有味。当时尚有一部翻译的哀情小说《红泪影》，亦有不胫而走的魔力，现在人们知此书者恐已不多，书为报纸三十二开本四厚册，译者为谁已记不起。

张恨水作品的风行已在民国十年以后。《啼笑姻缘》为他的代表作，始刊于《北京晚报》（刘焯，字仰乾主办），上海《新闻报》复刊之。《新闻报》向不用其他报刊发表过的小说，此是创例，殆以《北京晚报》行销不多，又在北京之故。继且摄制电影，恨水以此成名，他的著作极多，单行本大约有数十种，以《春明外史》为最长。由上言之，所谓言情小说，起于清末，至张恨水为止，约有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历史。此后则武侠小说、神怪小说、黑幕小说、黄色小说麇杂其间，相与角逐了。

言情小说盛行时候，如赵茗狂、贡少芹、姚鹤雏、朱鸳雏、俞天愤、顾明道、许雁父、黄花奴等等，亦纷纷粉墨登场，但自郗以下，可置勿论。叶小凤（楚伦）亦写过好多种，如

《前辈先生》《古戍寒笳记》之类，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亦颇受人称许，姚鹓雏的《燕蹴箏弦录》、《风贴芙蓉记》，文笔细腻，亦一时佳作。至于娼门小说，张春帆的《九尾龟》、孙漱石的《海上繁华梦》，均曾风行一时。何一雁（海鸣，别署求幸福斋主）亦好写娼门小说，《琴嫖小传》为雉妓写照，活画人间地狱，其尤著者。不肖生（向恺然）的《留东外史》，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 四

海虞徐枕亚，原名觉，其作品有时署东海三郎别号。枕亚有姊及兄天啸，故以三郎自称。

在《玉梨魂》单行本未发行，《小说丛报》未创刊前，枕亚一度进中华书局编译所，充任编辑。在该所很少写作，大抵专任小说方面的改稿职务，极不得意，故任职期间并不久长。迨至小说丛报社组成，《玉梨魂》单行本问世。其书初由七浦路小说丛报社发行，后转交通路（今昭通路）清华书局。数年之间，到处发现翻版伪本，南方尤甚，自昆明、广州以至香港、新加坡各地，皆有翻版本推销，或另排铅印，或以原书摄影石印，枕亚初拟控诸法庭，而鞭长莫及，法庭辄不受理，即法庭出示查禁，书贾挟其伪本，换一码头，依然推销牟利，以此全不生效，遂亦听其自然。伪本纸张印刷均劣，成本低，售价廉，行销数倍于真本，各地友人时有寄来，枕亚见之啼笑皆非。此事可说自有版权以来的破天荒，几至如旧小说的无版权状态，所以《玉梨魂》的行销总数无法统计。

论《玉梨魂》的故事，实在平淡无奇。其所以风行一时，全

仗风花雪月的词藻，弄月吟风的诗篇，穿插其间，引人入胜。当枕亚写此书时，在《民权报》编辑部中，与李定夷一案相对，天天写上八九百字，并非一气呵成。枕亚有酒癖，有时案头置酒一壶，干果两色，边写边喝，信笔拈来，谁料及后来一纸风行，为人侧目呢？

《玉梨魂》处处模仿《花月痕》，所以穿插了许多诗词，据枕亚说：“一半确属书中人当日唱和之作，一半是写稿时添上的。”此书全是夫子自道，自然也免不了小说蹊径，颠三倒四，添油加酱，笔者现在不写《玉梨魂》索隐，对于书中人物的真相，不去列举，但述两三人，如书中的“筠倩”是影射枕亚夫人蔡蕊珠，“石痴”是影射后来做过汉奸的蔡培（字子平），“梦霞”当然是枕亚自己了，其他亦均有其人。

《雪鸿泪史》不是《玉梨魂》续集，可说是《玉梨魂》的补充本。完全是因为《玉梨魂》风行一时，所以赶出《雪鸿泪史》，东插一段，西补一回，硬把许多诗词充塞篇幅，以为可以借《玉梨魂》的东风，大获其利，那知《雪鸿泪史》的销路赶不上《玉梨魂》一半，也没有人翻版。为什么说《雪鸿泪史》不是《玉梨魂》的续集呢？因为原书中的主角梨娘、梦霞，先后去世，故事已经结束，实在无可续写，所以只有就书中写过的事，穷思极索，做补充文章，所以别取书名，谓是《玉梨魂》中人的雪泥鸿爪，斑斑泪痕，其实诗词太多，读者未必欢迎。

枕亚长篇作品，除《玉梨魂》、《雪鸿泪史》而外，尚有《余之妻》、《双鬟记》、（即《棒打鸳鸯录》的易名）、《刻骨相思记》多种，年深月久，已不能尽忆其名。《枕亚浪墨》系汇集历年多种

多样的短文合编，先后共出四集。此等书籍，销行数量均属平常，与《玉梨魂》的畅销迥异。枕亚于上述写作外，尚有《鼓盆遗恨》一种，全为蔡蕊珠死后感逝悼亡而作，并附刊刘沅颖的和篇，实为徐刘缔合的媒介，事已轶出民初文坛范围，不加琐述。

至于枕亚身世，实大可悲，天啸（枕亚之兄）前妻与蔡蕊珠妯娌两人，均与婆母不合，枕亚与蕊珠一生假离婚以避恶姑凶焰者凡三次，其平日家庭处境的拮据，可想而知。枕亚于抗战初期，避寇辗转逃至无锡乡间，生活已不堪回首，忧伤憔悴，以迄病逝。

## 五

许指严，原名国英，字子年，别署“高阳氏不才子”，吾师也，亦恽铁樵之师。铁樵名树珏，皆常州人。指严在民初上海文坛中，实为一健将，清末曾补博士弟子员，嗣在南洋公学中院教授历史，与姑苏徐筱石、宜兴徐棠芬、储南强、嘉定黄虞孙诸先师，同执国文或历史教鞭甚久，故门墙桃李甚盛，此为铁樵与笔者皆为弟子之由来。但铁樵继王西神（莼农）之后，主编商务印书馆月刊《小说月报》，对指严颇多贬辞，给以“张冠李戴，颠倒史乘”之考语，从不收用许的作品，当时文坛中人，几乎尽人皆知。

指严作品全属短篇，《南巡秘记》正续篇及《十叶野闻》两书，尤脍炙人口。十叶是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十世，合编成一书，拆之则皆

为短篇。当时笔者在上海文坛，谬叨虚声，积极吸收其作品。其为人名士积习甚深，既有寡人之疾，又与红友结不解之缘，因此经济长处艰困中，唯一出路靠写作补贴，可日成七八千言。民国四五年间，指严孑身旅京，在财政部印刷局任文牍员，此为当时北京唯一的不欠薪的机构，指严对于职务，自是游刃有余，故多写作时间。当时他身在北京，作品则全在上海发表，眷属亦留上海，送稿领酬，一切由胞弟志廉奔走。他的《清鉴易知录》一书，即写成于此时，线装十二册，布套一函，上海国华书局发行。其书以《东华录》为蓝本，自京陆续寄稿来沪，笔者为之审阅。铁樵遽以八字考语加之老师，未免苛刻。小说本与史乘不同，指严为推陈出新，有时不免穿凿附会，但真真假假，未可一笔抹煞，彼撰《清鉴易知录》，绝无张冠李戴、颠倒史乘之事，其短处在疏漏太多，详略失当。

指严有一特长，其短篇作品，往往把数十字即可叙述清楚的小掌故演成数千言，自然不免东拉西扯，但能写得生动流利，天衣无缝，为常人所不及。在《南巡秘纪》正续编及《十叶野闻》而外，指严在各种刊物所写的作品，如汇合起来，编成残墨、余墨或丛谈一类的书，可出三四册，但他不但不留稿，连登载他的作品的刊物亦不予保存，何稿刊在何家杂志，他自己也记忆不了，真是十足的名士派，故身后其作品完全散佚。

张春帆所编的《九尾龟》，最初由指严润色，此事小说界知者不多，指严亦不自言。笔者撰《定夷说集》两册，内容尽属短篇小说及历史掌故，今已绝版，刊印之始，指严知之，欣然送序文来。吾师忧伤憔悴，耗尽心血，年甫半百，即归道山，今

日追写生平，回首绛帐，能毋黯然。

## 六

民初上海文坛的作家，十年之间何止百数十人，四十年来，陆续归道山的当不止三分之二，今日存在的究有几人，无从调查统计，想来今日健在的，至多不逾三四十人，“补白大王”郑逸梅是此中康宁寿考的一位。

不论任何报纸杂志，在每篇作品之末，如排植有空隙地位，常选短篇小品填满之，是谓“补白”。补白材料，以短小精悍为上，逸梅写作最为适用，因此有“补白大王”之誉，成为民初上海文坛上的一员健将。逸梅不但不写长篇章回小说，即两三千字的短篇小说亦不易观，专写小品，寄各家杂志充补白。他平时搜罗此项材料，作品首尾完整，言简意赅，久之自成一派。其本职曾当过数十年大中学教师，后来靠寸管为生。生平所刊单行本，有《梅瓣》、《游艺集》、《慧心粲齿录》、《茶熟香温录》、《玉霄双剑记》、《庭园之趣味》、《淞云闲话》、《味灯漫笔》、《逸梅丛谈》、《三国闲话》、《近代野乘》、《孤芳集》、《浣花嚼雪录》、《羽翠鳞红集》、《花果小品》、《瓶笙花影录》、《人物品藻录》、《小品大观》、《拈花微笑录》、《逸梅小品正续集》、《上海旧话》等等，虽名目繁多，可以概括为“逸梅丛谈”四字，试以甲名移于乙书之上，或乙书与丙书互易书名，均无不可，皆为三十二开本，薄册居多，其中小说只有《玉霄双剑记》是独一无二。

## 七

赵茗狂，原名泽霖，字雨苍，别号茗水狂生，吴兴人，茗水为吴兴别名。他和我为少小同学，均少孤，又属同庚，交谊至厚。茗狂襁褓丧父，少年聪颖，是当日南洋公学的高材生。离校后，以鬻文自给，为民初上海文坛上健将之一。他主编上海世界书局半月刊《红玫瑰》多年。在此之前，任进步书局编辑，该局刊行《笔记小说大观》，系翻印古籍，线装小本，共五百册，装成木箱，茗狂任校勘、修改及标点工作，合作的还有好多位，濂江浊物其一也，隶“新旧废物”王均卿部下。解放后，茗狂年已周甲，尚编写连环图画文字甚多，旋即去世。

茗狂系独子，无兄弟姊妹行。幼时深受母教，有欧阳画荻之风。其母徐璠仙，系上海天足会发起人之一，久任天足会女校国文教师，刊有《璠华室诗稿》行世。当在校时，茗狂常写戏评投寄各报，茗水狂生之署名，即始于此时。其早年对于京戏的唱工、台容、武艺等等，均有深邃的研究，以作品与社会相见，尚在定夷之先。其时茗狂结合同学中有刘伶癖和周郎癖者八人，成一小集团，号称“八仙”，闻于校长唐公蔚芝，屢于稠人广众之前，指斥其非，试思以同学间的游戏三昧，而竟被高高在上的校长所知，茗狂之狂可以想见。迨毕业离校之后，八仙常会于言茂源、高长兴诸酒肆，唐公亦卸任校长，有时邀请参加，亦竟欣然而至，酒酣耳热之际，猜拳行令，引吭高歌，一洗以前校长尊严气象，不脱书生本色。我非戏迷与酒徒，不在八仙之列，每于休沐之日，与茗狂相会，常假座邑庙春风得



意楼茶园(今已圈进豫园,夷为平地),无非各抒牢骚。当时我不满国华书局主人沈仲华,茗狂与世界书局主人亦时有齟齬。盖昔日书贾惟利是图,谋求无厌,视编辑如文丐,等于奴而蓄之。迄今回溯,此种促膝倾谈仿佛犹昨日事,而故人邱垅宿草离离,能无慨然。

当我主编《小说新报》时,《红玫瑰》尚未出世,茗狂以长篇写作支援《小说新报》,有《日神娶妇录》、《无历国》、《变相之宰相》等篇,皆译自英文,分期连载,后皆印单行本行世。茗狂创作不多,全是译稿,且译笔率直,不加雕饰。其时社会风尚、群众心理均倾向本地风光的作品,故《日神娶妇录》等译作虽以欧美名家小说号召,但不合读者口味,销行不畅,声名稍逊。(林畏庐与人合译之作,却能畅销,此是例外)。后来《红玫瑰》出世,又值杂志风行时期已过,幸世界书局手面广阔,外埠分店甚多,犹能支持数年,终亦随其他小说杂志,同样受潮流的淘汰了。

## 八

自《小说丛报》、《小说新报》风行以后,杂志中的月刊、半月刊如风发泉涌,不胜枚举。中华书局原刊行《中华小说界》,后又添出《小说海》。锦章图书局有《繁华杂志》,继之以高剑华(许啸天妻)编的《眉语》、王均卿编的《香艳杂志》,后有《红玫瑰》、《紫罗兰》等等期刊,最后有《小说大观》,为包天笑主编,每季出一厚册,实价一元。更滑稽的是吴双热所编的星期刊《五铜圆》,仅售铜元五枚,每逢星期五出版,想以低价来争夺

《礼拜六》的销路，并先《礼拜六》一天发行。但五枚铜元的书价，能博几许微利，所以不到一年，即行停刊。当时小说杂志中的魁首当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主编几度易人，向进步方面选择写作。但是爱看小说杂志的老是这一班人，发刊种类越多，无形中分去一部分销路，由是竞争激烈，品格卑下的，遂以削价、赠品等办法向订户号召，对订阅一年的读者，可打折扣收款，或赠送月份牌、日历之类，以广招徕，搞得乌烟瘴气。

当时小说之中，以侦探小说最为难写。因这类小说虽与其他小说同是空中楼阁，但心思要缜密，布局要曲折，处处须埋藏关节，节节须预留伏笔，不能象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等可以平铺直叙。尤其难的是写短篇侦探小说，在三四千字里，要盘旋曲折，使读者有惊奇之感，所以写的人常感困难。程小青富有科学知识兼机械头脑，写侦探小说，一步紧逼一步，使空中楼阁曲折离奇，栩栩逼真。有中国“福尔摩斯”或“中国华生”之称。他除侦探小说外，很少有他种作品，可算侦探小说专家，惟其露头角享盛名较后。

民初，李涵秋写了一部《广陵潮》，是章回白话体巨著，描写社会情况，一时销行甚盛。又有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写的《留东外史》，描写留日学生的风流故事，别开生面，亦曾风行一时。又有谯北扬尘因写的《新华春梦记》，从洪宪帝制创议始，到袁世凯死亡止，把关于洪宪的形形色色包罗靡遗。此三部书可算民初小说界的巨制，不落恒蹊，各有特长。《留东外史》因销路优越，后来又出了续编，但质量远不及前作，难免贻画蛇

添足之讥。

民国十年以后，有网蛛生者，闻即平襟亚，曾写过两部长篇章回小说，一是《人海潮》，郑逸梅为之校勘。一是《人心大变》。前一部五大册，后一部亦有四五册，不如前一部写得好。两书模仿《人间地狱》，描写莺莺燕燕的生活，不脱风花雪月之谈，同时穿插农村破产，一般恶霸地主剥削农民情况，稍有进步性。

## 九

最后谈谈我自己。我名定夷，字健青，别署墨隐庐主人，亦称墨隐生，毗陵人。民国三四年间，上海中华图书馆发行《礼拜六》星期刊，曾轰动一时，每期销数最多时可达万册。其时《民权报》已是风中残烛，关门已成定局，我虽困守报内，但亦时想找出路，以为日后衣食之计，因有《消闲钟》期刊计划。清末日本人曾在上海刊行《同文沪报》，其附刊名《消闲录》，内容全是诗词及小品文字，为“报屁股”的初创者，可以另装成册，颇受读者欢迎，我隐取其名，改“录”为“钟”。初采报纸形式，三十二开，每月出一期，内容分小说、笔记、诗词、谐谈各门，拟俟办理稍有成效，再改为星期刊或旬刊，每期门售市价小洋一角，再加上寄售的折扣，所得只是蝇头微利。中华图书馆经理叶君是位长袖善舞、较有文化程度的书商，兼任上海书业公会会长，我托人向该馆申请寄售，并将计划和盘托出，该报不允接受。未几，《礼拜六》诞生，实力雄厚，推广得力，《消闲钟》虽托上海国华书局代售，但经理沈仲华不善经营，《消闲

钟》被迫停刊，而《礼拜六》则隆隆日上。

每一位从事写作的人都各有其代表作品，我的代表作品是什么呢？有人说我的代表作是《美人福》，这是错误的，因为《美人福》的题材虽和毕倚虹的《人间地狱》相似，但毕因死亡而中辍，我却生存，不过不愿再写下去，以不结束为结束耳。我自己认为我的代表作是《李十种》，所谓《李十种》者，是十种合刊，装一锦匣，《美人福》并不在内。这十种是《霞玉怨》、《鸳湖潮》、《红粉劫》、《茜窗泪影》、《千金骨》、《昙花影》、《辽西梦》、《伉俪福》、《同命鸟》、《双缢记》。这十种中，九种是言情小说，其中哀情居多，一种是旧社会的封建道德小说。此外作品，尚有《湘娥泪》（写辛亥革命事迹，着重旧社会封建道德，后被国华新记书局改名为《春闺人梦》，不知何解），《廿年苦节记》（此系写实小说，亦是提倡旧的封建道德，后被国华新记书局改名为《薄命花》，失却原作宗旨），《南北浪游记》（仿《老残游记》体裁），《急富党》，《镜花水月》，《雪花缘》（以上两种，皆新记所改之名，原名已记忆不起），《李代桃僵记》，《新上海现形记》等等长篇小说，及《定夷说集》、《定夷丛刊》一、二集（以上两种均短篇小说及笔记杂文之类），《醇王妃自尽记》，《吴苑莺声谱》，《复辟之黑幕》（张勋主演的滑稽剧），《徐世昌之秘密》等，均是单行本，共在三十种以上，现在不但本人无存书，即书名也有些记忆不起来。就上述各作品的性质言，侦探、言情、社会各种俱备，至于经手编辑的大抵比写作的多一倍以上，所以有人说我是“多文为富”，此四字似是谑词，其实贬到极点，含有讽刺之意。就此一点，可以知道在生活压迫之

下，不写这许多东西换钱，是无法应付开门七件事的。

《小说丛报》于一九一四年发行，编辑和写作的人有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刘铁冷、蒋箸超、包醒独、徐吁公、胡仪邗、姚鹓雏、沈东訥、王西神、许厯父、陈索然、俞天愤等，可以说十之六七，是拉拢《民权报》小品文的作家。《小说新报》于一九一五年发行，编辑者为李定夷、许指严、包醒独、贡少芹、刘山农、朱大可，写作者有倪鞅池、倪易时、黄花奴、吴东园、顾明道、朱诗隐、陈秋水、郑逸梅、吴绮缘、周瘦鹃、赵苕狂等，这里面有许多是我的旧友新知。两者同是月刊，十六开本，月出一厚册，售价四角，内容分类，大旨相同。《小说新报》创刊时，国华主人以发刊词嘱予，爰弁其端，中有“重翻趣史，吹皱春池。画蝴蝶于罗裙，认鸳鸯于坠瓦。遂使竹林游歌，尚识黄公之炉；山阳室空，犹听邻家之笛”等语，后来这些人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可能与此有关。

以上所述是民国初年，我在上海文坛中的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民国十年以后，我脱离小说界，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 上海出版界琐闻

平襟亚

## 一、从老牛耕书田谈铅石印的发明

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司在上海创设墨海书馆,印刷《圣经》和其他小册子。当时,铁制的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宽三尺余,旁置齿轮两个。两个工人管理印刷,用一头老牛拖拉机轴,使车轮旋转。下铺书版,上叠纸张,垫以毛毯,随印随揭。书版以泥胎刻字,装在铅版上,墨汁胶棍,大致与今式略同。当时有人咏以诗云:“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字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

以后墨海书馆关闭,美国传教士别设美华书馆于南门外,造铅字铜模,浇活字版印书籍,中国工人习这种印刷业者甚众。外国人又续开别发书店于南京路,中国人自设印书馆与报馆者亦渐起,始以印刷机、引擎、马达代替牛步,铅印事业日见发达,而申报馆之铅印书籍亦陆续出版发行。

石印书籍之开端,最先为点石斋,继起者有拜石山房、同文书局,鼎足而三。点石斋亦为英国人所办,拜石山房为我国宁波人所创,同文书局为广东人所设。校刊印刷以同文书局为最精美。点石斋除印刷书籍外,又发行《时事画报》,延聘吴友如绘图,每册五分,按期出版,尤算廉美。同文书局的创办

人名徐鸿甫，其后人徐建俟至今犹健在。清光绪年间，同文书局曾为西太后承印《古今图书集成》一百零一部，三载印成，工力浩大。此后兼印旧小说《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书，亦极精妙，名重书林，迄今尚有流传。这是开石印书籍的先河，在中国出版史上放一异彩。

## 二、中国科学丛书

试查《四库全书》目录，其中关于科学实业的著作甚少，除《农政全书》、《几何原本》外，余者无几。以上两书为明朝徐光启所著译。《农政全书》六十卷，对于种植、渔牧都有贡献。《几何原本》系徐与意大利教士利玛窦合译，为欧洲算学之鼻祖，原本凡十五卷，光启删繁就简，取其论圆形、线形、三角、比例、圆内、外形等六卷。此两种书实于科学实业有很大裨益，更启发了后人翻译科学书的兴趣，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 三、晚清封建文艺的挣扎

在上海，石印书籍的还有鸿文书局，初与同文书局、点石斋齐名，创办人为江苏震泽人陆陛卿孝廉。他中了科举之毒，以雄厚的资金专印考场所用的书籍。如《五经汇解》、《大题文府》等类，不下数百种，以利当时士子猎取功名。初期亦曾风行一时，儒生们几乎人手一编，迨戊戌政变，八股文既废，大题、小题等书如同垃圾。然犹挣扎图存，改编“尊王攘夷”的策、论、义诸书，可是已成强弩之末。随后清政府终于废除科举，因此这种封建文艺无人过问。鸿文书局损失不貲。

民国成立后，曾谋改弦更张，出版教科书，因乏资金，乃将石印局出盘于吴某，改印旧小说。未几又将棋盘街的发行所出盘，全部资产葬送在封建文艺中。

#### 四、石印唱本小书的兴起

上海有一文某，小名阿孝，以卖报为生，克勤克俭，风雨不辍，除糊口外，积有余资，托人抄写蝇头小楷的唱本小书数种，如《三笑》、《十美图》、《换空箱》、《玉蜻蜓》之类，印成线装油光纸小本书籍，卖报时沿街叫卖。当时印工、纸张价极低贱，买客舟车携带亦甚便利，因此生意大盛。于是福州路之书摊亦向他批售，所盈利润倍于成本。阿孝遂专营此业，逐渐发展，种类愈印愈多，旧小说如《征东》、《征西》、《说唐》、《水浒》、《荡寇志》、《小五义》、《万花楼》、《杨家将》等无不具备，为数五六千种。不数年后，获利十万余金，设行栈于派克路，初托鸿文书局代印，其后自设石印局，名“文寿记”，购置石印机十余架，外埠之来批发者亦不下数百家。设发行所于麦家圈，俨然一大书坊。于是各石印局皆加仿效，添印此类通俗唱本书及旧小说，名谓“拆片”，批给各书坊装订出售，而文寿记不能专其利矣。惜所印之书，大都字小如蝇头，无人校订，错讹百出，而装帧亦差，读者既伤目力，又受毒害。此类石印小书行销各地之广，为历来所未有。直至五四运动后，铅印书发达，石印书逐渐淘汰，阿孝始弃本业。而石印唱本小书之通俗化，却是他开端的，在出版史上应有其名号。



## 五、文明书局的书画手册

文明书局创办人为无锡廉惠卿（即廉泉，号南湖居士、小万柳堂主人），好尚风雅，以当时之所谓名士兼充书贾，实启“商务”、“中华”之先声。他延聘通人编辑，皆一时上选，所出版的启蒙小学读本，颇费苦心，在晚清时，行销极为广泛。廉先生家藏历代名画甚富，尤其是扇页，得宫氏之贻赠，凡五百余帧，皆出自历代名人手笔。当时将书画手册及扇页，陆续用珂罗版印行，能不失其真，一时惊为神奇。主人一生的精神与财力悉耗于影印书画手册之上，凡五百七十余种。惜乎成本既贵，售价亦昂，致赏者不多，销路不广。光复后不久，盘给中华书局，初设在棋盘街，曾一度迁至南京路。中华接办后，大加整顿，添设进步编辑所，于三数年中出书至三四百种，营业骤增。又十年后，中华书局无暇兼顾，盘给傅湘臣，以售卖文具为主要业务，不再出版新书。当书画手册全盛时期，溧阳狄楚青（平子）亦在其所开设的有正书局，大量印行名人书画手册。狄收藏亦富，艺苑瑰宝黄雀山樵的《青卞隐居图》，为狄之珍藏物，狄身后其家属以二十万金售于魏停云，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狄与廉惠卿竞争剧烈，所印行之书画珂罗版手册，亦有三百余种，便利画家临摹实匪浅鲜。“文明”、“有正”在出版界都有其独特的作风，故追记及之。

## 六、书籍免税之由来

自有租界以来，外国人垄断中国货品的进出口，海关税则

除特种货物列举品名，订有一定税率外，其他概从“值百抽五”的制度，另加浚浦捐（俗称码头捐）千分之二五，合为五二五。换言之即货价估值百两者，应纳关平银五两二钱五分。凡属书籍暨印刷品，向章每一百斤估价银六十两，例征税捐三两一钱五分，以每箱重二百斤计之，约合银洋九元余。在寄往各省区时，小包可从邮局寄递，多量书籍非装箱报关运输不可。当清光绪戊戌之交，新学勃兴，出版物寄递较多，那时无锡廉惠卿方主办文明书局，编印教科书与书画册甚力，复于京津各地设立分销处，运输不绝于水道，因向海关申请，以书籍为教育用品，启迪百姓智识为理由，希望与普通商品有别，免于纳税，俾得流转广泛，减轻读者负担。海关洋人坚执不允，交涉再三，并无结果。时袁世凯方任直隶总督，为康梁一案卖友求荣，见信于西太后拉那氏，而廉与袁友善，向袁陈说，袁允其请，命以书贾名义正式稟求，即为向拉那氏奏请，下旨允准。遂由清廷派员与上海海关税务司西人力争，使书籍免税成为定案。后二十年内，不特书贾隐受其惠，即莘莘学子亦略减负荷。

## 七、上海最老的书坊

上海为全国文化中心，书坊林立，开设年代最悠久者，莫如扫叶山房。此店为洞庭山席氏所创办，以印行木版诗文集出名。其创业在明朝末叶，向设在苏州阊门大街，分设上海河南路已在晚清年间，历时未久。另上海大东门外，有一家“黄文正书店”，创自明代中叶，至民国十五年犹存在，但局面很小，

并未见有出版物发行，其开设年代则早于扫叶山房。

## 八、晚清以后的章回小说

在清光绪年间，章回小说有过惊人的发展。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反映清朝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同样反映当时社会的混乱。这些类似的小说书，内容不必加以论列，可是在出版史上占着重要地位。到光复以后，新陈代谢，然而李涵秋的《广陵潮》仍在出版界占着相当地位。经过五四运动后，新的文艺形式崛起，章回小说遭到冷落，有人称之为旧小说，以示旧形式的落伍，难以与新文艺相提并论，但是，从当时出版界的观点来说，他们仍致力于章回小说的印行。因为这时的章回小说仍有广大的读者，读者要求出版，书坊主人投其所好，大量印行。可是光复初年章回小说的作者不多，写来纯熟的只有六七人，书坊主人不能立等着拿来出版，因此，念头转到各大报上排日登载的长篇小说，托人向报馆方面买来印刷出版，但旷日持久，数量不多。

五四运动前后出版的章回小说，继承了晚清小说的作风，内容概括地说，包含着两种主题思想，一有关社会人情的讽刺小说和恋爱小说，一是幻想的神怪小说和侠义小说。前者以《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为蓝本，后者以《封神榜》和《七侠五义》为蓝本，以外并不见有独创一格的书籍出版。

《广陵潮》、《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实质上够不上《儒林外史》可以称为“讽刺小说”，所以后人批评它是“谴责小说”。由谴责的作风，愈趋愈下，流为“黑幕”

与“漫骂”。这一类小说也出版了好多种。申报馆四社出版了不肖生著的《留东外史》，某一书局出版了曾在《商报》上登过的陈辟邪所著的《海外缤纷录》，前者反映留学日本学生的胡作非为，后者描写留法学生的奇闻怪事。这是同一类型的小说，销路都很广泛，前者更胜于后者。内容都不外乎暴露丑恶，谈不上什么积极意义。另一部《新申报》刊登过、后来出版单行本的漫骂小说《歇浦潮》（署名“海上说梦人”），朱瘦菊著，因揭发的是上海社会的内幕，属于本地风光，所以销路更比以上两部书广泛。这三种小说的畅销，实启后来出版界刊行各种黑幕秘闻小说的先声。

张恨水是个多产的章回小说作家，李涵秋后一人而已。自他的《春明外史》出版后，接着《啼笑姻缘》排日在《新闻报》上刊登。由于读者疯狂似的欢迎，引起出版界的注意。当时世界书局特地派人上北京去向他买了许多种已写成的稿本，更向他预订，不论多少，包下来出版。张接受了定银，只好象工厂里的机器一般，日夜开动引擎，不停地制造。此后他的出品之多，超过了李涵秋，在世界书局出版发行的有《春明外史》、《满江红》、《金粉世家》、《落霞孤鹜》等十余种，在别家出版的有《现代青年》、《新斩鬼传》、《胭脂泪》、《秘密谷》、《夜深沉》、《秦淮世家》、《平沪通车》、《似水流年》、《欢喜冤家》、《如此江山》、《蜀道难》、《啼笑姻缘正续集》等十余种，其中《啼笑姻缘》是由新闻报馆几位编辑定名，三友书店出版的。他的作品统计大约有四十种，以每种三十万字计算，共一千二百万字。人只有十指，在短短十年内，写这许多文字，是可惊异的一个纪录。

关于章回体长篇武侠小说，在世界书局《红玫瑰》杂志上刊登过，后来出版单行本的不肖生(向恺然)所著《江湖奇侠传》，可以算是代表作。此外还有《近代侠义英雄传》。前者销路之广胜于后者，但内容还是后者为佳。后者还记述了一些侠义人物的掌故，前者除飞剑道术以外，摭拾了一些清人笔记里的民间传说，以及戏剧里的情节。作者贯串这些故事确有才能，写得很有趣味。但传布广泛，影响所及，流毒无穷。这些书的受人们欢迎，说明当时社会民生的不安定，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愤懑不平，同情甚至迷信这些打抱不平的侠士、剑客来抑强除奸，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混乱。

此后更有人摹仿《江湖奇侠传》，变本加厉地捏造了剑侠的派别和相互斗争的故事，著成许多类似的武侠小说，如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出至三十二集(天津励力出版社出版，到上海来分销)，《青城十九侠》，出至十九集，《蛮荒侠隐记》，出至五集，《云海争奇记》，出至六集，又《边寨英雄》一集。以上七八十种书都畅销一时。

另有北方作家刘云若的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杏出墙记》、《春风回梦录》、《碧海青天》、《春水红霞》、《翠袖黄衫》、《换巢鸾凤》、《酒眼灯唇录》等，亦由天津励力出版社出版，到上海来大量倾销。

此外比较有价值的章回小说，如常熟曾孟朴父子在上海开设的真善美书店，出版了修改本《孽海花》和《鲁男子》，由于读者大都是知识界人士，销行并不广泛。

相反地，另一位玉田赵焕亭的武侠小说，作风不同于不肖

生，所著《江湖奇传》，描写细致，结构精密，故事亦很动人，深受出版界欢迎，亦拥有大量读者。此外他还著有《奇侠精忠传》、《英雄走国记》、《惊人奇侠传》等，每种销数都在三、五万册以上。他的作品风格很象《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没有“一道白光”的邪气，也没有“飞檐走壁”的幻想，不同于神怪小说，却类似公案小说。

另一位姚民哀的武侠小说，偏重于描写江湖帮会，出版界称之为“会党小说”。他搬用了许多江湖上的黑话，有人怀疑作者是青红帮中的背叛者。其实他是个评弹艺人（艺名朱兰庵），南社社员。他的作品有《四海群龙传》、《龙驹走血记》、《江湖豪侠传》、《山东响马》等，大都是大众书局出版发行的。姚在抗战时期，因加入了敌伪组织，在原籍常熟东塘市被狙击而死。

描写娼妓的章回长篇小说，有刘子云的《海上花列传》，著于晚清。张春帆的《九尾龟》，亦成于清末民初。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从清末写到民初，有许多集。另有毕倚红（振达）写的《人间地狱》，刊登在《申报·自由谈》上，后由申报馆张竹坪等办的“四社”出版发行。文笔虽高妙，但行销不甚广泛。

翻译小说，如商务印书馆的《林译小说》以及《说部丛书》有一千余种，但非章回小说。可是商务推销的方法值得一提，他们提倡凡喜爱阅看小说的读者，预先付一笔钱，存在他们馆里，并说明爱看哪一类别（如冒险、爱情、侦探、历史之类），哪一个人著作，然后一经出版，立即邮寄。到预付款如数用讫，再通知继续订阅。这种便利读者的方法，为购书人服务的精神值得效法。

章回小说家李涵秋享有盛名，他死于一九二三年。死后，上海各书局纷纷出版他的遗作长篇说部。甚至对未完篇者，出版人自作主张，倩人赍续，草草成稿，付印以图利。涵秋之弟镜安曾致书新闻报馆，谓《近十五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涵秋仅撰至三十七回止，而以四十回结束，其余诸回何人所作，先兄不能负责。又《新广陵潮》先兄生前只撰了第一回，约八千字，便已逝世，此回以下，不单无片言只语，且回目亦未定，兹刊行的单行本竟有三十回，亦系伪托可知，具见书贾牟利之不择手段。查涵秋著作虽多，刊在报上的小说，未完篇的亦不少，如《镜中人影》则为程瞻庐继续写成，《爱克司光录》为范烟桥所续完。《镜中人影》与《广陵潮》两书，乃涵秋成名之作，所以涵秋死后，包天笑有挽联云：“广陵潮已成广陵散，镜中影空幻境中花。”联中嵌入两部小说书名，甚为工切。

涵秋未死之前，约在一九二二年，当时的青岛被日本占据，社会人士大为不平，涵秋正为某报撰著《爱克司光录》长篇说部，排日刊登，很受读者欢迎，他就在第三回中以翁和其媳作譬喻，以解释青岛的形势，其事其文资人喟嘘，但字面上并不暴露秽亵。不料竟为巡捕房向会审公廨提起控诉，涵秋至公廨内，站在被告栏，备受污辱。因为把中文译作英语，原意尽失而实较冗长，不似中文之含蓄不露。当原告捕房律师高声宣读译文，每读一句，顾堂上，复顾被告，听者皆忍俊不禁。时涵秋手执原报静听，如立针毡，既不能中止其言，加以剖白，惟有冀其速读，而得以脱离窘境。捕房律师良久读毕，涵秋已汗渍重衫，站立不稳了。这是涵秋身受奇窘的一次迫害。

长篇章回小说，在当时出版界有着相当的潜在势力，在民间流行很久很广，倘要使文艺大众化、文艺通俗化，现在还有考虑的必要。

### 九、鸳鸯蝴蝶派与礼拜六派

所谓“鸳鸯蝴蝶派”的作品，首先是出在山东路交通路清华书局里的一本文言小说《玉梨魂》。当时新文艺作者们指摘这本书，足以代表这一派的作品。《玉梨魂》的作者徐枕亚，原籍常熟，是个很拘谨的小学教师。民国初年，上海流行着文言写的爱情小说，枕亚就效学《燕山外史》那种笔调，似骈体而实非骈体，以堆凑香艳词句，好为无病呻吟的语气，写成章回小说。它的用词遣句往往空泛掉文，有人把“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联句，来比他的作品，就说这是“鸳鸯蝴蝶派”，其实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写这样的小说，谈不上什么派。

至于《礼拜六》，这是由王钝根编辑的一种小说周刊。由中华图书馆出版发行。周瘦鹃、严独鹤、吴绮缘等经常撰稿，丁慕琴作封面画。小说以文言为主，白话的不多，更无派别之可言。当时新文艺作家提倡白话，把写文言的说成另一派，是不公允的。

徐枕亚起初在常熟乡间教书，课余写成了几回《玉梨魂》小说，投登在《民权报》上，受到读者的欢迎，编辑人便请他到上海来写。一年内这篇小说登完，他便成了名。不久与胞兄徐天啸开设清华书局，出版《玉梨魂》单行本，又继续出版了另一小说《雪鸿泪史》，风格已不同于《玉梨魂》了。



清华书局出版发行的文言小说，有吴双热的《兰娘哀史》，徐天啸的《双鬟记》等十余种。不久又出版了一种《小说丛报》，定期月刊，十六开本，材料很丰富，以小说、笔记为主要内容，每期可销三千到五千册。同时福州路国华书局主人沈仲华亦出版发行了一种《小说新报》，与《小说丛报》同一类型，延聘李定夷主编，写作者有许指严、刘铁冷、吴绮缘等。这两种定期刊物的畅销，可见当时爱好文言小说的尚不乏人。就是李定夷作的长篇小说，如《美人福》、《贫玉怨》等十余种，在国华书局亦在畅销书之列。

徐枕亚因《玉梨魂》一书的风行海内，居然做了状元的女婿。北京有个刘春霖，在清朝科举最后的一科，廷试一甲一名，中了状元，所以人称“末代状元”。他家里有一位三十岁未嫁的小姐，看《玉梨魂》入了迷，便与枕亚通信。恰巧枕亚断弦，刘小姐便许嫁与枕亚，要求枕亚上北京向她父亲求亲。枕亚如约而去，却见不到这位状元丈人。后来还是去拜了樊樊山做老师，由樊山老人作伐，枕亚才算做了“牛府招亲的蔡伯喈”。这是小说家的一段艳史，有人笑说：“书中自有颜如玉。”到上海抗战时期，徐枕亚将清华书局关掉，存货售于大众书局，往内地避难。不久与状元小姐相继去世。

## 十、黑幕小说的潮流

民国以来，上海的出版界经常掀起一个接一个的潮流。民国初年，竟出武侠小说，不是武侠章回小说，就是笔记一类的短篇武侠作品。例如《武侠大观》、《武侠汇编》以及《三十六侠

客》、《四十八女侠》，等等，风起云涌，不知出版了多少数量，也不知毒害了多少青年读者。竟有天真的小学生们，背了包裹上峨嵋山去找剑侠的，其责任应由无聊作家和骗子书贾来承担。武侠小说的潮流过去后，又掀起了一个黑幕小说的潮流。这种揭发内幕秘密的短稿，其实不能当小说看待，但当时都称它“黑幕小说”。始作俑者是《时事新报》副刊编者钱生可，他登报征求黑幕秘闻，又复排日刊列报端，帮会的黑幕，赌窟的黑幕，银行的黑幕，娼妓的黑幕，什么都有，只是报馆的黑幕没有揭发出来，巡捕房的黑幕不敢揭发。当时上海整个的社会，张着一幅暗无天日的大黑幕，又有无数人天天在制造黑幕，材料是取不尽登不完的。自从报上登载了一个时期，书贾的脑筋便转到这上面来，互相竞争，出版关于黑幕、秘闻一类的书籍。其中有一家集成图书公司的主人鲁某，更大张旗鼓地登报征集黑幕稿件，同时发售预约券，定名叫《中国黑幕大观》，准备收集三百万字，出版十六开大本四厚册，定价五元，预约半价。他一面征稿，一面托无名作者制造，又把制造出来的材料印了样本，分送各省区、各机关，无远弗届。

《中国黑幕大观》的出版，震惊着每一地区的“问题人物”，有些官僚、巨贾、土豪、劣绅，见广告目录上登出自己的名字，怕被揭发隐私，只有到上海来走门路，找到书坊老板“讲斤头”，化掉一笔钱，买他抽掉这段东西。据说当时有一名已下台的大人物，年龄已经八十有三，那捏造故事的人根本没有调查他的情况，就说他有七个姨太太，时常同某一个姨太太合穿一条四脚棉裤，引为风流韵事。这条秘闻捏造得相当离奇而

恶毒，刊登于样本上，还有一幅插画，画面上的这个老人，却没有生胡子。这位老人看到，雪白的胡子气得根根直竖，他想这无中生有的恶作剧，叫我怎样有面孔去见那满堂子孙呢？不得已，只好派一名心腹家人特地到上海，找那个书坊老板办交涉。这个家人很能干，他明知是一记“竹杠”，即把五百元钞票给这个老板，只说预约此书二百部，我主人某某某准备当做善书送人，不过附带一个条件，请把我主人的姓名改掉，否则主人送不出去。这老板自然心照不宣，一口应允，只把他姓名改作“×××”，定书二百部，何乐而不为？所以当时他出版这部《中国黑幕大观》，用这种推销方法进行推销，可算是黑幕中的黑幕。

当时《时事新报》上刊登的许多黑幕，也由编者钱生可分门别类印成单行本，定名《上海黑幕汇编》，委托各书局代售，一版再版，销去的数量很可观。

### 十一、书业闯将沈知方

沈知方原名芝芳，绍兴人，上海世界书局是他一手创办的。他在上海书业中艰苦奋斗了四十余年，可称是一员闯将。科举时代他还年轻，跟随几位书业老前辈，提了考篮往各行省、各码头赶考场，向举子们兜卖《大题文府》一类的书本。由于他足迹遍都会，深入民间，留心书业经营，所以对于书籍的营销网了如指掌，只消一见书名，略看内容，便能肯定指出这本书应该销往南方或北方，广州可销多少册，汉口可销多少册，北京可销多少册。他的这种眼力是从经验中得来的。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粹芳，器重他的才能，但又不敢信任他，只以小恩小惠加以羁縻，请他担任业务上的顾问，每月送他五十元的车马费，开业务会议时，要他列席，以备咨询，他笑而就之。另一方面与友人王均卿等创办国学扶轮社，翻印了许多诗文集以及章太炎的国故著作。后以十万元盘出，另行组织进步书局，出版了卷页很多的《香艳丛书》，油光纸铅印，线装本，销行不多。另有石印袖珍本笔记许多种，阅者多称便利，但沈知方仍未得一展长才，郁郁不得志。

会一九一一年八月以前，武昌起义尚未发难，而革命空气已笼罩全国。商务印书馆照例要准备预印明年发行全国的教科书。在业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重要问题，讨论假如仍旧印《大清国民读本》，一旦时局有变，非但损失不貲，而且重新赶编赶印新的又来不及，将如何应付？夏粹芳向沈知方征求意见，沈已胸有成竹，只推托人微言轻，事关国家大势，不便置喙，但若改编太早，人将指摘我馆为革命党机关，有杀头封门之危险。依本人之见，还得照常办理，何况革命党声势虽大，要推翻清朝恐难成事实。夏粹芳听信了沈的意见，力主照常印刷。谁知沈早有准备，他另与一批朋友们日夜赶编倾向于革命的教科书。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相继独立，上海光复，商务印书馆既受浩大损失，又复手忙脚乱，编印不出明年供应的教科书来。沈知方乘时崛起，与朋友们集资数十万，准备创立中华书局，大量出版《新中华教科书》，向全国倾销。

到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中华书局成立，积极扩充，资本额逐渐增至一百五十余万元，添设各省分局多至四十余所，

盘入其他书局及印刷所亦不少，编辑办事人员以及印刷所工人一跃而为二千余人。以后对于福州路之总店及静安寺路之总厂，经营不遗余力，高大的建筑物先后落成，规模宏大，与商务并峙对立。直至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欧洲战争蔓延，各种原料运输阻塞，国内南北交哄，书业生涯一落千丈，中华书局尾大不掉，经济发生困难，各分局亦接济不上。而沈知方自己又为黄楚九包销龙虎人丹，由于推销不广，亏折很巨，向中华书局挪用的款项一时无法清偿，只能向亲友们多方借贷归还，而中华周转不灵，只得改组，另赁与新股东接办。此乃一九一七年十月之事。至一九一八年底，新改组的中华书局因营业不得法，仍归还给旧股东，由陆费伯鸿主持，苦心经营，得恢复旧观。

沈知方退出中华书局后，因债务逼迫，匿居苏州岳丈罗姓家中，对外扬言已死，债权人亦未调查，疑信参半，暂时置之度外。事隔经年，沈又复来上海，住闸北香山路香馨里八号，由其岳丈出面，用广文书局名义，编印多种“滑头书”，陆续出版，委托福州路大东书局经销。大东原为沈知方的侄子骏声以及老友王均卿、李子泉等合资开设，对于沈知方的一切，他们都很了解。沈知方每天躲在三层楼，绝不与陌生人见面，只指挥家人干着出版工作，凭大幅报章广告，向读者宣传。那时的报纸以刊登广告为收入源泉，甚至第一版只留报名，其余都是书籍目录的广告。沈知方出版的东西，有《香艳大观》、《百奇大观》、《嫖赌百弊大观》、《名人爱妾大观》，等等。还有《未来预知术》，说是周文王著作的，《婚姻预知术》、《管辂神相术》，说是月下老人的秘本；《管辂神相术》，说是管辂的遗稿。这些广

告每天在《新闻报》上占着巨幅地位。有时还串出两个人来办假交涉，各登广告，一个叫管阿大，一个叫管阿三，一个说，《管辘神相术》一稿应归长房长子所得；一个反驳说，《管辘神相术》是祖上传给三房的，长房不得占有。后来广文书局再登出巨幅广告，向双方“劝和”，说《管辘神相术》一稿已由本局收买，今日出版了，大东书局代售。自有读者去抢购一空，真是千百年来所未有之奇事。

沈知方那里有个打杂的叫朱锡泉，亦绍兴人，专办送货及寄邮包等杂差，忽然中了“慈善奖券”头彩，得到三万元。他一字不识，居然也在山东路麦家圈开起一家新华书局来。他仿效沈知方的办法，出版了一本《财运预知法》，在发行以前，托刻字店刻了数十方“灵”字的木戳，刊印在《新闻报》的显著地位，叫读者猜详什么最灵？他准备在七天之后再登出这部书的广告，告诉读者他这本《财运预知法》最灵，照这本书的办法买彩票，定中头奖。他用这个方法使人注意，自以为非常聪明，十分高妙。不料这个消息被沈知方侦悉，就在五天内赶印出一本《财运预测术》，先他一日在报上登出广告，说是灵书今天出版了，由大东书局代售。这本《财运预测术》最最灵验，能预测头奖号码，百发百中。朱连日刊登的广告效力都被他吸收去了，等于替他的书登了广告。沈知方通过这样的手段搞到了不少的钱，但因为欠下许多债，躲在三楼小房间内，见不得人面。当时有几个债权人已知悉他又来上海，住在广文书局内，只是书局不承认有他这个人，也没有办法。谁知那个朱锡泉吃了亏，就想出个恶毒的计策来，有一天，用沈知方的姓名，在《新闻

报》上刊登三行短短的广告。第二天沈知方睡在床上阅报，只见报上登着：“书商沈知方启事。本人业已来沪，住闸北香山路香馨里八号三楼。凡有亲友前来采访，须在上午七时以前。此启。”沈知方一见广告，大吃一惊，立即返回苏州。后来债权人陆续上门讨债，书局里不能否认，只得请律师出面与他们讲条件，答应分期拨付，三年还清。这样，沈知方又重来上海，公开出头露面，继续出版滑头书。他见报上有段新闻，妓院里有妓女蒋老五自杀，立刻派人去采访材料，出版了一本《蒋老五殉情记》。又见阎瑞生谋害妓女王莲英，认为是好题材，立即出版特刊。如此不到二年，大发其财，租下福州路房屋，与朋友们拼凑了些股份开起世界书局来，把门面漆上红色，以“红屋”号召，使读者注意。又出版《红玫瑰》杂志、《侦探杂志》，销路甚广，不到三年，各省区有分局三十余所，大连湾路印刷厂买了十几部自动“密力”印刷机，编辑所工作人员达一千多名，于是编辑出版教科书。他知道小学教科书向由商务、中华两家包办，要分一杯羹实非易事。于是他一面向教育部走门路，办妥审定注册的手续，一面调查全上海初高级小学的名录，然后填就“取货摺子”，派人分送各学校负责人，说明凭摺取货，不必付钱，到学期终了时结账，八折付款，另提一成给经办人作为酬劳。这个办法实际上是凭摺赊购，照定价打七折付款，比商务、中华优待。向例小学教科书由学生自备，他这个办法提醒了学校方面包办教科书，因此世界书局的教科书销售一空，商务、中华大受打击。从此沈知方连续招股，大加扩充，发行所迁至崇让里口新厦，不再出版滑头书，而开始

出版有价值书，即翻印铅印、石印古典书籍，如《元曲选》、《昆曲大全》等，校对审慎，印订精良。不过沈知方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对于编辑方面是门外汉，所以吃亏不少，赔了很多钱，以致经济逐步周转不灵。于是他开办“读书储蓄”和“世界银行”，吸收存款，借以暂时维持现状。

后来世界银行发生挤兑风潮，终于关门，世界书局也蒙受了重大影响，于是官僚资本乘机而入。世界书局有位秘书陆高谊和李石曾认识，李示意于陆，愿加入一二百万元收买世界书局，仍由沈知方出面经营。沈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只好出卖了十年辛苦经营的这一家书局。

李石曾收买世界书局的款项，据说是他保管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李收买后，沈知方仍想维持下去，以便日后重振旗鼓。不料李石曾接办后，竟撤了沈知方的总经理职务，委任陆高谊接任总经理，直到解放。

沈知方晚年住在石门路同孚里，生活非常凄楚，欠了出窠弟兄姓魏的一千元债，被逼迫当尽卖绝才还清。一年后，生胃病死去。

## 十二、混乱的书市

“一·二八”上海事变后，百业萧条，福州路、河南路虽号称文化街，此时每家书店却门可罗雀。书贾虽效学百货商店举行大廉价，但是任你卖得低廉，买主仍甚稀少。当时各家书店门首扯起了旗子，上写“出清底货大贱卖”，“关店大拍卖”，也有站在门口叫喊“一分洋钿买本书，勿要错过好机会”。有的索



性把书籍摊在人行道水门汀上叫卖。有些书店门口扯起的旗子上，明明写着“大廉价一个月”，可是这面旗子因悬挂日久，已破旧不堪。还有些“卖噱头”的书贾，以赠品号召，说买一块钱书得摸彩一次，头彩留声机一只，二彩风琴一座。于是买客买了书，伸手到一只木箱里去摸出一个纸卷来，一看总是十七、八彩，铅笔一枝或橡皮一块，头二彩压根儿没人得到过，买客自然不信任起来。于是书贾又想出办法，叫自己人手里预先夹了个二彩的纸卷，伸进木箱，假做摸出卷子来的样子，大声叫喊：“摸着了二彩！”在人丛中捎了只风琴就走，引起了众人的欲望，大家买了书去摸，哪里有什么头彩。他们又怎知这座风琴晚上又送了回来，目的是引人入港，装装幌子的。买书原是文化事业，到此已成末路。

### 十三、著作家的粗制滥造

当时有一些出版机关，既没有编辑所，又无编辑人员，被称为“皮包编辑部”。他们需要稿件时，就去找著作人，每千字给稿酬不满一元，甚至三、五角。倘这本书出版发行后无人问津，是老板的晦气，倘大销特销，是老板的洪福，与作家无关。

当时有个出版人见市面上有一本叫《卅六女侠客》的书，销路不坏，他就去找一位在爱国女学教国文的姓王的教员，要他写七十二篇关于女侠客的笔记，准备出版一本《七十二女侠客》，胜过前者一倍。那位教员问出版人：“要多少字数？几时交卷？稿酬多少？”他说：“大约四万字左右，每千字八角，不过十天内要交卷。”王因为课余时间不多，十天无法脱稿，出版人坚

持不得超过十天，说内容粗糙些倒不妨事，时间则越短越好。王心生一计，对他说，你不求内容佳妙，那就两天以后交稿，双方当下定了约。第二天上午，王在学校里上作文课，就出了一个题目：试拟作女侠客的故事一则，说明用笔记体裁，限六百字，当天交卷，须誊清在文格内，不可潦草塞责。当时他这一班是高中程度，具有一定的国文根底，全班共有八十多学生，不到半天都交了卷。王老师选出七十二篇，修改了一番，立即交给出版人，说是效法孔明草船借箭的妙计得来的。出版人喜出望外，付了稿酬，看也不看就送印刷局去印。

随后另有一位姓陈的著作人，更是挖空心思，聪明绝顶。当时某书局一位姓朱的老板托陈编一本关于男子向女子求婚的尺牍，书名就叫《求婚尺牍》，内容为多种多样的求婚书信，要求表示出求婚者各人不同的思想与愿望，措词各异，而目的则是希望女方答应婚事。那位姓陈的著作人接受下来后，便做了一则小广告，假托一位多才富有的女子“登报征婚”，并借某号信箱收件。广告登出后，陈每天去取信，分类编号，加以选剔，并附按语，半个月后，竟得信五百多封，约十万言，交给出版人。出版人大加称赞。此书居然出版，在大东书局寄售。粗制滥造可算登峰造极。

#### 十四、黄色书泛滥

上海出版淫秽的黄色书，一向是不公开的。只有小瘪三偷偷地在幽暗的路灯下，向出入于“野鸡窟”的色鬼兜售。以后张竞生开了“美的书店”于福州路，出版了多种多样谈什么性生活

一类的书，居然公开发行，风靡一时，店门口竟然排了队抢购“性史”。青年人由于好奇而道德堕落。对此，出版界应该负相当责任。

后来相习成风，各书局出版黄色小书、黄色小说。无聊文人出版黄色小报。中国旧小说中黄色成分浓厚的部分，都抄录出来印成专集。公开出卖已不视为耻辱。本来瘪三叫卖黄色小书，巡捕房巡捕要捉去吃官司的。自从反动政府的刑法上规定：“散布秽亵文字图画，妨害善良风俗者，处以数十元罚金。”于是瘪三准备好了钱做罚金，尽管大胆地出卖。瘪三没有钱，他便不敢叫卖。书局老板取瘪三而代之，夺取了瘪三的利润。

巡捕房的包打听(包探)就到各书局兜揽生意，说：“你们出卖淫书，上法院罚了钱还得化工夫、受麻烦。这样吧，就包给我们，每月或每季化一二百元月规钱，我们负责保你太平无事。书局老板听得入耳，就一口答应，有的每月，有的每季，送给包探一二百元或三四百元不等。但是，包探照例要带外国人来抄查，不过事前通知你拿掉，抄查过后，尽管照常出卖，一向视为成例。

其实所谓妨害善良风俗，外国人的态度并不是那么认真的。外国人有钱进账，他来抄查，一则是例行公事，二则威吓威吓，使书局老板知道月规钱不是白白化掉的。至于法院里的法官呢，一则不告不理，二则生活枯燥，希望有什么新出版的淫书，买来消闲阅读。这并非故甚其词。当时有家书店老板不肯化陋规钱，巡捕房包探在他书店的楼上房间书橱里，抄出一套原本《金瓶梅词话》，分上下两函，二十一册。包探认为罪证

属实。第二天传书店老板上法院做刑事被告，受审问。不料这一部淫书，就是那个坐在法庭上法官的叔父送给被告的。书的扉页上面有他叔父签的姓名。因此，这位法官问被告：“你这部书可是出卖的？放在哪里？怎么被包探抄着的？”被告就照实而说：“这部书是朋友赠送的，放在楼上房间的书橱里，并不出售，被包探顺手牵羊拿去的。”法官问包探：“是不是这样？”包探说：“是的。”法官问被告：“你有什么话讲？”被告回答说：“仅仅是藏着，并不把它出卖，似乎够不上‘散布’两字。这部书，北京国立图书馆书目上亦曾列入，那么藏在家中有何关系呢？其他各书店翻印的都有得买，他们抄查不到，偏生把我的书抄出来起诉，不懂得用意何在？”法官当庭判决：“被告无罪，原书发还。”但是原书有上下两函，而法庭上只有上函。法官问包探，包探坦白地说：“尚有下函，院长在看，准明天送还他就是。”被告为之哑然失笑。可见黄色书连法院院长也爱不释手。供应者为满足读者的需要罢了。

这里再讲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当时设在河南路汉口路转角处二三九号大厦里的工部局警务处，附属有个风化科，职掌抄查淫书。风化科科长是美国人劳勃生，手下有几个中国包探，其中有个姓薛的包探，有一天拿了一本已译成中文的淫书稿件，定名《半日轻狂记》，去给福州路某一书局里的老板看，并说：“是从美的书店编译所里抄来的。原文是英文。英国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家的杰作，原本交给科长劳勃生在审阅。译成的中文本没有交上去，不知可有人要把它出版，托你问问别人家看。”那老板姓陈，接受了这本文稿，约薛于一星期后听回音。

薛去后，陈恰巧晚上往苏州去，他在火车上把书稿看了一遍，觉得别有新意，确是佳作。不过淫书他向来心爱而没有印售过。因此，到了苏州就把它抄录下来，他忽发奇想，把抄下的稿本，寄与上海相熟的印刷所，托他们排印三十册，限一星期内交货。陈老板回到上海后，这部书已排成，尚未印刷。陈就校对一遍，并在底页上注明：“出版者：连警书社。出版人：美国劳勃生。发行所：上海河南路二百三十九号。书名改为《银梨花下》。印成三十册，陈公诸同好，赠给相熟的朋友。那原译本仍旧还给姓薛的包探。不料后来薛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本，四处找寻连警书社，找寻到的乃是自己办公所在警务处。出版人又是本人的上司。他急得要命，盘问陈老板，陈老板自然不肯认账。

## 十五、连环图画

上海流行的连环画，一名小人书，历史相当久远。同文书局和点石斋出版的通俗旧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首册就附有精绘的插页，标列每个书中人物的图像，以后逐回插入故事图画。另有文益书局出版的《三国志》，附有二百余幅画图，是清光绪年间出版的。后来连环画逐渐单独出版发行，一九一六年为全盛时代。那种方形小本书，有光纸石印本，文字排在每页上栏，下列图画，人物口中吐出两条线，中有对白。这种书的故事取材于旧小说，或戏剧，或时事，如《猪八戒招亲》、《火烧红莲寺》、《水漫金山》、《黑衣盗》等，大都画图粗俗，文字不通。但是马路人行道上到处有小摊子，竖着书架，

满插小人书，租给孩子们阅看。此种租书摊子，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份，计有三千七百十二个(据社会日报调查)；出版这种书的机构亦有八十三家(据上海书业公会报告册)，其中有些出版者附在小石印局内，也有小石印局兼营出版连环画的。闸北公益里是这类出版商的密集地方。当时，这些小人书的编著者终日埋头苦干，待遇菲薄，每一册小人书约四十张图，加上上栏文字，代价只有四元五角，有的只有三元，每幅不到一毛钱。

抗日战争胜利后，连环画越出越多，不单孩子看，大人也看。内容进步的很少，如《济公活佛》、《观音得道》等，充满迷信神秘的气氛，毒害了孩子们的心灵。

## 十六、古书的翻印

过去上海各大书局都注重翻印古书，如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四部丛刊》，中华书局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开明书店出版了九本平装的《廿五史》，以后，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平装本《十通》。这些书的出版对于保存古典文献，供应各地图书馆的收藏，便利治学者参考，是有贡献的。由于定价昂贵，普及范围不够广泛。

当时在翻印古书的潮流中，亦有一两小书局，选择明清两代有价值的作品，以及封建时代的所谓禁书，用仿宋或活体字排印，陆续出版了不少。如上海杂志公司的《文学珍本丛书》，中央书店的《国学珍本丛书》，以极低廉之价供应读者。前者计五十种，预约只十五元；后者二十五种，仅售六元，读者对此

颇有好感。这些书普遍销行各达数万部。

### 十七、一折八扣书

在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这一时期内，上海有几家书店以一折八扣便宜价格，向读者大量倾销各种翻印的旧小说，以及各种古典文学的单行本，震动了整个出版界和书业市场。这些书的出版发行，对于普及文化，使读者节省开支，养成读书习惯，避免不正当的娱乐，都有裨益。这些书商的动机并不坏，故不能责备他们捣乱市场，粗制滥造，欺骗读者，流毒社会。

所谓一折八扣书，即一本书定价一元，经一折八扣，售价仅八分。一折八扣书的发起者，先是新文化书社和启智书局。启智出版的种类不多，旋即停止出版。新文化书社老板见亚东图书馆出版新标点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售价奇贵，一般读者望洋兴叹，因而按照他们的标点，密排简装，以低价出售，先后出版了二百多种，以旧小说居多数，名为“标点书”，售价却比石印旧小说书低廉一两成。这样，原大量出版石印旧小说的广益书局难与它竞争，生意日趋低落，不得不改排标点铅印本，以低价供应读者。因此，广益书局以大达图书供应局的名义，大量出版标点书，达数百种之多，藉以同新文化书社竞争。当时由于这两家书店相互竞争，各不相让，书价直趋下降，廉之又廉，成为“一折八扣”的局面，使本外埠同业大为震惊。可是他们两家的标点书以薄利多销，大量供应为目的，粗制滥造在所难免。如校对马虎，错字之多不胜枚举，装订亦

极简陋，只用牛皮纸作封面，角上绘一幅图画，题上书名就完事了，读者对此引为遗憾。其时有中央书店继起，力加改革，不用新式标点，只是断句加点，段落亦不另行，接连密排，使页码减少，而添入插图，即以同文版的《三国演义》、《列国志》、《水浒传》、《聊斋志异》中的精细图像，制了锌版，加入卷首，封面请当时有名画家精绘，用八十磅木造纸七色套版石印，校对审慎，错字甚少，用仿宋体字排版，更见得清楚悦目，而售价与新文化书社、广益书局两家相同。中央书店总共出版了旧小说二百余种，文学参考书一百多种，新文艺作品十多种。中央书店这一革新，使前两家大受影响。两家不得不全部依照中央书店的革新方式全排出版。此一类廉价书的倾销，直至抗战时期停止。但廉价书的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读者化五元钱可选购一部《国学自修文库》，足够阅读两年。



# 上海点石斋石印书报及其继起者

向 迪 琮

## 一、石印术传入中国

十八世纪末期，德人施纳飞尔特发明石印，十九世纪中其术盛行。胡道静《报坛逸话》说，一八一五年（嘉庆二十年）四月，传教士米怜带了刻工蔡高、梁发等，由广州抵达马六甲，筹备越恒河布道并进行文字工作，这年的八月五日开始发行一种月刊，名为《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简称《察世俗》，行销国内。

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上海开始创设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以石印印书，是为我国最早的石印书籍。一八七九年该馆成立木版印刷部，一九〇二年增设照相制版部。

## 二、点石斋印书局的创办经过

点石斋印书局的创设，约在一八七八年间，由英人美查（F. Major）主持。美查最初和他的长兄来华贩茶，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后因营业无起色，就变计另谋生财之道。他的买办陈华庚见上海当时报纸行销甚广，乃劝其办报，并介绍乡人吴子让为主笔。美查赞同其议，乃聘钱昕伯赴香港调查报业情形。后来美查兄弟所营企业有所发展，因以历年经营所得，开设点

石斋印书局，初聘土山湾印书馆的邱子昂为石印技师，最初所印为《圣谕详解》、《康熙字典》及考场所用袖珍本工具书等，营业大盛。

从前上海有一文人姚公鹤，著有《上海闲话》提到：“闻点石斋石印第一获利的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售罄；有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销路如此，故第二批印六万部，又不数月售罄。”在光绪初期，科举未停，一般知识分子唯一出路，就是要经县考、府考、院考才能取得秀才地位，得了秀才，又须经过乡试，才能得到举人，中了举人，又须到京会试，才能得到进士；中了进士，才能殿试朝考，得到翰林等等头衔。与考的人，因考试地方座位狭小，应用工具书籍，携带过多，无处安置，加以当时我国通用各书，俱系木刻，卷帙浩繁，即以《康熙字典》一书而论，全部即有数十巨册，携带赴考，极感不便。自点石斋以石印术翻印古书以来，不但文字原形毫厘不爽，而其书版尺寸又可随意缩小，蝇头小字，笔划清楚，翻阅既便，怀袖尤宜。又有缩至二寸多之八股文、试帖诗等，专供考生赴考挟带之用，一时猎取功名的举子莫不争先竞购，而点石斋之名，因此远近皆知，其营业一时无二。

### 三、《点石斋画报》的刊行及其影响

点石斋于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五月八日）创刊画报，名《点石斋画报》，每月出版三期，每旬一册，为图八页，用连史纸石印，随《申报》附送，零售银五分。该画报所绘全系新闻、

要闻等。其时法国方侵略我国，该画报对基隆战役，详绘法军战败情况。又于甲午中日战争中，宣传鸭绿江战胜功绩，虽当时政府未予重视，但我国广大群众激昂慷慨，不可遏止。该画报利用时机，一方面迎合大众心理，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事实，一方面铺张夸大，绘影绘声尽量宣传鼓吹，于是画报销路突飞猛进。可惜的是，点石斋前后所出的书籍究有若干，画报共发行若干期，现已难于寻得详细数目。

#### 四、《点石斋画报》的执笔人

点石斋画报的主要执笔人为浙江元和县人吴嘉猷，后改名犹，字友如。自幼习画，擅长工笔，人物、仕女、山水、花卉、鸟兽、虫鱼无不精能。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事定，他画清兵镇压太平军战绩图，颇为清王朝赏识，因此声名大噪。点石斋震于他的盛名，礼聘为画报主编人。同时绘稿者，尚有金蟾香、张志瀛、田子琳、符良心、周慕桥、何明甫、葛龙之、金耐青、戴子谦、马子明、顾月洲、贾醒卿、吴子美、李焕珪、沈梅坡、王钊、管劬安、李庸伯十八人。我曾见点石斋画报数页，（一）法败详闻一图。详述一日耳曼人乘邮船路经基隆，目睹基隆一役法军为中国英勇陆军所败的情况。图为张志瀛所绘。（二）刘军门轶事一幅。具述刘渊亭军门坐镇台湾，与日人相持，不屈不挠。图为符良心所绘。（三）贤母守城一幅。述新竹一役，有吴姓义民抗日不屈，横遭惨杀，其母破家守城英勇侠烈情事。图为何明甫所绘。三幅的画法，与从前绣像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等插图相似，戈公振谓其具有聊斋性质，自非谰语。

## 五、继点石斋印书局而起的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

自点石斋以缩印字典、圣谕及考试工具书等享名获利后，国内资本家目睹盛况，群思染指。广东人徐鸿复(裕子)遂起而设立同文书局，购买石印机十二架，雇用职工五百名，专事翻印古籍，其最著名的有《尔雅图》、《聊斋志异》、《二十四史》、《佩文斋书画谱》、《佩文韵府》、《全唐诗》等，均影印殿本，用连史纸印制，印刷精美，实驾点石斋而上之。其时尚有拜石山房一家，与点石、同文鼎足而三，皆盛极一时，惟拜石山房所印书籍，如今书肆已不易找到。同文后改为五洲同文，虽仍印《二十四史》等书，但其印墨纸张，已远不如昔。

## 六、继《点石斋画报》而起的《飞影阁画报》

《飞影阁画报》继《点石斋画报》之后而创立，主编人为吴友如，创刊于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每月出画报三册，每册十页，用连史纸石印，卷摺式装，由上海鸿宝斋经印，每册售银五分。这两个画报的内容不同之点在于点石斋大都侧重于描绘时事，反映社会现象，而飞影阁虽亦偶尔涉及社会生活，但仅限于里巷琐闻与海外杂事，其重点则以人物、故事为主，其类别为时装仕女、闺媛汇编及百兽图等。此后，吴友如又另创刊一种画报，名为《飞影阁画册》，每月两册，每册十二页，仍用连史纸石印。这个画册的内容已转变为纯艺术观点，仅供有志美术者作为画稿。

## 七、异军突起的《画图日报》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上海环球社创办了一种石印画报，名为《画图日报》，每天出一册，每册十二对页，用有光纸石印，经摺式装，每册售价铜元三枚（外埠三分）。这个画报的图画拙劣，其艺术水平远不及点石斋和飞影阁画报，但是它的内容却很丰富。其类别有世界名人历史、上海社会之现象、上海之建筑、新知识杂货店、寓意画、讽刺画等。在有关上海的题材中，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新事物。所载寓意画、讽刺画，是中国早期的漫画，大胆而露骨地讽刺了旧社会的黑暗，抨击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在《画图日报》最初的一百多册中，还连续登载了《营业写实》组画，又名《三百六十行》，反映了当时手工业者和小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每册刊登两幅，有画有诗，诗句通俗，带有民间诗歌意味。

上海点石斋印书局自英人美查集资创办以来，利用石印术缩小的功能，为一般猎取功名的应试举子开一挟私舞弊的不二法门。从前考生完成试文三篇后，必须默写《圣谕》一段，又必须抄袭拼凑来增重文价。所以该局特印《圣谕字典》，又编辑应考的文选、诗选等书，以为入场需要，以此获利最大，享名最久。然因此而鼓舞同文书局等继起翻印古籍，对于我国文化的普及，具有很大的作用。《点石斋画报》出版后，直到清朝末年，经过三十多年之久，行销广远，读者踊跃，中间宣传中法、中日战役，鼓舞民情，转移国际视听，虽仍别有怀抱，但

在当时也曾起过一定积极作用。至于画报内容，不免有瑕瑜互见，美丑杂陈的情况，这是当时编绘人对那个时代的认识的局限所致。总的来说，它的倾向和风格可以说是具有进步性的。后来《飞影阁画报》、《画图日报》的继起，以及近今流传最广的连环图画，均不免受《点石斋画报》的影响，这又不能不归功于该画报的倡导。

## 清代上海竹枝词

吴 贵 芳

竹枝词源出于巴渝一带流行的民歌，自唐代刘禹锡改作新词以来，历代都有不少诗人词客运用这个形式来从事创作。在他们看来，竹枝词和传统观念的近体诗的区别，主要不在声律、句式、语法等特点，而在选题命意，发挥作者的才华要比近体诗自由得多。如说：“其言就事，毋庸点缀，其词通俗，不嫌鄙俚；盖本楚地之歌，犹吴人之有吴歌也。”尽管后来的写作逐渐缺少民歌色彩，但是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视界，确实放宽不少，眼前即景，瞬间感兴，经过吮毫入细的描写，显得生动具体。唐人所作还多缠绵于旅客羁人的离思愁绪，或儿女柔情，后人则逐渐注意到歌咏客观外在的风土人情。在一定时期的一定地域内，竹枝词多少保留了“可以补志乘之阙”的社会历史资料，供后人研究探索。本文之所以要提到上海的竹枝词，着眼点也就在这里。

上海(包括今市区和郊县)竹枝词的历史发展，年代是不短的。个人认为，以描写地方风物而论，最早的作品应上溯到北宋景祐间华亭知县唐询所作的《华亭十咏》，同时名人梅尧臣、王安石等皆与唱和。北宋之末，又有许尚所作的《华亭百咏》。元季有僧寿宁所作的《静安八咏》，内容主要是歌咏静安寺古

迹。明洪武间，顾瑛是第一个纂辑《上海县志》的人，同时他也喜欢写竹枝词。今传十二首，如咏上海纺织户云：“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绩麻。昨日官租催正急，街头多卖木棉纱。”可以说，这是作者留意描写民间疾苦题材的一个创例。进入清代以后，历经康、雍、乾、嘉数朝，上海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较重要的发展，社会生活出现了若干新的风貌，文人写作竹枝词从此多于前代。一些有名望的士大夫如钱大昕、王鸣盛、王鸣韶等，为表示他们爱重乡土的观念，也都有意识地加以提倡。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所谓十里洋场的奇景异象，大为全国所瞩目，竹枝词随之而繁衍一时。总的说来，历代许多竹枝词只是出于遣兴的偶然动机，单纯地记事咏物，内容大都是古迹、胜景、岁时、占候、地志、物产、神话传说、自然现象以及人物传记等，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毕竟有一些作者，由于他们的处境关系，不能不体会到上述的一些社会变化，因而利用竹枝词的形式，曲折地生动地表达了他们的观感，从而也表达了一时一地的生活风情，使清代上海竹枝词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一）上海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始设江海关，开放了清初三十年来所禁止的海上贸易。上海港内的兴盛情况，竹枝词有这样的描写：

“维堞吞差歌浦边，万家烟火日喧阗。

东门一带烟波阔，无数橹橈阔广船。”

——乾嘉《上洋竹枝词》



(二) 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年)清廷通令外商只许集中广州一口,日本、南洋和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商货,遂多由闽广商人航海贩运,大、小东门外当时是转口的中心,因而成为大批闽广船的集泊处所。与此同时,港岸上也出现了闽广商人经营的专门发售洋货的行号。这些行号集中的街道,就叫做洋行街。竹枝词说:

“閩閩居奇百貨盈,遐方商旅滿江城。

洋行街上持籌者,多學泉漳鴉舌聲。”

——乾嘉《上洋竹枝詞》

(三) 閩廣商船進口大宗海貨,于“二三月載糖霜來賣”(褚華《木棉譜》)即是大宗貨物之一。竹枝詞說:

“閩商專賈稅江關,海物盈盈積似山。

上得糖霜評價買,邑人也學鳥綿蠻。”

——乾隆《申江竹枝詞》

(四) 閩廣商人往來頻繁,當然會給上海帶來一些異地風尚。竹枝詞說:

“……近日上洋風俗改,市人盡效嚼檳榔。”

——乾嘉《上洋竹枝詞》

(五) 宋咸淳以前,上海從事海運者已經摹仿福建人供奉天后,到了清代,更形成爲這一行業的普遍習俗。竹枝詞說:

“天后娘娘小像傳,中堂虔供一爐烟。

揚風旗出高檣外,知是伊家放海船。”

——同治《沪城竹枝詞》

(六) 海禁開放以來,在出口超過入口的有利貿易形勢下,

外国货币主要是荷兰、西班牙银币从吕宋(菲律宾)大量流入广州,复由“浙江、闽、粤海船携……来上海,置办货物”(道光十三年林则徐摺)。由于计枚核值比较便利,洋银价格竟比纹银价格为高。竹枝词说:

“往来刀贝似流泉,鸕眼何堪混悉迁。

不识青钱谁逸去,街头好用是洋钱。”

原注云:“乾隆五十年,洋价一千二百文。”

——乾嘉《淞南竹枝词》

(七)从生产者本身的活动来看,远在明代就有以“衣被天下”自豪的上海棉纺织业,伴随着商品流通的增长,这时有了更广泛的发展。竹枝词说:

“比户缫车月满阶,河豚上市布盈街。

林塘织得了娘派,西浦还夸胡草鞋。”

原注云:“胡氏寡居,以布自给,工最良。常穿草鞋,故称草鞋夫人布。”

——乾隆《中江竹枝词》

(八)丁娘约为明季松江人,住东门外,弹棉时花皆飞起,织布精软,号丁娘子布(郭廷弼《松江府志》)。上述竹枝词描写了织布业生产兴盛的情况,并指出了娘流派之外,又出现了名手胡草鞋,说明在小生产者之间,日益展开着剧烈的竞争。但是,尽管如此,封建制度下的各种剥削是沉重的,迫使这些小生产者还远不能扩大他们的商品再生产,绝大部分只能重复着那种简单的再生产,他们的生活依然十分低下。竹枝词说:

“织布全凭一乘机,男无完袴女无衣。

六时纵得成双匹，只博囊空换米归。”

——乾嘉《东乡田家竹枝词》

(九) 在小生产同商业资本大宗贸易矛盾的情形下，许多商人不得不采取深入村镇的方法以联系那些分散的小生产者，从事贩运活动。如搜购棉布：

“……卖布人来初落日，沿塘灯火映波明。”

——乾嘉《虹桥镇诗》

“河角弯环星烂烂，晨庄买布声声唤……”

原注云：“上海四乡设有收布庄，天始明，已经上市。”

——乾嘉《申江竹枝词》

如搜购华漕、诸翟一带盛产的蓝靛：

“东土宜棉间有禾，紫堤蓝梗杂高坡。

秋来不少花商至，那比炎天旅客多。”

——乾嘉《紫堤竹枝词》

“……绸坊只爱轻青色，卖与姑苏染绮罗。”

——乾嘉《淞南竹枝词》

如搜购蚕丝：

“台上黄金夜有光，估帆云集为蚕桑；

江南一事差堪喜，丝贾较人价渐昂。”

——同治《洋泾竹枝词》

(十) 商业资本力图把小生产者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但商人并不急于为广大市场充当生产者的组织者，把小生产者的活动变为自己的“场外部分”。他们感兴趣的还是利用某些原料的收获季节差价，廉价囤货，然后再以高价出售或直接调换其他制

成品，或者利用小生产者在地主与封建国家的双重剥削下，急于将产品脱手以应付输官偿息和自身衣食的不足（宋如林《松江府志》卷五）的窘况，从而肆意榨取，赢得惊人的暴利。竹枝词说：

“木棉莫落有霜黄，欲卖偏嫌价不昂。

早把寒衣更旧絮，严冬何必曝朝阳。”

——乾嘉《东乡田家竹枝词》

“野渡争喧趁晓风，轧花步担满西东；

秤锤未起声先喝，权在先生手掌中。”

——同治《沪城竹枝词》

这里所称的“先生”，是指收花行的秤手，表明在商业资本越来越紧密的控制下，棉农小生产者有不得不卖、不得不忍受种种额外剥削的苦衷。竹枝词作于同治年间，但这种情况的源起是很早的。

（十一）那些纱布小生产者，特别是几乎完全和原料隔绝联系的城镇家庭手工业者，他们对商人的依赖也同样日益加深。前面提到的闽广商人，每年二三月间载糖霜到上海出卖，到秋季就买进大量花衣以去，“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指闽粤地区）自能纺织也。”（褚华《木棉谱》）。这样就不能不引起本地纺织机户的深刻怨尤。竹枝词说：

“木棉花似葵花妍，结苞成囊白胜绵。

论秤家家资纺织，居奇却恨海商船。”

原注云：“海客贩载，棉花价昂。”

——乾隆《申江竹枝词》

(十二) 鸦片战争前，商业资本对棉纺织小手工业的控制，只能走到这样的地步。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下的社会形态在上海日益明显。上海经济被纳入这个社会发展的轨道，出现了畸形的繁荣景象。开始接触洋场生活的许多文人，或者为西方资本主义因扩大侵略需要而输入的物质文明所震惊，或者为新条件下的封建堕落性享乐生活所迷惑。表现于竹枝词的，也多数是对于声光化电的市景的一知半解的描写和酒食征逐选色听歌的抒怀笔墨。但是也有些文人在政治认识上比较清醒，或出之以感叹，或出之以嘲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殖民主义制度下的一些丑恶现象，这是比较可取的。

如咏黄浦滩：

“碧天露下悄无声，银电依微恰四更。

惟惜空江好烟景，旧时明月照铜人。”

原注：“英人巴夏礼(即制造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像，矗立于黄浦滩江岸。”

“江干何处立斜晖，碧草清阴与梦违。

燕子不知巡警到，随风犹得自由飞。”

原注：“黄浦滩岸边草圃本中国官地，且未经升科者。草圃中所设铁椅，昔时中西人俱可小憩。久之渐禁华人之短衣者(按指劳动群众)，又久之并禁长衣者。今则华人偶一涉足其地，辄遭巡捕之呵逐矣。”

如咏马车行驶：

“同行游侣尽如花，席帽鞭丝意气夸。

偷向绿阴残照里，银骢飞驾嫩黄车。”

原注：“租界马车违例辄罚，妓女为尤甚。比定新例，华人马车不得越过西人之前。西人马车则迟速可自由也。惟张园（按遗址在今南京西路泰兴路口）内马路，外人之车辙颇稀，游园士女至此始得一试驰骋之乐。”

如咏跑马厅，

“浅草如茵拓地宽，蹴球竞马任盘桓。

香车过处争回首，应许红妆侧面看。”

原注：泥城桥跑马场，为各国人竞马赛球之地，亦禁华人入内，惟经此场外者，尚容平视耳。”

——狄葆贤《沪滨感事诗》

今上海市范围内有清一代的竹枝词，尽管瑕瑜互见，但它们是有一定的文艺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就笔者粗略估计，除过去刻印较多、流传较广的，如张春华的《沪城岁事衢歌》（已收入《上海掌故丛书》）、陈金浩的《松江衢歌》（已收入《艺海珠尘》）、秦荣光的《上海县竹枝词》、倪绳中的《南汇竹枝词》之外，其散见于各家诗集、乡里小志和各种抄本者，尚不少于五十种，共约二千数百余首，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文化遗产。世固不乏有心人，倘能着手整理，以辑佚存献为主，择善而从，然后序、跋、注、按，使之成书出版，相信这会给上海史研究，提供不少新鲜的素材。